

富平名人丛书之一

FUPINGMINGREN

大地之子

平口是



富平报社出版

富平在外名人丛书之一

大地之子

特邀顾问： 胡希捷 纪增政 朱永明 冯德铭 张建社

任中南 杨 剑 赵立正 翟俊武 杨公明

方红卫 赵彦超 姚高民 赵宏卫

顾 问： 张建中 贺 韧 李高文 田即晓 荆胜利

王全民 王建民 赵升良 王金良 郑树新

金爱莲 王青峰 白泉朝 赵云山 唐根荣

杨仲仁 王乃祥 陈东良 乔润芳 郑建设

丑恪谦 张宗荣 严忠民 孙忠社 齐官民

李树农 何 婵 陈祥顺 梁百炼 杨复兴

李旭华 刘智杰 王忙寿

策 划： 荆胜利 李谦平 徐都锋

总 编： 由保民

主 编： 李印功 张更祥 党延兴

编 辑： 井来成 郭建军 任广运 程 琦 张 民

王戊洋 田丁虎

版 务： 王东峰 张宏谦 寇亚丽 纪会芳

苏 军 马建墩 付小玲

为富平腾飞鼓与呼

中共富平县委书记 张建中

由富平报社编撰的《大地之子》丛书，癸未新春之际同大家见面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富平人杰地灵，历史上人才辈出，值得骄傲。秦有大将王翦，唐有谏议大夫魏征，明有吏部尚书孙丕扬、监察御史杨爵，清有大学者李因笃，民国先驱胡景翼，更有我党我国的卓越领导人习仲勋等。当今的富平，那些奋战在祖国各个行业的各类优秀人才更是不胜枚举。他们学有所长，事业有成，在不同岗位、不同领域为祖国的强大而辛勤工作着，他们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是祖国建设的栋梁，也是78万富平人民的骄傲。

《大地之子》是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使家乡人民看到了从富平走出去的儿女们，在祖国的不同地方，不同领域辛勤工作，努力进取，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家乡人民为他们感到骄傲，感到自豪。透过这个窗口，生活在天南地北的富平乡党们，彼此了解，彼此熟悉，他们互相激励，更加努力。透过这个窗口，使正在求学的富平学子们，有了学习的榜样，有了学习的动力。

《大地之子》是一座桥梁、一条纽带，把天南地北的富平乡党和家乡连在了一起。生活在外的游子们，他们虽身处异乡，但时时刻刻忘不了养育自己的富平大地。家乡一点一滴的信息都使他们激动，使他们牵挂。他们希望家乡更加富裕，更加昌盛，他们也希望为家乡的建设贡献自

己的力量。

《大地之子》的意义还在于，身在异乡的富平乡党，他们或为官、或执教、或经商、或科研、或从军、或习文，对于家乡的发展和建设来说，他们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富矿。通过他们，我们可以了解外面的世界，可以学到先进的经验，得到发展的信息。他们渴望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他们希望回报养育自己成长的富平大地。开发这座富矿，使人才资源变为家乡经济发展的优势，使他们对家乡的热爱眷恋之情变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

富平报社的编辑记者们独具慧眼，在报纸上开辟专栏，报道富平在外名人的事迹。他们不辞辛苦，奔波劳累，北上北京、天津，南下成都、重庆，数十次去西安，使富平在外名人报道不间断地坚持下来，《富平报》成了异乡游子们了解家乡变化的窗口，《富平报》也成了家乡人民了解在外乡党的窗口。他们为家乡办了件好事，现在将报道汇编成书更是锦上添花之举。

《大地之子》第一集所收录的人物，仅仅是富平在外名人中的一部分。大量的优秀人才未被收入，希望报社继续努力，把这一好事坚持做下去。随着富平经济的发展，从富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人才将会越来越多，《大地之子》的内容也会越来越丰富。

愿富平名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名！

頻陽魂
赤子心

李高文

百三十九日

县人大主任李高文为本书题词

问
乡
情
意
浓

问
心
铸
魂

贺
韧

县长贺韧为本书题词

家乡赤子
祖国英才

田即晓



2003年11月

县政协主席田即晓为本书题词

县党政领导与回乡乡党会谈



◀朱永明（左二）回乡时和县上领导张建中（右二）、贺韧（右一）、荆胜利（左一）亲切交谈。

▶乡党方红卫回乡时和县委书记张建中（左）亲切交谈。



◀县长贺韧（左）向乡党方红卫介绍县上情况。

富平记者采访在外名人活动剪影



◀ 采访组在北京采访时与在京的富平乡党合影

前排右起：雷甲文、李印功、赵立正、由保民、张更祥、田玉旺

后排右起：高宏新、路宏伟、岳伟、田七十、张有才

▼ 采访组在天津采访时与在天津的富平乡党合影

左起：李印功、张更祥、杨忠直（天津大学教授）、苏军



▲ 采访组在成都采访时与在成都的富平乡党合影。

左起：董建才（成都军区联勤部副政委）、朱永明、由保民、冯长德、张更祥





◀ 采访组在海航总部与乡
党合影。

左起：张更祥、由保民、
纪增政、曹万平、苏军



国家农发办办公室副主任 翟俊武



清华大学教授 常智杰



武警总部纪委处长 杨胜旭



清华紫光副总经理 贺北平

◀ 海军总部参谋路宏伟
与李印功亲切交谈



北汽福田工程师 王永清（右）



北汽市场经营干部 赵敏庄



北京植物园干部 周书海



北京武警 19 支队队长杨保强（左）

目 录

- 英雄一世 坎坷一生 1
——习老革命生涯简要回顾
- 无私奉献 坦荡一生 16
——记原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王曙
- 条条彩虹映神州 20
——访国家交通部副部长胡希捷
- 从士兵到将军 30
——访海航后勤装备部部长、少将纪增政
- 富平人在成都当市长 37
——访成都市原常务副市长
 现成都国有资产开发集团董事长朱永明
- 航天战线一老兵 44
——北京航天指挥中心原政委赵武进军旅生活扫描
- 望星提剑守边关 50
——访成都军区联勤部参谋长冯长德
- 走访陈双全 57
- 平淡尽心写人生 65
——访省委老干部工作局局长刘世文
- 干部教育树业绩 72
——记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兰友仁
- 党益民和他的力作《喧嚣荒墟》 80
-

超越—创新—实践	87
——我省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李平安理论研究之路	
赵立正印象记	92
铸剑法兰西	97
——记留法博士、西农大食品与科学工程学院院长杨公明	
我在北大当教授	107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万民自述	
“产学研”结合铸辉煌	116
——西农大动物科技学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杨公社	
智慧让世界更精彩	122
——访天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忠直	
推动中国法学走向世界	128
——记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法学家杨一凡	
赵政阳的苹果情结	136
用智慧撑起一片蓝天	150
——记 CCED 发明者、乾为天公司董事长朱崇君	
一生追求无止境	155
——访著名学者杨军教授	
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者	163
——访青年经济学家江濡山博士	
志在播绿	171
——访西农大经作栽培、育种专家杨吉安	
青春似火	178
——记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方红卫	

珠联璧合成大业	185
——记西化热电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贾双社 总经理王增战	
凤凰山的情结	195
——访陕西绿宝实业开发公司总经理姚高民	
乡关何处	203
——西安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周大鹏抒怀	
平凡的岗位 辉煌的业绩	209
——记驻沪空军某部机营股水电班军士长薛思民	
在京的富平乡党与富平报(上)	216
盼望家乡早日富起来	221
——在京的富平乡党与富平报(中)	
打造富平在外新形象	228
——在京的富平乡党与富平报(下)	
勤奋敬业是走向成功的另一条腿	232
——赴京采访富平在京名人札记之一	
崇高追求使他们的人生变得如此美丽	238
——赴京采访富平在京名人札记之二	
谦虚谨慎只做大事不说大话	241
——赴京采访富平在京名人札记之三	

英雄一世 坎坷一生

——习老革命生涯简要回顾

本报记者 由保民 党延兴 李印功 张更祥

习老的一生是辉煌的。早在年轻时,他就投身到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毛泽东主席称赞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他曾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全国解放后,习仲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他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的重要决策者和开拓者之一。习老的病逝,是我党我军的巨大损失,全县人民沉浸在悲痛中,习老的音容笑貌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习仲勋 1913 年出生于我县淡村镇,早年曾在莲湖小学、庄里立诚中学等校就读。大革命时期的 1926 年加入共青团,从此他就满腔热忱地投入到了反帝、反军阀、反官僚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7 年,正当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国民革命陷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时,习仲勋在就读的三原县第三师范带领学生开展反对反动教职员的斗争,并因此被捕。在羁押期间,他立场坚定,不



不屈不挠,表现了革命者的高尚节操。1928年4月党组织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取保出狱后,习仲勋并不安

份,又满腔热情投入到革命斗争中。

1930年春,习仲勋受陕西省委派到长武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工作,从此开始了其在陕甘地区革命生涯。在杨部,习老与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成立了党小组,积极进行革命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在部队移陕两年后,以省委派员刘林圃为领导,于1932年3月发动兵变,并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三支队,习任队委书记。部队向北且战且退,在永寿被围而败。习仲勋经富平到耀县找到陕甘游击队,并第一次见到刘志丹,二人总结兵运经验,认为必须象毛泽东在井冈山一样,依靠广大农民建立根据地。但由于当时受左倾影响,加上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追剿,1932年11月习仲勋又回到富平,并在都村积极开展工作,发展了乐强明、姚万忠等一批党员,建立起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富平西区搞了几次分粮斗争,在当时极具影响。后成立富平西区游击队,习任政委。富平游击队和泾阳、耀县游击队遥相呼应,建立了渭北苏区,这是陕甘建立的第一个苏区,它为红二十六军创建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训了干部,输送了力量。

1933年春,陕西省委调习仲勋到红二十六军去担任少先队指导员,后为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在照金,习仲勋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户一户做群众工作,很快发动起群众,在此基础上,于1933年4月5日建立了陕甘边革委会,习任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在照金根据地实行了分田分粮、戒烟戒赌等政策,受到群众拥护,照金根据



1999年9月30日，江泽民、朱镕基、习仲勋在国庆50周年招待会上。

地初具规模。但在其时，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左倾盲动指挥，部队南下作战月余，兵败南山，习也负伤。照金苏区是西北党和红军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使西北革命迈入了新阶段。

1933年，南下部队终于回到照金，并以游击战形式，粉碎了敌人两次围剿。1934年春，成立了陕甘边区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习老任革委会主席。当年10月，习当选为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在习的领导和组织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宣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稳定和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为中央红军转战陕北，并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大本营筑好了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习仲勋由学运、兵运而农运，由和平请愿而至发动农民、团结各界武装斗争，自觉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忠实地实践并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1935年9月，王明左倾影响波及陕甘宁根据地，习仲勋因其注重统一战线，被以“右派”、“富农路线”等罪名关押，有看守劝其逃跑避险，习仲勋只说了四个字“为党尽忠”。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毛泽东了解到严峻情况，立即批示“刀下留人”，并派人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

1936年到1945年，习仲勋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专员、关中警备第一旅政委，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区和独一旅政委。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有着十分



1987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与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交谈。

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将其政策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共磨擦日渐，习仲勋经过研究分析，呈报边区政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给敌人武力来犯以有力还击。他和旅长文年生领导军民，与来犯的胡宗南部激战3天，敌人无功而返，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在反磨擦斗争中，习仲勋还提出了在周边友军和地方绅士中广交朋友的意见，对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得到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称赞。

1943年习仲勋调任绥德，这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区，有人口50多万，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习到任后，立即带领工作人员下乡调研，帮助绥德县修改经济建设计划，并要求各区乡干部帮助群众制定村民公约和农业生产计划。



1988年7月13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主席接见以习仲勋副委员长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代表团。



1985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中南海接见全国大学毕业生“志在四方献身四化”先进代表。右起:胡乔木、彭冲。

同时要求机关干部都参加生产劳动,他自己以身作则,树立典范。他还在调研基础上,制定了更为周密的生产计划,包括成立变工队等具体问题,从而使得边区政府自立更生,自给自足。诚如当时《解放日报》发表的《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的社论中所说:“王震、习仲勋、马文瑞等,所有受奖同志,在执行政策上,在个人生活的切实朴素上,尽是模范,他们不夸不骄,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毛泽东为此给习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1945年,大批干部赴东北,中央选配西北局书记时,毛泽东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时隔一年,胡宗南疯狂进攻边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决定边区一切

部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彭德怀在全军威信很高，也有指挥大型作战之经验和才能；而习仲勋与边区党政组织、边区人民关系十分密切，他协助彭德怀，充分发挥了党政军民的总体力量，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保卫了延安。毛泽东亲自向彭、习祝贺。1947年7月，我军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战略



叶剑英元帅与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广东。

反攻，为加强陕甘宁和晋绥边区统一领导，中央决定，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恢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习兼任政委。

1947年10月，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各边区都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热潮，但在土改中出现了左的倾向，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中小工商业者也受到冲击，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乱打乱杀的现象。习仲勋先后3次给中央、毛泽东写信，如实报告了边区各地普遍发生左倾

偏差问题及其造成的危害，他还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区和抗战时期的老区、半老区3种类型及应采取的土地改革办法。

毛泽东对此意见非常重视，批文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沿正轨进行，少犯错误。”习仲勋还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亲自到绥德调查，及时总结和推广黄安川村土改经验，并将有关材料上报中央，毛泽东阅后非常高兴，指出黄安川的经验具有典型性，对全国老解放区土改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随着全国解放，整个西北新区的土改摆在了重要位置，习仲勋及时教育干部掌握土改总路线，总政策，并提



198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左一）在江西视察老区。

出两步走的方案,先在汉族集中的农耕区进行,待政治和社会条件具备时,再在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农耕区进行;第二步根据地方实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解决少数民族牧区的土改问题。由于谨慎、稳妥地推行土改政策,到1953年,大西北的土改全部完成。伴随着土地改革进行的还有西北地区的剿匪反霸斗争,在此过程中,习仲勋特别注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匪和叛匪的政策和策略,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解决青海昂拉藏区项谦叛乱,这是解放初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民党反动势力策动藏族部落头人领导组织的部落叛乱。习仲勋多次指示用和平方式解决叛乱,他认为:争取项谦,不仅对于和平解决昂



1958年4月初,周恩来总理与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在飞机上。

拉叛乱，而且对于甘、川、康藏区甚至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也都有重大影响。习仲勋先后多次指示青海省委、省政府进行长期艰苦的政治斗争，派各界人士先后 17 次到昂拉劝说项谦，对项谦及其亲属随捉随放，其财物也分文不动，项谦深受感动，主动找政府承认错误和罪行。争取项谦的成功经验，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2 年 9 月 8 日《人民日报》载文向全国介绍了争取项谦、平息叛乱情况。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在这种政治解决为主，辅以武力平叛的精神指导下，到 1953 年 5 月，基本稳定了大西北的政治形势。

但最为严峻的工作还是为西北培养大批干部，在这方面，西北局和习仲勋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他高度重视处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解放区干部和国统区干部、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党内干部与党外干部之间的关系要求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习仲勋还坚持强调“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宗旨，他还提出一个朴实的口号“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正是由于西北局和习仲勋坚持这些原则，保证了西北的干部在广大区域和各种复杂的情况下，风气正、作风硬。

1952 年 9 月，习仲勋调任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时年 39 岁。他到任后，根据全国文教工作的情况，确定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 16 字方针，并针对文教口官僚主义严重的情况，上书中央，提



1999年1月1日,习仲勋夫妇与子女、亲属合影。

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的改进措施,中央第二天就将此报告转发中央各部委党组参照执行。因其卓越的工作才能,习仲勋又先后担任过中宣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但不管到那儿,不管任何职务,习仲勋都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在1957年全国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严肃地批评了对人民来信照抄照转草率推诿的现象,他认为,三大改造完成后,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因此,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不是小事,是大事,不是一般工作,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1959年,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但他仍然重视基层工作,亲自到河南、陕西调查研究,特别是在长葛,习仲勋公开身份,走村串户,到处访谈,掌握了长

葛的真实情况,纠正了当地大刮“五风”的现象,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留下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朴实形象。长葛人民一直记挂着他的关怀支持,1984年9月20日,长葛县城关镇公社八七村的党支部全体成员和全村干部群众还写信给习老,报告当地从1961年由富变穷,时隔25年后又由穷变富的生动过程。

1965年,习仲勋在康生的迫害下背着莫须有的“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受审达16年之久。

1978年,习仲勋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在这里迈出了他人生乃至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步。习仲勋不适应酷热,到了夏天,热得大汗淋漓,但文革才结束,广东百废待兴,因而习仲勋经常下乡调研,足迹遍布南粤大地,他根据有的同志提出的“充分利用广东条件,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建议,于1979年4月2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认真研究,一致同意请求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并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加工贸易区设想。当月下旬,习仲勋将这一意见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作了汇报,得到了赞许和支持,邓小平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到了6月6日,广东省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即1979年50号文件)。从习仲勋到广东,到中央50号文件下达,仅一年多时间,这正是国家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动并积

极争取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率先实践开拓。20 年的历史证明，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对于改革开放逐步推进，乃至对邓小平理论在发展中提供一定的实践经验和验证，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1980 年 12 月，习仲勋被调离广东到北京时，广东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较快，一些大的合资项目，如大亚湾核电站、广深珠高速公路、珠江三角公路桥都在进行可行性论证或洽谈。

习仲勋到京，出任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白天忙碌一天，晚上回家还要继续接待来自各地要求落实政策的同志，常常忙到深夜。在书记处书记任上，习仲勋还非常重视党史研究，他指出，总结研究党的历史经验，既可供后人借鉴，又可教育后人。他还说：我们贯彻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首先就是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他的讲话，对于开展党史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不可估价的精神财富。

用习老夫人齐心的话说，习老是“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怀坦荡，为党的事业历尽艰辛，但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总括一句话，还是毛泽东对习仲勋的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老走了，但他“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高大形象永远烙印在我们心中。

名人档案

习仲勋,男,1913年出生于我县淡村镇,早年曾在莲湖小学、立诚中学就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月月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一直从事党的武装斗争工作,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曾是陕甘宁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解放后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2年于北京逝世。

无私奉献 坦荡一生

——记原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王曙

本报富平在外名人采访组



一九五九年的王曙同志

王曙同志原名王作宾，陕西省富平县美原镇人，1909年8月31日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在杨虎城部参加“西安事变”。1937年初到延安，

历任军委三局通校教员、教务主任，三局教育科副科长、第三处处长、秘书处处长、通信材料厂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无线电厂军代表，军委电信总局工业管理处副处长，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副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副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十局副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十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曙同志1928年参加“渭华起义”，不幸在河南邓县被捕，1930年在革命活动中又一次被捕，其间，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严刑拷打，但他革命意志坚强，始终没

有泄露秘密,体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37年,王曙同志在延安通校期间,为我党培养无线电通信人才做了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1947年,他随军委三局机关撤离延安,辗转陕西,在瓦窑堡参加组建了语言广播电台,在晋西北参加了小型蒸汽电站建设的领导工作。1948年在河北省平山参与组织小型无线电台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前线部队。

1949年初,王曙同志任天津无线电厂军代表,他认真贯彻党的城市工作政策,组织工厂迅速恢复生产。1950年任电信工业局副局长,他分管局机关和所属企事业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军用被覆线等通信设备建设与生产,保证了抗美援朝作战部队的急需。

1957年,王曙同志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副局长



一九八八年,王曙同志回陕参加纪念渭华起义60周年时,在富平招待所同主要亲属的合影

期间，受部里委派，赴成都市检查、督促部属企事业单位及学校的建设工作，协调部属单位与省市有关部门的工作，促进了该地区电子工业新建单位的发展。

1959年，王曙同志组织有关企业按期完成了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工程的电视转播、扩音系统，同声翻译、音响等设备的配置任务。组织领导了1000千瓦大功率广播发射机研制的协调工作，保证了对外广播任务的完成。

1963年，王曙同志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分工负责生产调度、物资供应、销售、财务、干部和教育等工作。他为开创我国新兴的电子工业，呕心沥血，竭尽全力。他为“两弹”电子装备配套、常规军品生产和新厂建设，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负责组织新材料试制工作，为电子工作所需的新材料国产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曙同志受到迫害，他始终坚信党、坚信共产主义，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77年以后，王曙同志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顾问，他领导组建了南京无线电公司，他蹲点搞调查研究，进行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做了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1988年6月，王曙同志离职休养。离休后，他仍十分关心国家经济建设和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和从事各种咨询调研活动。

王曙同志在 7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他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他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保持和发扬了我党的优良传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止。他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政治责任感，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工作认真，任劳任怨，无私奉献，襟怀坦荡，作风正派，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他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关心同志，平易近人，严格要求子女，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干部、老党员的高风亮节，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和尊敬。

王曙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名人档案

王曙，男，1909 年生，我县美原镇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 年转为中共党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7 年初到延安，历任军委三局通校教员、教务主任、通信材料厂政委等职。解放后历任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副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2002 年于北京逝世。

条条彩虹映神州

访国家交通部副部长胡希捷

本报记者 由保民 李印功 张更祥 党延兴



老百姓说：“致富先修路，大富修大路，快富修高速。”

副部长说：“不能先有交通量才修路，经济发展了才修路，这是不行的！”



胡希捷在看《富平报》

“致富先修路，大富修大路，快富修高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富裕了老百姓的感叹。如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我们欣喜地看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那些宽阔平坦，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似一条条绚丽的彩虹，映照神州大地，让世人惊叹，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连接桥。用主管国家公路建设的交通部副部长胡希捷的话说，这是赶上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非常庆幸，非常振奋。这几年修的路多了，做了一些实事，心里感觉踏实、高兴。为了中国交通事业的飞速发展，乡党胡希捷副部长多年来为之做了不懈地努力。

胡希捷副部长出生在一个具有悠久革命传统的家庭，从小在延安，当时毛泽东主席还抱过他。但在后来的学习、工作道路上，他没有丝毫地依赖家庭，凭的是刻苦学习，凭的是勤奋工作，凭的是不懈努力，硬是从一名技

术员干到如今的这个地步。1997年4月,他卸去了陕西省交通厅长职务,到国家交通部担任了主管全国公路建设的副部长。上任伊始,胡希捷就为自己确定了新的目标:为改变落后的交通现状,尽快缩短我国与先进发达国家交通发展的距离。

当时面对全国东部和西部的路网密度差别大,东部高达30%、40%,甚至是50%,而西部只有百分之几的落后现状,他忧心如焚。他及时和相关国家部委的领导专家一起深入各省市,搞调查,作论证。国家计划发行国债100亿,交通部拿出50亿,用于西部地区县通地市的主路建设,总计250个项目。

国家对交通道路建设的高度重视,在资金的投入和建设规模上的扩大是历史上最大的,胡希捷和他的同伴们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用他的话讲,咱必须认真地



胡希捷和社长由保民(右)交谈

把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得出色。具体来讲,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抓基础设施建设,即把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全方位发展。其次是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在基础设施方面,他们主要调整了公路网的层次结构、技术等级结构和地区分布结构,提高公路网的整体服务水平。通过发展专业化程度高、技术先进、高效低耗的车船设备,强制报废不符合安全规范、技术落后的老旧车船,解决了不合理的运力结构。第三是治乱。加强运输市场建设,严厉打击黑车运输,规范了市场经营行为。第四是加快交通科技创新。加快交通信息化建设,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智能化运输系统为标志,加强对智能化运输系统的研究。适应了建设大运能和高速化为特征的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的新格局,实现了公路、水路交通的准确定位。

发展交通事业,资金是关键,这在西部落后地区更为明显。对此,胡希捷副部长有自己的认识,他说,西部公路建设在筹集资金问题上存在诸多困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即就是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渠道创新以及对现有政策的深化和完善,才能真正摆脱困境。首先是稳定现有资金来源渠道;稳定税收渠道;抓住机遇,争取更多国债资金投入;坚持“以工代赈”政策,提高使用效率;争取长期税收优惠政策,增加项目融资能力;改善政策环境,扩大政策环境,扩大非传统融资方式的融资规模;努力扩大利用政策性银行贷款规模。



分管公路的胡希捷(中)对高速路情有独钟

其次,要大力开拓西部公路建设资金新渠道,积极争取国家扶贫资金用于西部公路建设;建立国家西部公路建设专项资金,以公路为试点,改变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式,发挥更大的政府投资效应;以土地入股丰富融资的方式,降低项目实施难度。在解决西部道路农村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上,主要采用将高速公路与普通农村道路打捆的方式来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用高速公路的收益来统一还贷。胡希捷副部长虽然离开了西部,但他时刻不忘西部的山山水水,国家交通部在安排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时,将70%投向西部地区国道主干线等重点项目以及有经济效益的内陆航运建设项目。2002年,国家准备用于西部地区通县油路建设的资金就有150亿元。如此一来,从根本上保证了全国公路交通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胡希捷(中)三分之一时间在基层作调研

几年来，在乡党胡希捷副部长和他的同伴们的共同努力下，凭借国家发展交通事业的强劲东风，国家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之大，建设规模之巨，发展速度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自 1997 年以来，在交通部的积极争取下，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每年都有大幅度地增长。2001 年比 1997 年就增加了 1200 多亿元。大投入带来了大发展，“九五”期间，全国公路建设实现了两个突破：总里程突破 140 万公里，高速公路建设总里程突破 1.5 万公里。沿海港口中级以上生产性泊位达到 2400 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近 600 个。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 11 万公里，其中五级以上航道里程达到 2.16 万公里。车船运力高速增长，技术水平稳步提高。胡希捷副部长把这些成绩的取得归功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为了贯彻国家质量工作方针和国务院领导关于加强基础设施质量管理的指示精神，胡希捷副部长主动树立质量意识，从我做起，落实质量责任制，及时提出了在全国交通系统组织开展了建设质量年活动，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和目标任务，即“第一年打基础见成效，第二年抓巩固上台阶，第三年再提高上水平”。三年来，在他和部委有关领导的真抓实干下，全国各地的公路建设质量管理水平获得了较大提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一是人的素质的提高，质量意识普遍增强，质量氛围空前高涨。过去讲质量标准，主要是结构好坏；现在不仅注意外表，而且注意品质，比如是否注重生态环境、人文环境，是否用了新材料，它的耐久性如何，整体建筑水平、设计水平提高没有，因此质量标准提升了。过去争优良工程、国优工程、拿鲁班奖；现在不是拿奖的问题，是工程的整体品质在变，在提高。二是建章立制，完善规章，以制度促质量成为公路建设管理的普遍共识。三是建设管理不断深入，监督检查及时到位。加强管理和检查落实是公路建设质量年活动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仅2001年，交通部就组织了10个检查组分别对京珠线、西南出海辅助通道、同三线、东北三省、京津冀、重庆湖北特大桥和福建战备公路等46个项目进行了检查，还随机抽查了部分项目，检查里程达3538公里。四是质量通病得到遏制，工程质量显著提高。实现了公路工程基本消灭主要质量通病的目标。从项目竣工验收结果看，公路工程优良率达到95%以上。

修路是发展,养护也是发展,胡希捷副部长结合调研实际,在2001年全国公路养护管理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全国范围推行养管分家、养管事业单位企业化的创新思路,得到了各地的积极响应。为此他们作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化公路管理体制,合理设置公路管理机构,逐步构建一个全国基本统一的、符合行业发展要求的公路管理体系;二是积极推行公路养护机制改革,逐步实现养管分离,解决投资与效益的关系,使有限的养护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要把养护事业逐步企业化,养护质量的好坏直接与效益挂钩,实行养护公开招标。

其实乡党胡希捷副部长也没少出力流汗。据记者了解,胡部长他在每年的工作安排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基层做调研。他喜欢多跑路,多看路,多听基层的反映。平时,胡部长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如果说有,那就是喜欢和同事散步、聊天。他在公路养护管理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公路建设是发展、养护也是发展的观点,就是胡希捷副部长与公路司一位同志散步聊天时得出来的。

副部长胡希捷是从最基层干起,治院毕业后从技术员干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很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和需要。他认为,创造良好的公路交通环境,是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际行动,也是贯彻落实“十五”计划《纲要》提出的“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的具体体现。他常说交通运输本身就是一个服务行业,他用自己的行动体现了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服务的思想。人常说,公路是五种运输的基础。朱总理提出通

县、乡公路工程,这些路当官的走得少,老百姓走得多。路修好了,老百姓受益了,就会更加拥护党和政府的政策。为了贯彻落实朱总理这一指示精神,胡希捷副部长深入基层搞调查,在实践中,他研究探索提出了适合国情的“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以车为本”的创新服务观念。他说这是由公路服务社会公众的公益性决定的。

和乡党胡希捷副部长交谈,你很难听到华丽的词藻。他喜欢用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方方面面的数据,有成绩、有问题,详尽而准确。他更喜欢谈问题。他认为,通过研究发现问题,可以为加大改革和创新力度提供更好的思路。不是吗,他的人生历程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谈到家乡的人和事时,胡部长总是面带笑容,深情地说,过去在西安还经常见咱富平乡党,现在距离远了,但我对家乡之情一点不减,你们寄来的富平报,几乎每期我都看,富平报成了我了解家乡情况的重要途径。他提示我们:富平要借国家西部大开发东风,抓住机遇,尽快发展起来,要根据富平是农业大县的实际,提倡公司+农户的开发思路,多树富平名牌产品。他还特别强调:一要转变观念,二要重视人才,三要增强富平人气,人气旺了干什么都有奔头。

采访即将结束,我们对胡部长在百忙中能挤出时间接受采访表示感谢时,他举起右手有力地一挥:“家乡人能来,我感到很高兴!希望你们代我在报上对家乡父老表示感谢,就说我没有给家乡人民丢脸!”我们高兴地答应了他。

在采访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胡希捷副部长这位乡党对交通事业发展的执着追求，我们深信，有这样的交通人，新世纪祖国的交通事业发展将会一日千里。

名人档案

胡希捷，祖籍庄里镇，1945年11月生于本省横山县。从小在西安读书，1965年9月至1970年7月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工民建系（原冶金建筑学院）学习并毕业。1970年8月至1973年10月，在冶金部第十六冶金建设公司工作。1973年11月至1981年2月在陕西省汽车运输公司工作。1981年2月至1997年4月在陕西省交通厅工作，历任综合计划处副处长、西三公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兼办公室主任、副厅长、厅长兼党组书记。1997年4月至今，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从士兵到将军

——访海航后勤装备部部长、少将纪增政

本报记者 由保民 李印功 张更祥 党延兴



纪增政(左)陪同江总书记视察部队



上为江总书记亲切接见纪增政(右)

采访完海航后勤装备部部长纪增政，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作为一个军人，从一个普通战士走上军级领导岗位，显得那么出类拔萃，堪称军中骄子；

他，作为一个富平人民的赤子，以家乡人民对祖国的无限赤诚和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为家乡人民争了光；

他，作为一个富平在京名人，他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首动人心弦的歌。

纪增政家在梅家坪镇洪水村，父母早逝。在幼年，艰苦的童年生活磨练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在小学、中学期间，他那强烈的求知欲和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使他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担任学习委员、班长，为他日后走向社会积累了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中学一毕业，纪增

政就树立了立志报国的远大理想。

1964年8月的一天,风华正茂的他便向家里提出了要当兵保卫祖国的想法。老实巴脚的哥嫂当时毫无思想准备,相互对视了一阵,没有明显反对,也没明确支持。不过在他俩的心里,觉得姊妹六个,都守在这个穷得丁当响的家里,有啥出息!

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经过目测、体检、政审,终于穿上了绿军装。

这天晚上,他激动地一眼未眨。

要离开家乡了,他倒有些恋恋不舍。他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在部队干不出个名堂来,我就不回家。”

来到了军营,开始了他从普通士兵到将军的生涯。他和其他士兵一样,得先由一名普通的老百姓变成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这期间要经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接受系统的政治教育,特别是雷锋精神的教育。一开始,纪增政的训练学习就不同一般的士兵,在北海舰队训练团,他的各项工作都干得出色超众。学习水鱼雷专业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纪增政很快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士兵不具备的顽强、吃苦精神,每每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1966年12月,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任命为水鱼雷队机械师,分队长、副队长。这期间,纪增政身先士卒,处处作表率,多次带领机组和分队人员完成了繁重的水鱼雷日常勤务及战备演习任务,被评为技术能手和岗位练兵先进个人。

1980年5月,纪增政调任海军莱阳场站任副参谋

长、参谋长职务。场站是海军航空兵的基地,担负着飞行部队的作战、训练、后勤供给、安全保卫等重任,飞行部队能否作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全取决于后勤保障工作是否及时完善,任何一个方面都来不得半点马虎,否则就会造成重大事故的发生。纪增政深感肩上责任重大,经常深入场站各连队和外场飞行一线,在场站部队中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比武活动。他常常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同战士们一样摸爬滚打苦练军事技术,很快,使场站部队中涌现出了一批“一口清”、“一摸准”的技术能手。在担任海军土城子场站站长期间,面对艰苦的外部环境,他带领官兵艰苦奋斗,一切服务外场,一切服务飞行,一切服务基层,主动为飞行部队排忧解难,狠抓连队的基本建设,土城子场站连续两年被评为优质安全场站。

纪增政在抓部队训练管理上的能力和作为,引起了部队各级的重视,为了更大发挥他在军事指挥上的潜能,组织上努力为他“充电”攒后劲。先后把他送到空军指挥学院、海军指挥学院、中国人民国防大学等军队高等院校进修学习深造,他从火热的训练场和繁忙的工作岗位,走进了静谧的课堂。他珍惜每次的学习机会,把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经验结合起来,认真研究,他挑灯夜读,不耻下问,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理论、军事知识、现代军事高科技知识,积极拓宽自己的知识面,经常了解和掌握主要国家军事后勤和装备发展的新趋势。他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活学活用,举一反三,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学习。学习与实践结合,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又把学到的理

论用于指导实践。纪增政的政治、军事业务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系统的军事理论学习,使纪增政能够更好地接受理解新事物、新知识、新观念,掌握了当今世界军事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他用所学到的知识组织部队出色地完成了全军重大的军事演习任务。他撰写的《新形势下海军航空兵作战后勤组织指挥研究》获中国人民海军优秀论文一等奖,《发挥审计监督在宏观管理中的职能作用》被总后评为优秀论文。

纪增政深知,作为一名部队的指挥员,必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他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注重党性修养,坚持廉洁自律,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官。他出身农家,对党的感情最深,他最大的抱负就是能为党为国家多做贡献。1995年他担任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后勤部部长后,与后勤部政委配合默契,积极带领党委“一班人”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部队的条令条例,坚持以人为本,狠抓机关和直属部队的思想教育,严格管理,严格要求,自觉抵制“灯红酒绿”和其它不良风气的影响。同时,他注重围绕飞行训练抓好后勤保障工作,重大任务都亲临一线组织指挥,先后圆满完成了“联合96-3”等重大演习的保障任务。纪增政还经常深入高山海岛搞调查研究,掌握基层部队的第一手情况,实施面对面地帮助指导,努力解决部队战备训练和生活设施建设,使乐东机场及海岛80%的雷达站等边远艰苦地区部队面貌有了明显改观。他时刻牢记保卫祖国的神圣使命,出色搞好各项工作,多次受到

中央军委江泽民主席的表扬。1998年,他被调到北京,走上了海航后勤装备部部长的重要岗位,成了一位军级领导干部。上任后即刻投入到“三讲”教育中去,他自觉学习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的有关文件、指示,系统研读了“三讲”教育必读书目,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的理解,按照中央军委对军队高级干部的要求,明确了努力的方向。他步入自己政治生涯的辉煌时期。

纪增政一步一步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这并不是机遇的恩赐,而是他个人奋斗的结果,是一个农民娃对事业执着追求的必然。他理想信念坚定,纪律观念强,无论在什么岗位工作,都把自己置于党组织的绝对领导之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服从组织安排。他十分注重党性修养和人格修养,廉洁自律坚持高标准,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团结大家一道工作,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时时以江泽民主席倡导的“寝食不安,殚精竭虑”为党工作的精神状态,去私心,戒奢惰,重节操,信真理,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和带动后勤装备部全体同志,兢兢业业做好工作,为海军航空兵部队的建设和发展无私奉献。

如今,在家乡,每当人们说起纪增政部长时,都亲切地称赞他“官”当大了,仍没忘故土,和家乡情结越挽越牢。他因军务缠身,很少回家,却时时刻刻关注着家乡的建设。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陕西,令他激动不已。他亲切地

对记者说：我们富平在陕西呀，应抓住党和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机遇，让家乡早日富裕起来。并一再表示，他从事军界工作，为家乡帮不上什么忙，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但他始终牢记，要把事干好，只能给富平争光，不能给富平丢人。说到这里，他眼里充满深情，汪着泪花，又打了一个有力的手势。纪增政——活脱脱一个刚强、坚毅的富平汉子的形象，在我们眼前高大起来。

名人档案

纪增政，男，汉族，1947年10月生，富平县梅家坪镇人。1964年8月入伍，1966年入党、提干；1967年至1979年，先后任机械师分队长、副队长；1980年5月起，先后任海军某部副参谋长、参谋长；1983年6月起，先后任海军某部副站长、站长，所带部队连续两年被评为优质安全场站；1986年起，先后任海军某部管理处处长、战勤处处长；1991年任海军某部副师长兼参谋长，所带部队被评为海军管理工作先进师，荣获总部首批军体达标单位称号；1995年任海军某部后勤部部长；1999年任海军某部后勤和装备部部长；2000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

富平人在成都当市长

——访成都市原常务副市长、现成都国有资产开发集团董事长朱永明

本报记者 由保民 张更祥

朱永明是我县华朱乡人，父母皆是普通农民，兄弟姐妹九人。他的学生时代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度过的。现在讲“打工”，其实朱永明在上初中、高中时，每年都要打2-3个月的工，自己挣书费、挣学费。他从小认真勤奋，且脑袋好用，从小学到大学，他的学习成绩很少在班上排到第三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我们采访组到达成都后，一打电话，他就来到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听说他是副省级领导，心中难免犯怵。可一见人，疑虑顿消。朱永明梳着个背头，高高大大，五官棱角分明，看上去很严肃，一开口却很随和，没有丝毫的“官”气。他很健谈，只要提出问题，他都会滔滔不绝地回答；他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无论说什么事，都是条理清楚，态度中肯，完全不象60多岁的人。他说上学甚至参加工作，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当官，更没有想到能当副省级的大官。他说他其实对政治的热情不是很高的，可是历史偏偏把他推到了从政这条道路上。他还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1957年“反右”时，他正上高中。那会儿国家正全盘学苏联，一切以苏联为样板。他喜欢看报纸，更喜欢动脑筋，往往会有些人所不及的思想苗头露出来。他认为学苏联不好，大跃进也不好。因他在班上

学习成绩优秀，有些号召力，他的观点竟得到了大多数同学的附和！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当时高中学生不划右派，学校便在团组织里给他定了个“警告”处分，这个处分后来甚至影响了他上什么大学的选择。他说这件事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重庆的钢厂。工作没一年时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那时的重庆，“文革”闹得全国有名。奇怪的是朱永明当时心中有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再革命也得生产，没有生产你再革命也是空的。他不但没参加造反、武斗，而是以“臭老九”的身份在一线当了五年工人。这五年对他来讲，是珍贵的。他把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冶炼），一方面和实际对照实践，一方面把冶炼的每道



朱永明(右一)与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会面

工序都独立地做了好多遍！据厂里的老工人回忆，他当时的多项冶金工种水平都达到了八级工程度！这对朱永明后来的指挥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从重庆调到成都钢厂任副厂长时，有个工艺他安排下去，车间的工人们都说做不来，他二话没说，下到车间当着工人们的面，自己做了一遍，工人们全不言语了！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的政治秩序步入正轨，经济建设也逐渐提速，企业的规章制度慢慢健全起来。当时给成都市冶金局配置一名副局长，组织部门经过层层筛选、把关，朱永明从成都地区的16万高科技人才中脱颖而出，一举成功。其时他的工作业绩是突出的，组织才能是优秀的，人品德性是上乘的。

从负责一个企业的生产到负责一个大系统的生产，这里面当然有着许多的必然联系，但对其指挥者来讲，驾驭能力要更强，组织才能要更高，实干精神要更出色。这些，朱永明都做到了。他曾在成都市全面整顿企业秩序的过程中在钢厂蹲点，除深入一线整顿领导班子、组织生产秩序外，还带领技术人员，对该厂的炼钢工艺进行了改造。通过七天七夜不合眼的奋战，凭富平人独有的肯吃苦、坚韧不拔的毅力，终于获得了自动炼钢工艺的大突破！这在当时简直取得了轰动效应，工人们对他更是佩服。国家冶金系统在成都召开经验总结会，在全国推广了他们的做法。

朱永明自己讲：冶金局三年，对他的一生是重要的。这三年他从一个具体负责生产的厂长、成为一个统帅大



1993年在深圳招商会致词

系统的领导,其过程是非常宝贵的。这三年,使他从具体生产、工艺等的小圈子里跳了出来,更多的是组织、是谋划、是指挥、是出主意、是定政策……是带领几十万人的大企业走科学、稳健、健康发展的道路!

1983年,朱永明被破格提拔为成都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当时他的年龄只有40多岁,在班子里最年轻。班子中的其他成员,基本上是老革命。四川当时又被定为全国改革的试点,侧重又是工业,这对于年轻的朱永明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他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而是认真学习,积极工作,在这个舞台上唱出了一幕精彩的大活剧:他排除了大计划经济下人们的陈腐观念和习惯势力,明确地提出了“三借一联”的发展思路(借机遇、借智力、借资金;联合沿海和发达地区),这在上世纪的80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和外资、发达地区之间的共同发展过程

中,他明确地提出了领导干部要高明,不要精明,要看长远,不要看眼前的观点,要求各级领导一定要作好先吃点亏的思想准备。他告诉记者,在当今,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要站得高,看得远。要把着眼点放在引进一个项目,新修一条致富路上。把握好机遇(借对方智力、资金)发展壮大本地的经济。他笑着说了成都在引进世界排名第三位的法国拉法基水泥建材集团在成都建分厂的事。这个分厂的成功引进,起初只是满足了对方老总的爱好。那是他当常务副市长后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法国拉发基集团董事长在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天府之国成都访问,市上让他负责接待。陪洋老总旅游观光完了成都的各主要景点,临离别时,才得知这位洋老总对成都的麻将文化及跳舞娱乐颇感兴趣。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朱永明说,自己很传统,为了拉住法国这位洋老总,在半年内自己学会了打麻将和跳舞,然后二次赴法国,诚心热情地邀请,终于感动了这位法国洋老总,不久他就重返成都,在洋老总快乐有趣的活动中,他决定了利用成都丰富的建材资源,投资14亿资金建年产150万吨的水泥生产线。两年后,法国拉发基集团成都分厂建成,每年给市上缴利税上亿元。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他有特别明晰的工作思路,总是能把上级精神与当地的情况结合起来,找到最佳的切入点;他有富平人特有的吃苦精神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顽强毅力,他在任成都5年副市长和10年常务副市长期间,竟然没有请过一天事假和病假,他的身体现在仍非常

棒。凭着这种工作态度,凭着这种惊人的毅力,他干出了一件件让人惊叹的成绩:

连续 10 年成都市的工业产值平均递增 17.8%, 经济实力和 GDP 在全国排在 5-6 位之间;

在全市市级干部的测评中得票率均是最高;

他两去日本,20 多次赴京,用了 8 年时间和日本谈判,终于使日本的丰田汽车在四川落了户,现年产值 30 个亿,利税 3 个亿;

引进香港富豪李嘉诚近 5 个亿,在成都市合资建起了五星级酒店——喜来登大酒店……

他还对乡党讲,成都是一个开明的城市。在这里只要有本事,是不分地域的,而是广泛纳才,都有用武之地。他讲,从解放以来,成都市政府的一把手没有一位是当地人,都是全国各地从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到成都工作的优秀人才……

如今,在成都和家乡,人们都认为朱永明成功了,但他没有丝毫的成功感。都认为他为成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他却说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他对待遇从不争究。他告诉我们: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能干到如今的样子,房子是国家分的,每天有小汽车坐,已知足了!他在职 15 年,从不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关系为家人谋取私利,如今他的妻子还在私企打工,两个儿子都是凭自己的本事打天地,都是自由职业者。但他对老乡的事却很关心,他曾把全国有名的希望集团推荐到富平考察,试图建厂。成都市有几百名陕西籍的转业军人,在安排工作时他都尽量予以照顾帮

助,他告诉我们,他唯一的缺憾就是对家乡了解不够,对家乡的经济建设帮助不够。如今若家乡建设需要,他也会尽心牵线搭桥的。说起当年的顺阳河、温泉河,还头头是道;结束采访时,他要我们采访组转达他对家乡人民的问候,并祝家乡的经济建设快速发展!

名人档案

朱永明,1939年生,我县华朱乡人。1960年迤山中学毕业,考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196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重庆102钢厂,后调至成都钢厂。曾先后任技术员、车间副主任、主任、副厂长,1980年任成都市冶金局副局长,1983年任成都市副市长(主管工业),后任成都市常务副市长10年,为成都市的工业发展,经济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现担任成都国有资产开发集团董事长,享受副省待遇。

航天战线一老兵

北京航天指控中心原政委赵武进军旅生活扫描
本报记者 由保民 井来成 张更祥 党延兴



赵武进(右三)陪同江总书记视察

我们把时间的钟声回放到 1999 年 11 月 21 日,人们怎能忘记,这是一个值得中华民族骄傲和纪念的日子。我国第一艘宇宙飞船“神州一号”发射成功。一时间,举国上下,沉浸在欢庆的喜悦之中。可你是否知道,就在这扬国威,壮军魂,振民心,鼓士气的惊天地的事业中,富平一些乡党也为此默默作出了奉献。北京航天指控中心原政委赵武进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发展给人们留下了令人追忆的怀念。

1963 年,赵武进从美原中学毕业,响应祖国的召唤,

光荣入伍。一个热血男儿，怀着服役当兵，报效祖国的宏图大志，胸戴大红花，在乡亲们千托万嘱的欢送下，离开当时的老庙公社兰山大队。到县城集结后，从关中平原直发青海。从那时至今，37个春秋，随着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步伐，他转战南北，经受了青藏高原的疾风劲草，鏖战于甘肃、新疆的戈壁大漠；跨越了云南的大山深沟，历经风霜雪雨，磨炼意志；参加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守护祖国西南边防。在长期的军旅生活和戎马生涯中，他多次目睹了火箭、卫星发射成功的喜悦；直接体验了第一艘宇宙飞船发射成功的壮举。这些，从他当战士到任师级政委，一步步，一次次，都始终一个劲地、毫不懈怠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向祖国、向人民默默奉献。

1981年初，他随部队从云南到北京，后被调到国防科委司令部机关搞组织人事工作。其间十多年，对工作一



李鹏委员长接见赵武进

直认真负责,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精益求精,慎之又慎”等十六字工作方针,从小事做起,培养作风,每件事,都一丝不苟地精心办理,受到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的好评。

1992年,国家“神舟号”载人飞船工程启动。这时,他已在国防科工委指挥所任政委(后整编为航天指控中心),他作为党委书记,团结党委一班人,带领全体官兵,按照江泽民总书记“分秒不差,万无一失”的指示,争分夺秒,顽强拼搏,加强训练,刻苦攻关,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建起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航天指控中心,于1999年11月,一举圆满顺利地完成了第一艘宇宙飞船飞行指挥控制任务,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的奇迹。当“神舟一号”飞船顺利返回时,他和北京航天城指控大厅的战友们兴奋极了,一双双饱含激动泪水的眼睛,紧紧盯着荧光大屏幕,一颗颗跳动的心,情不自禁地默喊:“我们成功了!”“我们胜利了!”

宇宙飞船工程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牵动着几百个单位和数十万人协调地工作。在诸多的系统里,他们指控中心承担着对飞船的指挥、测量、控制任务,通过卫星和计算机网络联系着遍布于陆地和海洋上数十个测控站。当飞船在酒泉发射阵地升空后,在太空运行及安全返回的控制工作都由“中心”来完成。为完成这一史无前例的高技术、高难度任务,赵武进政委在班子建设、干部配备、宣传教育、技术训练等方面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神舟号”飞船“万无一失”上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宇宙飞船工程是“九五”期间国家的重点工程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非常重视，非常关心。1998年11月，江泽民、李鹏、朱基、李岚清等中央领导，莅临航天城进行视察，并对我国航天事业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使赵政委和部队官兵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有力地推动了飞船上天各项准备工作的进程。

“神舟一号”宇宙飞船上天后，按预定的时间、预定的地点，“分秒不差”的在内蒙古草原返回地面。当“返回舱”回到北京后，江泽民、胡锦涛、张万年、迟浩田等中央军委首长又一次来到航天城，亲切接见了参加宇宙飞船发射的有功人员。幸福的会见，赵武进同志百感交集：“报效祖国的崇高理想，今天终于实现了。三十七年的兵，我没白当，父老乡亲们的嘱咐和期望，我没辜负。”时隔不久，他又作为总装备部的代表，与航天科技集团的领导一起飞

往香港。当 2000 年第一声钟敲响的时刻,他们在香港赛马场举行的隆重庆祝活动中,把“神舟一号”飞船上搭载的港旗、港徽送给了特首董建华,受到港人的热烈欢迎。

我国的宇宙飞船发射成功,“航天指控中心”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央军委特为他们荣记了“集体二等功”。据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和平建设时期第一个荣获这种荣誉的正师级单位。他作为指控中心的一名主要领导,功在其中,倍感光荣。

发射宇宙飞船,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综合技术水平。从发射第一艘宇宙飞船到今年 3 月,我国已相继成功地发射了三艘宇宙飞船。目前,世界上能制造、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只有三个国家,那就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当我们为此而感到荣耀和自豪时,可不要忘了乡党



赵武进(右)与军委副主席迟浩田握手

赵武进同志；当我们提及发射宇宙飞船的辉煌时，更该伸出大拇指，向赵武进喊一声：“OK”！

名人档案

赵武进，1944年6月生，男、汉族，富平县老庙镇兰山村李家组人。大专文化程度，中共党员。

1951年9月——1963年7月分别在老庙小学、美原中学初中、高中上学；1963年8月——1981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7986部队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连副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党委书记；团政治处副主任、党支部书记；1981年11月——1991年10月在解放军国防科工委司令部直政部组干处任副处长、处长；1991年12月——1996年1月在国防科工委指挥所任政委（副师级）、党委书记；1996年2月——1999年12月在总装备部航天指挥控制中心任政委（正师级）、党委书记；2000年1月光荣退休。

望星提剑守边关

——访成都军区联勤部参谋长冯长德

本报记者 张更祥 由保民



冯长德近照

很早就听说过冯长德，只知道他是一个大军官，在富平留有许多佳话，一直没机会谋面。今年八月份，我们报道组专程赴成都，采访在大西南工作的乡党，有幸见到了他。

他是成都军区联勤部的参谋长，正师级干部。我们想象中，他肯定非常威严，非常严谨。其实错了，他中等个

儿,五官端正,简直有点儿俊秀,白净的面孔看上去很是随和,动不动就说几句玩笑话,我们的拘谨也就随之烟消云散。简直看不出他是50多岁的人,说起老家的情况,他侃侃而谈,时不时加几句家乡话,惹得我们哈哈大笑。他是标准的儒将,出过几本书呢,竟然还出过一部诗集,这更让我们惊叹不已!他是1968年2月入伍,一步步从基层干上来的,在成都军区后勤系统赫赫有名。

冯长德的童年是不幸的:早年(6岁)丧母,家中姐弟5个,他排老四,老大大他7岁。父亲既当爹,又当娘,除抓养他们一群姐弟外,还要服侍爷爷奶奶,在当时的条件下,其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兄弟的衣服,那会儿除了60多岁的奶奶胡乱凑和几件外,大多靠亲邻接



1999年11月至12月参加总后组织的赴德国培训团。到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等五国参观见学。这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钻石工厂参观。

济。他最难忘的是学生时代。每年开学前,学费十有八九凑不齐,要孩子们向老师讨情先欠上!至于



1998 年检查应急保障部队

穿的,冯长德清晰地记得,那会儿鞋最费,常常脚大拇趾把鞋头一边戳个大窟窿,跑起来不得劲,便将鞋倒个过!右脚换左脚!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冯长德学习仍然勤奋,门门课皆优秀。到高中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冯长德和姐姐同上一所学校。吃粮异常艰难。每个星期天,家里都要熬包谷稀饭,熬好后装到瓦罐里,和姐姐一块提上去上学,饭时,便把那包谷稀饭在学生灶上一热,每人分喝一碗,再吃块玉米面馍,那会儿家境好的学生还有辣子、盐,他们肯定没有,只得啃那冻得干硬干硬象铁一样的玉米面馍!

如此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培养了冯长德的坚强意志,入伍后去西藏,尽管也很艰苦,但和少年时代比,还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还有令冯长德难以忘怀的，便是文化大革命那段岁月了。那会儿他是高六六级，恰好遇上文化大革命。当时说高考推迟半年，一革开命全国都把高考丢到瓜哇国去了！尽管那场运动给国家造成了莫大的损失，但对冯长德个人讲，还是有收获的。第一，提高了他的才能，因成天写大字报，练就了一手毛笔字；因时不时的大辩论，练就了口才；第二，锤炼了意志，因串联，他和九个同学徒步上延安、过山西、经石家庄，用时 47 天，一步一步走到了北京，路上没坐过一里路的车！

高考取消了，招工没指望，冯长德便下决心当兵！实际地讲，他当时就是想改变家庭那种贫寒的状况，并没想要把事情做的多大。他外家是地主，姑家是富农，在那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年月，他是以候补身份当了兵！

是金子总会发光，是人才必有用场。

冯长德一入伍，就表现出少有的才干。那会儿讲阶级斗争。一到新兵连，写字、画画、出黑板报、出墙报、雕刻等，他都比别人在行，文化程度又高，一开始就当新兵班长。没当几个月，又调到连队当文书，后来升至后勤科副科长、科长，直至师后勤部长。

西藏的军营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有几句顺口溜，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一年一次风，从冬刮到冬。常常半年后才能收到内地的信件！部队的副食品及生活供养，全是一车车从内地运去的。那会儿部队也受“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影响，曾经挖草造田、植树造林，铺设由格尔木至拉萨的输油管线。在海拔

3000米以上的高原,冯长德一呆就是18年!他在《足迹》这部诗集中,曾形象地描述了这段经历:

当过汽车兵,造过拉萨田,插过高原柳,修过拉贡路,铺过输油管,建过水电站,喝过青稞酒,吃过糌粑面。

在西藏工作18年,冯长德的工作是出色的,提拔也是很快的。他从一个普通的汽车兵升任某师后勤部部长。1985年,他被调到成都军区,历任后勤司令部战勤处处长、军区审计局副局长、后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

部队后勤部是个非常重要的机关,而工作却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用参谋长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做到:人要有粮车要有油、枪炮要有弹,要拉得回(伤员)、开得动(机械设备)、送得上。他在军区一呆又是18年,经历了“百万大裁军”、“老山战斗”、“拉萨戒严”、“百团审计”等多次大的事件,特别是1986年6月至12月的老山半年轮战,冯长德时任成都军区云南前线后勤部战勤处处长,他多次带领部队从敌占区穿过,为前线送去了粮草弹药。86年7月下旬,前线突降特大暴雨,公路被毁、工事被毁、“猫儿洞”被灌!他积极组织后勤部队,并巧妙地选择路线,将给养送了上去。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因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

在成都军区工作中,由于长期从事综合协调部门工作,冯长德对大西南的军、政、民情况了如指掌,又有部队和机关的任职经历,他的指挥组织能力充分地表现出来,多次出色地完成了部队的后勤保障任务。他有魄力、能吃苦,工作预见性、计划性强,善于把握工作中的难点

问题,处理棘手问题的方式方法得当。他作风扎实,走遍了全区所有团以下单位和滇、藏大部分边防一线连队,掌握了战区后勤建设的第一手材料,提出了许多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关于西藏战场后勤建设的观点和建议均被总部和军委采纳。在理论研究方面,他坚持在实际工作中搞研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先后在《解放军报》、《军事学术》、《军事展望》、《后勤学术》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关于司令部建设、联勤保障等方面的论述先后被《中国当代国防文库》、《中国当代军事文库》收录,多次获总部、军区学术研究成果奖。主持编纂了“九五”国家国民经济动员软科学研究课题——《国防需求论》。主编《西藏方向作战后勤保障》、《边境反击战战勤保障》等书,分获全军“八五”学术研究优秀奖和三等奖;主编《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后勤保障丛书》、《中印边境战区联合反击战役后勤保障研究》,分获“九五”全军后勤学术研究一等奖、特等奖。

冯参谋长对家乡的感情是纯真的。他回到家乡更是念念不忘家乡的这里和那里。驱车到了庄里镇、宫里、流曲、王寮、华朱乡,又徒步走了富平老城,每到一处,他都有追忆不完的情怀,家乡的一切让他难忘!采访期间,不时向我们询问家乡的建设情况。他告诉我们:他永远忘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忘不了家乡的亲朋学友……

名人档案

冯长德,男,1947年生,富平县觅子乡人。1968年入伍,先后干过驾驶员、秘书,任过后勤科副科长、科长、师后勤部部长等职,现任成都军区联勤部(即后勤部)参谋长,大校军衔。曾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校、国防大学学习。先后在西藏、成都工作各18年。著有《审计生涯一千天》、《探索与实践》、《难忘的经历》、《足迹》等作品。主编有《西藏方向作战后勤保障》、《国防需求论》、《辛勤耕耘、努力探索》等书。多次组织西南战区后勤保障等重大理论课题研究。先后在《解放军报》、《高原战士报》、《军事学术》、《后勤学术》、《军事经济研究》、《后勤》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多次获总部、军区学术研究成果奖。

走访陈双全

本报记者 山保民 李印功 张更祥 党延兴

古城西安的7月，骄阳似火！我们采访组在陕西高速集团总部，采访了乡党陈双全， he 现在是陕西高速集团公司董事长，而听到他的名字，则是十多年前他在铜川的时候。

陈董很健谈，古今中外、名人轶事，说起来滔滔不绝，妙趣横生；现今政策、家乡建设，他讲起来更是入木三分，如数家珍！他身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官”气，那么随和，那么风趣，很难把他和“几年前的铜川市市长”联系起来，当我们说明意图，想请他说说自己的“英雄业绩”时，他爽朗地笑了：“你们想让我当段子中的河南人？”他告诉我们：你们做的事情很好，出门在外的游子，向家乡父老汇报汇



陈双全兴致勃勃地看《富平报》

报很正常,鼓鼓老百姓的士气,教育教育下一代,把家乡的事情搞好,很有意义,但要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陈双全 1970 年西安交大毕业后就去了铜川。当时的铜川,在国家主要发展重工业、建立基础工业体系的情况下,重工业得到了很快发展,形成了以煤炭和建材为主要产业体系的重工业城市格局。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既很不完善,又欠账太多,当陈双全放下他那满是尘土的行囊时,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将来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决策者。谁知,时过境迁,却偏偏让他放弃专业从了政,而他的智慧和激情,又把他推向了领导岗位,命运注定了他人生厚厚的几页,将书写在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大地上……

从政前,他曾在铜川市整流变压器厂工作,历任科长、副厂长等职;1983 年任铜川市城区区委副书记、区长;1986 年任铜川市建委主任,1988 年当选为铜川市副市长。1996 年 4 月,在铜川市政府的换届选举上,时任常务副市长的他一举当选为市长!

此时,在他脸上表现出的不是喜悦,而是凝重。他太了解这座城市了:从每条山沟到每个煤矿,从每条河流到每个小巷……他光与城建就打了十年的交道!他清楚,这个城市的市长绝不好当,这个城市遗留的问题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有政策的,也有人为的;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他象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十年的“把脉”足以让他了解铜川的关键之所在,此时的凝重,是对这些问题的清楚认识,更是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坚定信心!

铜川这座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城市,解放以来,因政策原因,一直走的是一条重产出、轻环保,重经济、轻城建的道路,是有名的“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

要让铜川重见蓝天!

要为铜川拓宽新的发展空间!

陈双全一上任,就把这两条信念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心田。信念是重要的,但仅有信念是远远不够的。

陈双全是善于抓大事的人。全市工作千头万绪,他最善于抓大事。所谓大事,就是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围绕自己的信念,一步步,一件件向目标进军!1996年5月8日,才上任10天的陈双全,就签发了关闭市区所有煤台的通告。到年底,严重影响市区环境的11座重污染源全部搬迁,铜川人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看见了蓝蓝的天,看见了洁白的云。

上任伊始,他便要求政府各部门每年要干一件在全市有轰动效应的大事,而且规定,政府领导不指点,各部门自己报,先由有关部门初步筛选,不合格的打回去重来,然后由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最后在新闻媒体上公布,让老百姓去评议。仅1997年一年,全市62个单位就确定了183件大事,市政府确定了12件大事,并逐项付诸了实施。

作为市长,他深知:靠自己一个人,全身是铁也打不出多少钉子!他对政府系列单位尽量压担子。他通过抓大事,启发、鼓励、动员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要开动脑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地分析各自的工作和面临的问

题,从而抓住最重要、最紧迫的事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这一举措,把大多数干部逼上了干实事这条路。使人人有压力,个个都负重,同时还建立了政务工作第一责任人制度,坚持马上办理和限期办理制度,公务员挂牌上岗,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铜川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各类经营者先后在市区建成了11个储售转运场——俗称“煤台”。往来于煤台的运煤车,常年行驶在市区主要干道上,四季尘土飞扬,煤灰遮天,给城市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污染。以致于在久旱不雨时看不见绿色的树,因树叶全是黑的,人们穿着白衣出门,上趟街回来便成灰色。要拆除这些“煤台”,谈何容易?一是这里边有着丰厚的利润,二是这“煤台”牵涉的关系太复杂!面对这一棘手问题,陈双全毫无畏惧。他带领新一届领导班子,采用疏导的方式,一举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们一方面签发关闭“煤台”的通告,另一方面加强黄堡新煤台的建设,这样一来就让新煤台的经营者既搬得出又安得稳。事后他谈起这事儿还感慨万千:“有人说环境好了,大家就没饭吃。我们是要造成一种趋势,既要环境好,又要人人有饭吃。这样,才能达到真正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目的!”陈双全勇于把自己的工作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这既是我党的一贯工作作风,也是领导者的胆识。在“煤台”搬迁后,市政府在全市搞了一次民意测验,赞成的达95%!这说明了老百姓对政府的工作是肯定的,也说明政府的工作干在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象这样抓矛盾的主要方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事

例还很多：如下决心搬迁耀县至市区 210 国道几十公里两侧的小砖瓦窑、石灰窑；大面积进行城市旧城改造；大手笔改造城市道路，狠抓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等等，每一项工程的完成都给铜川带来勃勃生机。

在铜川新区的建设上，陈双全在设计启动初期，就将新区定为一个高标准、高起点的城市：他亲自兼任新区管委会主任，城市所到之处，便有百米宽的绿地紧紧相随，大楼崛起之时，便有精心设计的绿地悄然兴起；城市居住小区建成之后，便掩映在绿地和林木之中。他还在新区筹建百亩牡丹园、百亩菊花园、百亩柿子园等，使新区成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城市。

陈双全是自信的，对工作积极的。他有一句名言：事业就是乐趣。知识的渊博、观察的敏锐、判断的准确、调动一班人积极性的能力，他皆属上乘。在新区建设初期，他大胆地提出了“统一规划，分散实施；政府资助，农民种植；自主经营，收益归己；政策支持，措施保证”的工作思路，彻底解决了围绕有关部门的征地、管护等诸多问题，给初建工作带来了新气象。

为给铜川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创造条件与机会，陈双全在任期间，经多方争取，该市被列入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确定的中国 21 世纪议程试点的 8 个城市之一，又被该组织列入支持中国地方 21 世纪议程能力建设的 3 个试点城市之一；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他根据铜川的实际，确定了“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国有资本退出一般竞争领域的步伐，使所有制结构得到优化调整，完成经济结

构调整补课任务。大力发展农业、服务业,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立足于传统产业优势,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以科技进步改造传统产业,大力进行产品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善企业组织结构”的发展方略,使铜川的经济结构更趋合理,更趋科学。在绿化方面,他在建委当主任时就非常重视,任市长后,他更是重视和支持,他不但在市区周围创造性地开展了绿色屏障工程,使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31.5%,而且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539.8 平方公里,全市森林面积达到 146.6 万亩,1999 年他本人则荣获了全国绿化奖章。

一个领导者,重要的在于出点子和使用干部,陈双全在这两方面绝对是优秀的。他每时每刻,都在用他的一言一行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他那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正确认识,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对市民真正所需的敏锐观察,那种要尽快改变铜川现状的决心,使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辐射和震颤。他又是那么朴实随和,不时发出幽默的笑声。

2001 年,组织上调陈双全担任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董事长。一上任,他充分调查了集团的情况后,凭着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在紧紧围绕建设西部经济强省目标之外,进一步完善发展思路,依托高速公路,延长产业链条,很快使企业迈出了发展的新步伐。目前陕西高速集团在建的西安到咸阳机场、阎良至禹门口、户县至洋县、洋县至勉县、黄陵至延安高速公路共 5 个项目,建设规模约 600KM,工程总投资 270 亿元,各个项目工程建设均非常

顺利。在此基础上,陈董事长强调:我们要树立大经营理念,坚持依托高速公路主业,加大经营开发力度,是陕西高速集团谋求发展壮大的又一重要途径。他瞄准商机,明确提出“坚持以路为主,多元发展,延伸产业链,培育增长点,拓展集团发展”的经营方针,给经营开发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领域。以陕西高速交通工贸有限公司、陕西高速公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为龙头的近十个经营子公司通过改组合作,转换机制,充分运用主导产业的资源优势,致力于交通工程、咨询监理、绿化、广告、服务区经营等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业绩,逐步走向规模化、专业化的方向。

高速公路建设虽然对陈双全来说相对不很熟悉,但他是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他又有着非常强的适应能力。仅仅一年多时间,在他的领导下,陕西高速集团不但在主业方面成绩显著,而且在多元开发方面也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我们相信:陕西高速集团,在陈双全的带领下,会一步步走向辉煌!

名人档案

陈双全,男,1946年5月出生。陕西省富平县东上官乡人。197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学历,曾在铜川市整流变压器厂工作,历任科长、副厂长等职。1983年任铜川市城区区委副书记、区长;1986年任铜川市建委主任;1988年当选为铜川市副市长;1996年任铜川市市长;2001年任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平淡尽心写人生

——访省委老干部工作局局长刘世文

本报记者 井来成 由保民 张更祥



刘世文同志是华朱乡旧县村人，在人生的追求中，他由农村到城市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了人生价值。

见了乡党，他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还拿出家乡的酥梨，毫无领导的架子。我们向他说明来意，他微笑着婉言谢绝：“我现在将要退下来，干不了多长时间，也没干下啥成绩，向家乡人民也没啥汇报，宣传我的啥呀？”他真的就没有可宣传的地方吗？从一个记工员到党的领导干部，这其本身就奥妙无穷！于是我们就此和他攀谈起来。

记者：你如何从农村走进省委大院，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世文：我是农村生、农村长，地地道道的农民娃。对农村的感情很深，农民勤劳俭朴，诚实善良的优秀品质也深深印在我心里。我读完初中后回农村当了一名记工员。当时，我父亲对我说：“娃呀！工分是社员用汗水挣来的，可要给人家记好，不敢马虎。”父亲的这句话对我的印象很深，至今我仍牢牢地记在脑海里。做事“不敢马虎”，成了我以后工作的左右铭，使我养成了勤奋好学，精心工作的习惯。由于我对工作认真负责，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大家就把我由记工员推上会计岗位。干了没几年，就被选拔到当时的华朱公社当了一名半脱产的水利水保员，这是1965年的事。就在这年的12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夏收前又被调到留古公社任党委文书，一干就是5年。以后被调进县革委会政工组，县委恢复后，我到组织部干部组当组长。当时我年轻，为搞好工作，我便时时处处注意向老干部学习，学习他们的好思想、好作

风、好经验。除此，自己在工作之余，就抓紧看书学习，练习钢笔字和毛笔字，当时一些人都说我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其实不咋样。1977年，我被选拔到省委组织部工作，一干又是十多年。十多年间，我对工作从不懈怠，而且大都做到了极致，那怕是一页纸的事，我都尽心去做，从不马虎。1983年，我开始攻读大专学历，自学党政干部专业，拼搏了三年，顺利地通过了12门课程的过关考试。学完大专课程，我对搞党政干部工作就较前自如多了。在业余时间，我还撰写一些论文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其中一篇论文，题为《注意发挥领导班子的整体效应》，在报纸发表后，被选人开拓者《论文精粹》一书。这里，我感受最深的是“勤奋”二字，“勤能补拙”，“天道酬勤”。勤奋是一对孪生兄弟，人勤了，就会奋发向上，越奋发向上，人就越勤，就会在工作上形成良性循环，不断促人进步、向前。

记者：你如何看待干部竞争上岗，在竞争中，你的选择是什么？

刘世文：在干部工作岗位上，竞争是很激烈的，而且



青心

刘世文书
壬午年

竞争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我权衡自己的情况,选择的是事业和工作,我觉得,作为一个干部,不但要干在前,而且要认真干好自己所担负的那一部分工作,这就称其为干部。否则,就不称其为干部。这是我对“干部”这一名词的理解。基于这种理解,我便在自己的岗位上,除认真干好工作外,还非常注意干部的形象。根据自己的特点,我订了两条原则:“善言谈不失尊严,善交往不失原则”。不管什么地方、什么场合,我都用这两条原则提醒自己,约束自己。从而维护了自己的形象和干部的形象。

记者:你在组织部门工作多年,你对官品和人品有何看法?

刘世文:组织部门是各级党委管理、教育干部,为党培养、选拔干部的重要部门。任用干部的原则是“任人唯贤”。所谓贤者,就是德才兼备。要当个好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首先要学会做人,这就是“人品”。“人品”决定“官品”,二者之间应成正比关系。官品越高,人品也应越高。人品不行,官品再高,最终还是要被社会淘汰,被人民唾弃。成克杰、胡长清之流就是例证。从这一点看,官品就是人品。要有好的人品,就得注重自身修养,不断增强自律意识,时时检点自己的行为,注意自己的形象,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记者:你当领导干部多年,你对“权威”的体会是什么?

刘世文:对领导干部而言,“权威”有着双重意义。一是正式权威,这就是组织任命或群众推选的领导岗位。你

处在这个岗位上,你就拥有权威。这是权威的一个方面。二是非正式权威,这就是一个领导者的德、才、能。这是权威很重要的内涵。领导的德性、才干、能力都很好,下属和周围的群众就尊敬你、爱你、佩服你。相反你的正式权威也施展不起来。一个领导者,只有下属和群众既怕你(正式权威)又尊你、爱你(非正式权威),那么这个领导的权威才是全面的、真正的,这才称得上一个好领导。人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认为这是清官没有处理好“权威”二字,你在家里放不下官架子,使用正式权威,谁服你?你若使用非正式权威,平等待人,公平处事,且能讲究策略和方法,我就不信把家务事处理不好。拿我家里事来说,从无“难断”之感,我都处理得很和顺,“权威”在家庭能运用好,在机关、在单位才能运用得更好。

记者:你在工作中遇到失意或坎坷,是如何对待的?

刘世文:人的一生总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或一些不顺心的事,在工作上也是一样。我所走过的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如果遇到一些失意坎坷之事,我总是抱着一颗平常的心,冷静地去思考,正确的去对待,调整心态,作出明智的选择,始终不能失态。让自己的



心情有一个自由放飞的余地。这样就会很快使自己的心态得到调节,使自己保持一个好心情。不是有句“知足常乐”的话吗?有了好的心情,你就会感到满足,感到快乐,就会在自己的岗位上自发地把工作干好,将失意化解为满意,将坎坷踏平成大道。将一切有损工作、有损身心健康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记者:你接近退休年龄,你现在是否作好退休的准备?

刘世文:退休,这是人生规律,到了年龄,组织上让你退下来休息,你就得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只要身体好,还可另谋你喜欢的事。这一点,我一如既往,保持一颗平常心,从思想上、精神上都有了准备。但在工作上,还是不敢马虎,还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认为,在岗位上,你是一名领导干部,退下来,你就是一位普通公民,回到家里,你便是一个家庭成员。我的身体还好,退休后我还要坚持练习我喜爱的书法,再读点书,养些花,搞点盆景,美化环境,如果条件允许,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服务工作。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我相信,只要保持一颗平常心,退休后,我的生活将会更加单纯,我将活得更从容,更自如!

.....

拉开话题,和刘世文同志一谈就是三个多小时,快到下班时间,我们只好把话题打住。但给人的感觉是意犹未尽。平心而论,老刘其所以能把事干到今天这个程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勤奋好学,

尽心工作。年轻时,他虚心向老干部学习,以良好的心态做工作,实现了工作岗位上的跨越;今天,他虽比过去年老,但仍向老干部学习,并热诚为老干部服务。凡了解刘世文的人,几乎都会发出同一赞叹:

老刘,真不容易!

老刘,永远年轻!

名人档案

刘世文,男,汉族,1943年7月生,富平县华朱乡旧县村人,1965年12月入党,大专文化程度。现任中共陕西省委老干部工作局局长。

1965年初中毕业后,回村任生产队记工员、会计;1965年11月—1966年5月在华朱公社任半脱产水利水保员;1966年5月—1970年10月任留古公社党委文书;1970年10月—1977年11月,先后在富平县革委会政工组、办事组,县委办公室、审干办公室、组织部任秘书、干事、组长等职;1977年11月—1984年12月,在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党政干部处、干部调配处任干事;1984年12月—1986年7月,在省委组织部干部调配处任副处级巡视员;1986年7月—1991年11月在省委组织部任副处长、正处级调研员;1991年11月—1993年10月任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并主持工作;1993年10月至今任省委老干局局长。

干部教育树业绩

——记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兰友仁

本报记者 张更祥 由保民



兰友仁同志工作照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在陕南工作的兰友仁被安排到省委党校任副校长,后任校长、常务副校长(校长由省委书记兼),主持全面工作。

省委党校是个老党校,建校历史长 教职员工多,仅离退休人员就达 200 多人,包袱大。兰友仁和班子成员的担子并不轻松,但他们却毫不气馁。在这期间,中央先后于 1995 年和 2000 年颁发了《党校工作暂行条例》、《关于面向 21 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两个重要文件,省委紧接着下发了两个《实施意见》,这一切都充分表明,

中央和省委对党校干部教育工作是非常重视的。而如何贯彻好中央和省委精神,对他来说既是巨大的压力,又是严峻的挑战,更是重大的责任。他带领班子成员与全校教职工一起,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党校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从党校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以及西部大开发和陕西大发展、建设西部经济强省目标的历史机遇出发,把为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提供充分的干部资源和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作为工作的大局和着力点,建设干部摇篮不放松,努力发挥党校“三个阵地、一个熔炉”和干部培训轮训“主渠道”作用,以教学科研为中心,全面推动党校整体工作开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开展党校工作,兰友仁一开始,就注重团结党校校委班子成员,与党校教职工一起,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结合实际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党校干部教育方针政策,1996年提出了“政治立校、质量兴校、从严治校、勤俭办校”的工作方针;2000年提出了经过五年的努力,把党校“建设成为办学格局优化合理、职工素质全面提高、教学科研成效显著、管理体制高效协调、硬件设施实用优良的一流省级党校,成为培训轮训全省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骨干和培养较高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主渠道”的工作目标;2001年又在新的实践中提出了“在学习中明确方向、改革中焕发活力、开放中开阔眼界、稳定中增强团结、把握教学科研重点中带动整体工作、艰苦

奋斗中改善办学条件”的工作原则,使党校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不断上新水平。

对党校工作熟悉了解后,兰友仁在工作中,善于突出重点,抓领导干部培训工作不放松,使党校 1994 年以来共为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培训轮训干部 10.4 万人次,其中主体班 2974 人次,走读班 39768 人;中央党校函授学院陕西分院 61349 人。这些党员干部毕业、结业后,大都在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机关、企业、街道、乡镇、学校等不同行业任职,成为陕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一线的领导骨干和理论骨干。特别是 2000 年以来,党校把工作的着重点定位于加大干部培训尤其是中青年后备干部的培训上,着力抓了主体班次建设工作,经报请省委批准,增设了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对象为现任副厅级的正厅级后备干部;中青年干部培训二班,对象为 45 岁以下现任正县处级的副厅级后备干部;中青年干部培训三班,对象为 40 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处级干部;一年制优秀科级干部培训班,对象为年龄在 35 岁以下,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每个县(市、区)选送 1 名的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的后备干部,影响很大,效果很好。同时,党校还多次承担了省委举办的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先后就江泽民总书记“7·1”重要讲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国加入“WTO”为专题举办了三次这样的班次。目前,省委党校已形成以主体班次为重点,长短结合,脱产学习与走读、函授教育相结合的合理稳定的办学格局。

兰友仁同志始终把教学科研工作当作学校的中心工作、首位工作来抓,这几年,党校结合陕西实际,在教学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改革,先后提出了“一个中心、五个结合”和“一个中心、五个方面”的教学布局,目前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加强理论基础、开阔世界眼光、培养战略思维、提高党性修养、加快陕西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新布局基本形成。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党校定期还要召开教师备课会、教学方法研讨会;教学质量评估制度和实施方案日臻完善,去年已对70多名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了质量评估,大大促进了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近几年来,党校新编教材三十多部,比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与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新世纪共产党人党性锻炼与修养》等,其中他还亲自给多部教材作序,以推荐和推广教材的使用。目前,省委党校已将课程设置方案、教风建设方案等修订汇编成了《学科建设总揽》,对今后的教学工作必将起到指导性作用。同时,党校近几年还加强了对学员的严格的党性教育,只要学员一踏进党校大门,就要求学员要端正学习态度,明确提出学风建设要在思想上“上位”、实践中“达标”。

兰友仁认为在党校,教学是中心,科研是基础。在他的带头和参与下,党校理论研究为教学服务、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为社会实践服务已经走出了一条比较成功之路,他们结合自身实际,提出并完善了“向上攀登、向下深入”和“研究抓创新、成果抓转化”的工作思路,制定了“出精品、出人才”的科研发展战略。“九五”以来,共取得

科研成果 1557 项(他个人就独自或参与撰写文章、调研报告、著作 30 余篇部)。其中 45 项成果获得了全国性的各种奖励,24 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1996 年以来已承担国家社科规划基金课题 19 项,其中去年申报了五项国家课题,获准项目数量在全国省级党校和陕西省社科理论界均列第二位。全省党校系统理论研讨会自 1984 年以来已召开了 16 次,其中有一半是在他主持工作期间举行的。兰友仁还非常注重乡情,关心支持家乡党校事业的发展,把第九次理论研讨会放在了我县隆重举行。党校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新的主题,近年来征文数量增至近 800 篇,比他刚接手主持工作时翻了一番,而且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这项工作不仅极大的调动了全省党校系统教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而且对提高教学质量和干部素质有积极的帮助作用。另外,党校主办的《理论导刊》已连续三次成为中文中国政治类核心期刊,去年又被编入中国期刊方阵;《陕西党校报》已面向国内公开发行。图书馆馆藏书籍和资料有 40 余万册。

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学校整体办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他到省委党校后,为党校申报学位授予权做了大量工作。1993 年,省委党校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具有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权,拥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专业硕士学位授权资格,是西北地区唯一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省级党校,也是全国 8 所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省级党校之一。党校拥有硕士学位授权之后,学

位工作又不断有新进展,于1997年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资格,1999年获得了国民经济学、中共党史(含党的建设)两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资格,2001年又获得了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资格。现共有5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资格,为全省乃至全国各界培养高层次理论人才奠定了基础。截止今年,省委党校已毕业硕士生33人,其中有9人考取了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院所的博士研究生,目前在校生有59人(含今年新招20人)。

兰友仁同志认为,党校教师队伍建设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近几年来,党校把提高教师和干部队伍素质作为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和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来抓,加大了教职工队伍建设力度。他们依据全校13个一级学科、71个二级学科(其中18个为重点学科)和下属的168门基本课程,提出了关于全校教师队伍的规模结构、学术骨干的培养选拔和教学力量的合理配置等方面的总体设想。通过大幅度地增加教师培训经费,鼓励教师进修学习、挂职锻炼、出国考察等,从理论功底、知识储备、实践锻炼等多方面,提高了教师的素质。“九五”以来,共选调教师34名,其中硕士生占80%;选送30多名教师出国进修考察,3名教师挂职锻炼,26名教师到中央党校或其它高等院校进修。目前,123名教师中,有教授21人,副教授55人,其中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7人,省“三五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3人,并计划在今后5年之内,使全校

青年教师能有 80%以上取得博士、硕士学位,重点学科都能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兰友仁同志认为,党政后勤工作在学校有着重要位置,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发展。近年来党校机关党的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较好成绩,1997 年被评为市级“文明单位”,1998 年被省直机关工委表彰,1999 年被评为省级“文明机关”;后勤建设取得了新进展,党校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多方筹集资金建成了中央党校远程教学 A 级接收站,完成了校园信息网络建设第一期工程,装修改造了学术报告厅、电教中心、多媒体教室、大礼堂。处级以上学员住宿实现了单人单间,室内活动场所都配备了空调。为职工建成了 5 栋住宅楼,新建了浴池和单身职工宿舍楼。省上投资 3000 万元建设的 8667 平米的领导干部读书楼即将竣工使用。教职员工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水、电、暖、气问题在他手里基本得到了解决,保证了全校工作的正常运转;再还有,近几年对市县党校业务指导工作有了新的突破,省、市、县三级党校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党校影响越来越大。他们还与美国乔治亚大学和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岷港分院建立了友好关系,加强了校际合作与学术交流。

眼下,兰友仁与全体教职员工,深入学习贯彻江总书记“7·1”和“5·3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实践“三个代表”要求;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发〔2000〕10 号文件精神和党的干部教育方针;坚定不移地

按照中央的要求,从严治校,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作,从教学上、理论上、政治氛围上为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做准备。

名人档案

兰友仁,汉族,1943年农历9月21日出生于富平县淡村乡西蟠龙仁西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受到艰苦环境的磨练,自强不息,勤奋好学,1963年9月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1965年被评为兰州大学学生标兵,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大学毕业。曾在陕西省白水县、石泉县、安康地委工作,1992年任省委党校副校长、常务副校长至今。

党益民和他的力作《喧嚣荒塬》

本报记者 由保民 张更祥 李印功 党延兴



党益民近照

党益民，富平县老庙镇人。1981年高中毕业后入伍，在部队一干就是20多年。他有富平人勤劳、聪明的优点，又有一种顽强拼搏、永不服输的精神。20多年来，他30次上西藏，从一个普通战士升为宣传处长(正县级)，更为可贵的是，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发表了许多作品，出了几部小说，

报告文学曾几次在全国获奖。当本报记者赴京采访时，他的《喧嚣荒塬》样书刚好印出，下面就是对他的采访。

记者：能说说你上学时的情况吗？

党益民：我高81级，是在美原中学上的。当时我就喜欢写作文，记得教我语文的是马可闻老师，有一年植树节，马老师布置了写栽树的作文，我写了篇散文，题目是“让我们的心变绿地”，马老师给了很高的评价！学生时代，老师的一次表扬，就可能成就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数学家！这是真的。

记者：你那会儿上学苦不苦？

党益民：按说咱是农村娃，啥苦都能吃，但那会儿生

活确实苦。我上高中期间，学校有个学生灶，我每星期只吃一次菜，就是一角钱一碗的菠菜！平常就是辣子盐蘸馍。一星期背两次馍，哪儿有麦面馍？全是玉米面，冬天一冻，硬得碰牙；夏天一发毛，馍四围一层黑毛，手巾一擦，蘸上辣子盐就吃了！

记者：你能给我们说说当初当兵时的情况吗？

党益民：我82年高考差2分，老师和家里人都希望我能再补习一年，考上大学应当问题不大。可我那时一门思想当兵！我父亲当时为这还收拾了我一顿。可我就是想当兵！谁说也不动摇，家里人也没办法。当兵前最远的地方是到过富平县城，还是参加高考考试去的，当穿上军装时，我心里高兴啊！坐在火车上，我就想好了：我一定要在部队干出样子来！不干出个名堂，就是去青海的山上放羊，也不回富平！

记者：听说你以前也发表过许多文学作品，能给我们说说它们和《喧嚣荒原》有什么关系吗？

党：我92年、93年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已出过4本书，比如《戴子弹项链的女孩》、《藏光》等，但水平都比较低，我现在都不愿拿出来让人看，只有2001年发表的报告文学《川藏线上生死劫》，是我比较满意的。那是我用一星期的时间写成的，后来在2001年全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上，它竟排在报告文学的第一位，被许多刊物转载。

记者：你现在是北京武警交通指挥部的处长，担任着领导角色，应该算业余作家，你是怎样处理写作和工作的关系的？

党：这没有什么难处理的，只要肯吃苦就行了。我有一个原则：工作时间绝不写一个字的小说。创作期间，我几乎每天凌晨五点起床，写上两三个小时，然后吃饭、上班，中午从不休息，礼拜天很少出门。我到北京几年了，很多地方（旅游景点）我一次也没去过。业余写作很苦很累，你不吃苦是绝对不行的！你想比别人多一份收获，就得多一份辛苦，这很公平。我的业余写作纯粹是一种个人兴趣。我当兵20年，立了10次功，这不能说我工作没干好。

记者：你能不能说说《喧嚣荒塬》的创作动机和过程？书中有许多地名都用了富平真名，我想这绝不是无意的？

党：我很早就有个愿望，就是想给富平乡党写部书。富平是陕北和关中的交接处，历史上有许多重大事件发生。比如八路军的改编、李先念到富平、贺龙到富平，十八年年馑等等。这些事情肯定在人们心中留有很大的影响，对历史的进程起过一定的作用。还有，陕西人在外省人的心目中，是“冷娃”，其实就是性格刚毅，脾气暴躁的意思。为什么会有这种性格呢？我研究了历史上陕西人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多种民族融合的过程，其中党项人的遗传基因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多次回富平作调查，翻史料，研究风土民情，光准备工作就干了两年！写了4年，改了三遍，约40多万字。

记者：你认为一部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你的《喧嚣荒塬》是不是部好作品，或者就是你最好的作品。

党：一部好的作品首先要好看，再高一个层次，就是要耐看。我的小说是不是好作品这要让读者去说，我不好

说。我说好，人家会说我王婆卖瓜，我说不好人家又会说我缺乏自信。《喧嚣荒原》故事性比较强，比较粗犷和野性，如果能拍成电视可能会更好看。我以前也写过几本小书，当时觉得满意，后来就越来越不满意了。这本书也是这样，现在觉着满意，过几年肯定又感觉不满意了。我认为，我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

记者：您出生在六十年代，写您没经历过的解放前长达半个世纪这么一部书，创作起来一定感到很困难。

党：想像是文学的翅膀。写自己没有经历的事情想像空间大，更富有挑战性。小说只是一个载体，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承载了什么。当然，写这样的题材比现实题材难度要大得多，一方面有许多东西要学习，要研究；另一方面已经有许多人写过那段历史，有些作品还相当成功，想超越十分困难。所以，有些朋友说我不明智，在选材上先吃了亏。但我就想写这么一部书，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创作



党益民(左)在陶艺村参观时和董事长徐都锋亲切交谈。

冲动。创作前的准备工作比较费时费力，一旦写起来就轻松自然了。十多年前，我就想写这么一部书了，动因是我对我们家族历史和命运的兴趣。小时候常听父亲说，我们家原来是名门望族，出过进士和朝廷命官，进入二十世纪后才一路衰败，解放前穷到了最底层，最后被定为贫农。村里说，家族的衰败是从祖父手里开始的。祖父抽大烟，卖地给人，卖十亩送五亩，十几年下来就把家当踢踏光了。我始终感觉祖父不是一个败家子，而是一个大智若愚的善人，他用另一种形式保护了族人的性命。半个世纪里，我们家族从鼎盛走向衰败，而历史却从大乱走向大治，形成有趣的反差，我觉得写这样一部书很有意思。父亲说起我们家族原来如何有钱，往往会提到三件事，一是祖父有次骑马走过街市，金镮子掉在了地上也不去捡，故意让穷人拾走；再就是我们家那时开着一个很大的金矿；还有一个，别人看门用狗，而我们家却用珍贵的金丝猴。所以，这部书最初一个形象，就是那只守在大门外的孤独的金丝猴。当然，现在书里的那个莫氏家族并非我们家族的翻版，我写的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家族和那段历史。

记者：有人说《喧嚣荒墟》是一部反战、反复仇的书，也有人说它是陕西渭北地区的“清明上河图”，还有人说你写了渭北的性文化。您怎么看待这些说法？

党：这几种说法不无道理，但都不全面。一部作品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这部书我确实写得比较野、比较狠，想用批判的目光审视中国古老的复仇文化，其中以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大背景，写了一个家族两个

分支几百年的内讧和仇杀，写了人的各种被扭曲和膨胀的欲望。我的家乡关中地区是皮影最早的发源地，皮影靠艺人用几根竹签挑动着演绎许多人生的悲欢离合。其实人也和皮影一样，不同的是受自己内心看不见的欲望支配，活动在人生的舞台上。每个人心中都有只猛虎，那就是欲望。文明是牢笼，老虎一旦出笼，就会害人害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是今天你赢了，明天你很可能会输，复仇没有永远的赢家。可悲的是，人类往往会落入复仇的怪圈。雨果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战争和杀戮，带给人类的永远是灾难。至于“清明上河图”，大概是说乡土气息吧。说什么“渭北性文化”，就有些夸张了。写人的欲望不可能回避性，因为性是人最强烈的一种欲望。在性观念和性行为上，最能显现一个人的个性。在性这个问题上，我感觉把握得还可以，起码写的不俗、不脏。

记者：你书中写到了党项羌人，提到了已经从历史长河中消失了西夏等王国，你又姓党。那么，你是不是党项羌人的后裔呢？

党：我是党项人的后裔。陕西关中有三成百姓都是党项羌人的后裔。党项羌人不光姓党，陕西的李姓、刘姓、雷姓、张姓等也有党项羌人的后裔。一千年前，党项羌人在大漠中建立了西夏王国，可惜只存在了不到两百年，就被成吉思汗灭亡了。幸存的党项羌人到处流落，我的先人沿丝绸古道到了关中，也有流落到四川的，现在九寨沟还有羌寨。据说成都最早的一批居民就有党项羌人，是否属

实,我没有考证过。表面上看,西夏是被成吉思汗所灭,实际上是被自己所灭。西夏一直处在战乱中,先是和宋,后来又和辽、金发生过几十年的战争。是战争、杀戮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将西夏推向了灭亡。这与我书里所要表现的是一致的。

名人档案

党益民,男,我县老庙镇人。1981年入伍,在部队干了20多年,从一个普通战士升为宣传处长(正县级)。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发表了许多报告文学作品和小说。其中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喧嚣荒墟》影响最大,在全国文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超越——创新——实践

我省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李平安理论研究之路

本报《富平在外名人特别报道》采访组

理论研究贵在超前

1962年我国还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和发展，如何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是个关键。此时，李平安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即将毕业，撰写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家庭副业》，提倡农民搞好家庭副业，种好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搞活农村市场。导师的评语是：“本文观点正确，阐述充分，能够结合实际和争论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逻辑严密，行文流畅。”评为优秀论文。当时论文被推荐



到《光明日报》经济专刊发表,后因形势变化,批所谓“四大自由”、“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原因文章未能发表,直到1972年10月15日,才以《正确处理家庭副业和集体经济的关系》在《陕西日报》简要发表。

1978年李平安在《陕西日报》发表的《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1979年发表的《正确利用价值规律》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两篇文章,较早地提出了要充分利用价值规律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观点,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因为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和政策总是企图撇开价值来实现高速发展战略,结果导致了高速度下的低效益,最终也使得这种体制归于崩溃。同时,文章对于澄清“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谬论,肃清流毒,起了一定的作用。十余年前,竞争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并未引起理论界的重视,而李平安早在1985年发表的论文《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就提出了开展竞争的重要性。理论的生命在于创新

《李平安经济文选》和《续集》中所收录的文章,鲜明地反映了他在经济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的不断创新,反映了他对我国传统体制弊端的深刻认识和对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准确把握。例如,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他明确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实质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在国家——市场——企业的框架中,企业是基础,国家和市场都要为搞活企业服务,国家通过市场,以市场为中介来管理企业。在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问题上，他既不同意那种企图削弱甚至取消宏观调控的观点，更不同意以加强宏观调控为名来使计划体制复归的说法和作法。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难能可贵的，在我国经济学界是有影响的。在关于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理论探索和对策上，他认为搞活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转换经营机制和深化企业内部改革等，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决策参考价值。

理论研究在于指导实践

李平安发表的 200 余篇文章，使我们强烈地感触到了经济学的实践性和致用性，这是与他长期以来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入调查研究，重视现实问题研究的风格密不可分的。他曾多次承担过国家和我省有关部门的研究和调查课题，如承担陕西省政府的《关于完善国有大中型工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对策研究》，国家的《中国国



李平安在北戴河休假时留影

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研究，完成了《宝鸡卷》、《延安卷》和《富平卷》，特别是他担任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宏观组组长期间，承担的一些重要研究课题，为省委、省政府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例如，1994年负责研究的《发展陕西工业优势产业及其对策的研究报告》，省委主要领导批示：“很好。思路清楚，所提建议可供计委编制‘九五’计划及长远计划时参考。”1995年负责承担的《关于加强陕西省中观调控的建议》研究，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咨询建议很好，送计委、财政厅、省人行研究采纳”。此外，1999年负责撰写的《关于协调利益矛盾，加快榆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的对策研究》，曾上报省委、省政府，并于1999年在南宁召开的“99中国西部论坛”会上发言，受到了代表们的好评。2001年负责撰写的《入世后陕西民营企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一文，曾在北京召开的‘2001’中国西部发展论坛”会上代表陕西开放与发展促进会发言，大家反映较好。

纵观李平安几十年的理论研究不是纯粹的理论说教，而多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剖析，最后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和对策，因而既能给人以理论启发，又能对实际工作有所帮助。目前，他担任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特邀委员、陕西开放与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西安交大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发展陕西经济在继续探索和研究。

名人档案

李平安,男,1933年10月生,陕西富平美原镇人,研究员,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理论处副处长、经济研究所所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50年代末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理论教育,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形成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的好学风。1962年毕业后,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研究工作,加之本人的努力,40多年来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发表经济论文200余篇,主编、参编专著18本,获得各类研究成果奖20余项。其中,《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运行机制》一文,荣获1988年“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优秀论文证书和奖金,1989年又荣获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荣誉证书和奖金。

赵立正印象记

本报记者 由保民 张更祥 党延兴 李印功



赵立正说：家乡报纸他每期必看

我们赴京采访富平在京名人归来好多天了，北京卫戍区一师后勤部副部长赵立正，他每见乡党，嘴角总是带着笑容，那热情、认真、负责的形象很是让人感动。

北京，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历来被人向往。初次进京的人们，除了激动，还多少隐隐地存在着胆怯。但对富平人来讲，尤其是进京为县域经济发展而工作的人们，他们则没有这种顾虑。用他们的话说：咱富平在北京有人呢！我们这次在京先后 10 多天的采访活动，充分印证了这句话。这个人就是赵立正。富平人称他为“富平在京办事处名誉主任”。

是他，帮助我们在预期内顺利地完成了富平在京名

人的采访任务。

在富平出发前，我们用电话告诉赵立正部长准备采访交通部副部长胡希捷及在京的其他富平乡党的想法。赵部长说，胡部长很忙，先由他联络好了再说。过了没两天，赵部长来电话，采访的事说妥了，我们如约赴京。他前一天晚上一直忙到深夜，处理完第二天的工作，一大早就领着我们去见胡部长。

从胡部长的办公室里出来，已是午饭时分。只见赵部长在去饭店的路上，打了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进得门来，已有七八个富平乡党在那里等我们了。他一一给我们作了介绍。

打个电话，就把这么多富平乡党召集来了。他这个“富平在京办事处名誉主任”说话挺灵的。

席间，赵部长对其他乡党说，“家乡报社搞的这个活动，是想把我们游子在外奋斗经历向家乡的父老乡亲汇报一下，也想让我们为家乡的建设做些事情，我们要帮助、配合”。乡党们异口同声：“那有啥说的”，现场的气氛深深感染了我们。

每过两三天，估计我们把见了面的乡党采访完了，赵部长又通知我们，他又约好几个富平乡党准备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他的张罗下，先后有 30 多个乡党和我们相聚。

正当我们为采访顺利进行而高兴时，采访“卡壳”了。“卡”就“卡”在了赵部长自己身上。

“赵部长，这么多年来，你为家乡引进资金、争取项目，做了那么多工作，受了那么多麻烦，县上领导谁不夸？”

部门领导谁不赞？富平人民谁不知？你不让我们采访，我们回去咋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交待？”任我们说破嘴皮子，赵部长总是一句话：“我是富平人，为家乡做点事，也是应该的。”只字不谈他的情况，连一张工作照也不给。弄得我们没辙。然而，在酒席上，别的富平乡党对赵部长你一言，我一语，使我们知道了一二三。……

赵立正的人生经历，同许多在外富平乡党一样，是在苦苦地追求和艰难地奋进中逐步实现人生价值的。在学生时代，因为家里穷，没有钱，本已跨进大学门坎的他，不得不中途退学。但是，赵立正又是一个幸运儿，一个偶然的机，他被接兵的军官一眼看中，顺利地穿上了军装，来到军营。在部队这所熔炉里，赵立正和千千万万个军人一样，当士兵，他的军容训练都是一流的，正因为如此，他



执行公务中的赵立正

入了党,提了干,又当了领导干部。其中每前进一步,都倾注了许多努力。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赵立正就是我们富平男儿在军旅中的“状元”。

坐飞机,搭火车进京办事,在近几年来,富平人真可谓是一茬接一茬,是常有的事。一到北京,不论白天或是晚上,大凡只要给赵部长打个电话,他会立刻抽出时间找辆车接,解决吃住,领上乡党们跑这里,到那里找熟人,受麻烦受苦累,顾不上休息是常有的事,他对乡党们一片挚诚的心,着实让人感动。我们在心里称赞他对家乡的一往情深,不满他对记者的“无可奉告”。

直接采访无果,我们亲历的两件事却铭记在心里。

听说报社的经济紧张,我们几个腰里“没铜”、囊中羞涩时,他主动提出让我们免费住在他们部队的招待所。

我们在北京采访过程中,赵部长陪我们前后忙了七八天。我们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把一个工艺品送给他时,他大训:“这是弄啥哩?自己人还来这一套,不要,坚决不要”。无奈,我们又把工艺品带了回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几个开玩笑说:“咱们记者还讲究走南闯北哩,采访赵部长打了败仗不说,连个工艺品也送不出去。”

不知道我们是埋怨自己,还是嗔怪赵立正部长。

名人档案

赵立正, 本县留古镇人。1963年生, 1980年刘集中学毕业后考入高等学府, 因故辍学。1980年10月, 投笔从戎。入伍22年来, 主要从事部队后勤工作, 历任北京警卫一师战士、文化教员、司务长、主管会计、后勤处长等职务, 现任北京警卫一师后勤部副部长。因工作认真, 爱岗敬业, 八次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荣获嘉奖十余次。1997年任后勤处长期间, 曾被北京军区树为“双优达标单位”; 1998年在“三讲”教育活动中, 被师党委树为“爱岗敬业”优秀干部。

铸剑法兰西

——记留法博士、西农大食品与科学工程学院院长杨公明

本报记者 张更祥 由保民 李印功 党延兴

A

“学无止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学习是社会发
展、个人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杨公明，富平人，这个农民
的儿子，就相信这一点。

杨公明一九七五年在西北农学院农机系毕业后，因勤
奋好学，成绩优异，又善于钻研而留校任教。但他深知知识
的重要性，况且他属于“工农兵学员”。当时在一般人眼中，
“工农兵学员”即是不扎实的代名词。七八年他又去西安交
通大学深造。回校后不久就担任了农机系的领导职务。

尽管他自学、补习了所有课程，充实了基础，是同批
人中第一个晋升助教、讲师的人，尽管他在教学上也是一
把好手，曾获校级、部级优秀教师称号，尽管他在科研上
也成果可佳，有省级二级科研成果奖、四等国家发明奖，
有三、四个国家专利，尽管学院的同事们都称赞他、夸奖
他，但杨公明心中有些隐隐不甘：毕竟要学习的知识还很
多，毕竟我国在科技方面还较别人落后许多……

杨公明要把那隐隐不甘变成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
1988年，他放弃行政晋升机会，申请去外国留学。当时的
他已近四十岁！

法国是欧洲农业发达大国，其农产品深加工及农业

机械化属世界领先水平，法国农产品加工总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 3.6:1，而我国仅为 0.4:1，杨公明希望到这个国家去取经，为自己的国家腾飞做一点事情。

杨公明当时学的是英语，法语比英语难得多！当时许多好心人都为他担心。

杨公明是个聪明人，他明白自己这一选择意味着要吃多少苦，要克服多少困难！

白天，他要处理学院的事务，要上课，要参加科研，包括科研成果的推广，他是当时全系教学工作量最多的人；晚上饭前饭后，他苦啃法语，记语法，背单词，身上的单词本、单词条不知磨坏了多少本，向艰涩的法语进攻！多少次当窗纸发白、天已大亮，他便打一盆凉水擦把脸，又匆匆忙忙去上班。多少次刚躺下，一个单词想不起，又起身翻几次字典。



杨公明(右)向中科院院士卢良恕汇报中法食品中心工作情况



法国驻中国大使(右三)来杨凌考察“中法技术交流中心”,杨公明(右一)为其介绍。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九八九年底,杨公明以高分通过出国语言考试,被国家教委公派去法国留学。

B

留学生活是艰难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第一,语言障碍。第二,个人计算机操作困难,当时我国几乎很少有个人电脑,一到法国,外国导师就分给他一台电脑,天天要检查学习和研究进度。第三,生活环境的不适应,他在国内不喜欢喝牛奶,吃牛羊肉,在西方奶酪之乡,干条面、白蒸馍根本找不到……所有这些,通通没有难倒杨公明。除了初到法国的半年,因语言熟练程度和计算机操作困难外,显得有些不适,其余七年半,对杨公明来讲可以说是辉煌的!

杨公明不但学问作得好，而且善于将所学知识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使得所学知识能在最短时间内产生突出效益。

“高压食品加工新技术”这个被称 21 世纪十大高新技术的研究，是一门涉及面宽、技术性要求非常难的课题，其难点之一在于对食品加工处理的高压加工装备，当时在法国也是国家重点攻关内容，杨公明有幸成为研究小组成员。

杨公明在留学期间，曾先后为法国国立第戎农业工程学院和国立第戎食品与营养工程师学院设计并指导安装了两套(600Mpa 和 700Mpa)用于食品高压处理的试验装置，这两套设置如今在法国也算是先进的！在法国第戎农学院实验室的科技成果展板上，至今还清醒的写着“中国西北农业大学杨公明先生设计”的字样。而且从安装到如今一直运行良好。他的这项工作曾与一九九五年十月十日在法国布尔高涅大学做了专题介绍，获得同行们非常高的评价。为此他以“非常优秀”评语获得了法国布尔高涅大学“高级研究文凭”。同时收到数个教授邀请，他读博士学位，而且有奖学金。他从 1994 年即获法国第戎农学院院长签发的“提供杨公明免费住房”的嘉奖。

面对一群白皮肤蓝眼睛的外国专家，即是留学期间，杨公明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过怀疑。自信是一个人在事业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而他在这点上表现的尤为出色。

杨公明的博士论文是“表面状况对配合性能影响



杨公明(左二)代表中国政府和法国农业部、教育部的官员在“中法食品研究交流中心”成立仪式上,左一为吕飞,现国家扶贫办主任。

研究”。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机械学课题。为使读者明白,作者打个比方:要将一个铁棍插入一个比铁棍还细的孔中,既要沾接好,又要省工时。世界通用的方法既费工时,又成功率不高。研究这个课题,除了压力之外,还要涉及材料的弹——塑性、接触问题、微滑动与磨擦及零件微观几何形状的非线性等皆属非线性问题。由于他对多种数学非线性方法有深入的理解并具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他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建立一个简便可行的新计算机模型,法国同行们称之为“杨氏模型”。“杨氏模型”使得过盈配合联接零件制造更为简单(一般省去磨削工序),制造成本更为低廉,生产效率更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

成果对现行有关该方面的国家标准与设计规范提出了挑战！所以那些白皮肤蓝眼睛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道理。

该论文于一九九八年十月以“特别优秀”评语通过答辩，杨公明获法国高等机械制造工艺与材料学博士学位，并获得所有评委们的特别祝贺！这个理论后被应用于数家企业均取得成功。法国一个企业进行“录放像机磁鼓孔的制造工艺改造”，每年为企业节省数百万法郎的成本！

在异国他乡，能取得如此成绩是不易的，正如杨公明的高级研究文凭的导师，法国国立高等机械制造工艺与材料学教授、兼布尔高涅大区制造工艺与材料实验室主任 J·CCOquile 教授在推荐信中所讲：“……我与杨公明先生始终是非常愉快地合作工作。应该说他的研究是在人们可以认为不容易的情况下进行的（远离家人，多次搬家，独自奔走各地测试、实验）。虽然如此，他从来都表现出高效、严谨、富有想象力和自觉性。”

杨公明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当即被法国荣纳企业之家“新技术中心”聘为研究员，并以研究员的身份进行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由于工作出色，成绩显著，在法国工作期间，他取得骄人成绩，法国权威杂志报道他所在的高技术中心是最高水平的技术中心，而他是首席科学家，法国报纸的这篇报道上还特意附有杨公明的工作照。杨公明在法的工作得到我国驻法使馆媒体的重视，我驻法使馆公使街商务参赞童介石，科技参赞蒋力蒲，教育参赞曹国兴，新华社驻巴黎记者都先后去他工作的单位采

访,并有专题报道。他所在的“新技术中心”高薪聘任他长期留法工作。并为其家属、子女办好法国居留手续。由于要回国创办“中法食品加工中心”,由于祖国的需要,他毅然决定回国,他决心回国干一点事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于国内企业发展。

在严谨的科学技术面前,没有人种的差异,没有年龄大小的区分,更没有政治观点的影响。杨公明在法国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也为咱富平人争了光!

记者在采访富平在外名人过程中,所到之处,人们不约而同地有一个共识:富平人是好学的,富平人是勤劳的,富平人是能干的。

杨公明就是富平人在外的佼佼者之一。

他法国留学回国后,全国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对他产生出了极大兴趣,数家大学出高薪聘请,并承诺了许多优厚的条件。但他一一婉言谢绝,毫不犹豫地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陕西。

C

杨公明现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院院长,其兼职很多,他自己说“我也记不清有多少”。

一年来,他已为学院筑构了坚实科学的教学基础。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加工业作为新兴的科技产业异军突起,成为目前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大主导产业。姜春云副省长在“农高会”视察杨凌时曾明确指示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要积极推动农产品贮藏、保鲜、加工、包装、销售和标准化工作，增强加入 WTO 后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杨院长告诉记者：学科建设始终是学院的发展主线，在充分分析市场人才需求和我院师资、基本教学条件的基础上，计划通过五年的努力，在加强和完善现有本科专业和博士点的同时，再增设 1—2 个本科专业，2—3 个博士点和硕士点，争取建成一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 1 个省部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

关于科研和开发工作，杨院长告诉记者：国家对食品加工研究非常重视。我们要积极拓宽渠道，争取科研项



杨公明(左)在第四届国际计算与结构研讨会上与法国有限元之父(国际有限元与计算模拟权威)BATOZ.J.C 教授合影留念。

目,力争在“十五”期间争取到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6—8 个,推广项目 10 个,万元以上的横向课题 20 个。在保持和发展现有优势学科的同时,力争在小麦品质、膜过滤、超临界 CO₂ 萃取、高压食品、果蔬深加工研究等方面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目前,他自己承担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十余项,经费数百万元。在国外,他是法国博士导师,在国内他在机电学院,生命学院,食品学院招有博士、硕士。他回国两年,招收博士、硕士 14 名。

说到杨院长的研究与开发,就不能不提“中法食品加工研究交流中心”。

中法食品中心是杨公明应法国同行的邀请,利用国外先进技术、资金、人才回国创办的一个旨在推动我国农产品——食品加工,增加农民收入的新形式,法国计划在中国办五个中心,他是该项目中方总负责人。杨凌是第一个,杨凌中心是去年 11 月在杨凌揭牌成立。法国方面有法国国立高等生物营养与食品学院、法国国立第戎农业工程师学院、第戎农产品——食品交流中心。提供资金的单位有:法国农业部、法国教育部、法国外交部、Bourgogne 地区。而中方的发起人即杨公明教授。该中心主要从事食品业方面的科学研究、人员培训、技术交流、新产品中试和项目中介等业务,将成为连接中法食品企业之间、高校及研究单位之间的桥梁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他的工作,不仅得到全国人大农业委员会,国家科技部、外经贸部、农业部、教育部、陕西省、中心农科院的支持,法国大使还曾专程来杨凌视察,法国与杨凌的关系由于杨

先生变得从未有过的亲密。

杨公明整天忙得团团转,好在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不会“挖坑”,一门心思用在事业上。他也因太忙,慢待了不少老同学、老朋友、乡里乡亲,他很不安,但也没办法,他的时间不由自己安排,请大家谅解。

一个人的成功需要诸多因素,比如本人教育程度、机遇、社会因素、勤奋程度等等,但最重要的,是个人才智和勤奋!杨公明才智是出众的。干事情是认真的、勤奋的,学习态度总是虚心的,因此用在杨凌工作的富平乡党的话说:杨教授干一件事成一件事,没有他干不成的事!

采访结束时,杨院长一再叮咛:自己回国一年多,没干出什么大成绩,希望记者向富平乡党捎句话:不管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还是在杨凌,他永远忘不了生他养他的富平!他始终在寻找机会,创造条件,想以实际行动报答养育自己成人的黄土大地!

他也决心活到老学到老,不虚度每一分钟!

名人档案

杨公明,1950年生于我县觅子乡。1975年毕业于原西北农学院农机系,后任教。1978年至1980年曾在西安交通大学学习。1993年国家公派赴法国留学;1995年获法国布尔高涅大学食品加工新工艺及设备博士学位,并被“高技术中心”聘为研究员。2000年2月作为陕西省引进的省、部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回国工作。现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在北大当教授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万民自述



徐万民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讲演

选择历史研究作为一生追求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故乡的人文地理环境。

我们富平县位于关中平原的北部。关中自古帝王都，十三个王朝建都关中，给富平留下了难以计数的地上和地下的文化遗存。有许多帝王、后妃、功臣陵墓，称为冢。有大量的庵、观、寺、庙。我就学的初小、高小、中学，都由古庙改建而成，小时候便喜欢揣摩古碑上的文字，对着高耸的宝塔发思古之幽情。

富平人杰地灵，产生过许多文臣武将。我的母校美原

中学附近的千口村就是秦朝大将王翦、王贲的故乡。美原北边万斛山下，便是明朝御史杨爵的故里。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关中三李之一的李因笃的出生地薛镇韩村，离我们村还不到二里地。他们的传奇般的经历，通过农夫野老的转述，启迪了我探索千古之迷的兴趣。

我的家在底店乡康庄徐村。我上学时，两个姐姐已出嫁。一家五口，父母年迈，兄长双目失明，还有我和妹妹。母亲一生历尽艰辛，她刚强的性格深深影响了我。父亲一字不识，但是，诸如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岳飞忠孝两全英勇抗金的事迹，便是他告诉我的。从父亲那里，我不仅得到许多历史知识，而且知道了辨别忠奸的历史观。我的父母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和妹妹能考上大学，全靠他们的大力支持。

我一生酷爱图书。小时候，买不起书，除了课本，很难得到课外读物。我千方百计搜罗书报杂志古今小说，还经常悄悄溜进学校的会议室，阅读老师的报纸。郭沫若轰动一时的为曹操翻案的文章，就是在美原中学的会议室里看到的。

上中学时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一边上学，一边背着棉布、衣被到陕北和陇东给家里换粮食，一去就是十天半月，后来又休学一年。在这一年里，除了在家劳动，还外出打工，给宜君县的农民担粪开荒，数九寒天在志丹县的河川里开山炸石修公路。但不管是在陕北的窑洞里，还是在背粮的崎岖小道上，求学的梦一直没有泯灭过。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的美原中学，有一批才

华横溢的老师。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骄人的业绩。1960年初中毕业时,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我准备报考师范和中专。班主任胡俊甫老师顶着凛冽的大风,步行15里家访,说服我的父母,让我上了高中。高考前报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兰州大学。班主任汪礼明老师说:“我看你能考上北大,你就报北大吧。”几个月后,我拿到了北京大学的人学通知书。考上北京大学,是我引以为自豪的大事,它改变了我的命运。饮水思源,胡俊甫老师和汪礼明老师,也就成了我终生难忘的恩师。

1964年8月底,我告别了故乡,来到了国家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原清华大学历史系、燕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合并而成,有一大批学贯中西、名闻中外的教授,实力居全国之



徐万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

冠。北大图书馆藏书 400 万册,仅次于北京图书馆。有名师教诲,有书山为伴,我如鱼得水,贪婪地吸取着知识的营养。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浪费了不少时间,但五年的大学生活还是充实的。1969 年毕业时,我荣幸地留校任教,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今。

我想当一个好教员,但大学教学的基础是科研。老师不能人云亦云,教给学生的,必须是本学科最前沿的学术成果。除了传授知识,还要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给学生创新的理论与方法。这就要求老师身体力行,拿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来。

我要求自己对研究项目的选择,必须兼顾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在治学方法上,要继承清代乾嘉汉学的优良学术传统,详慎考证,秉笔直书,借鉴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博采众长,创造自己的风格。

学术研究要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就要有一个安定的家庭环境。我与妻子郭普侠两地分居十年。她辗转在白庙、老池、薛镇当老师,既要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又要独立抚养两个孩子。1980 年她和孩子调到北京,四口之家住一间十平方米半的小屋,工资也很低。我发表的大多数学术著作,因为不能给出版社创收,不仅没有稿费,还要付出版补贴。我妻在北京大学职工学校任教,既要工作操持家务教育孩子,又要帮我抄写录入修改校对文稿。我的每一项科研成果和教学成绩,都浸透着她的心血和智慧。

几十年来,我完成了许多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有

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项目。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有 18000 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300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但是，由于国家的贫穷落后，国人海洋意识差，海洋成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通道。迄今为至，我国有约 100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大量岛礁被周边邻国侵占。为了唤醒国人的海洋意识。1976 年，我与历史学系的 2 位老师，带领数十名学生和海军指战员，在北京大学与海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下，走遍万里海疆调查研究，撰写出版了《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一书，开创了我国海疆史研究的新阶段。

引水，也叫引航。按国际惯例，外国船舶进出我国港口，必须由我国引航员登船指挥，或代替船长驾驶。引航业与国家主权和国防安全息息相关，对维持水运秩序保障船舶安全有重大作用。在旧中国，中国丧失了引航权，引航业被外国人把持达一个世纪之久。对这段惨痛的历史，从来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1997 年，中国引航协会为筹备来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引航协会年会，聘请我主编一部《中国引航史》，作为礼品书，赠送给与会的各国代表。这年暑假，我指挥十多名编写组成员，兵分两路，冒着酷暑，到沿海十多个港口的引航站实地调查，搜集材料。经过一年奋战，完成了 10 万字的《简明中国引航史》，由外文出版社出了中、英文两种版本。该书印刷精美，内容丰富，受到与会各国引航界权威人士的一致赞赏。会后，我们又再接再厉，继续赴各港口引航站调查，到北京、南京的档案馆收集第一手资料，完成了一部 77 万

字的《中国引航史》，该书已于 2001 年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

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在我国的海洋战略中居于关键位置。可以说，没有台湾，就没有完备的海上防御体系。李登辉之流为制造台湾“独立”，提出废除或淡化台湾省制，企图否定台湾是中国的一个行省的历史事实。为了戳穿一些人就台湾省制散布的谎言，我与我的学生周兆利撰写了《刘铭传与台湾建省》一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 2000 年出版。该书提出“台湾郡县制源于祖国大陆”的科学论断。以大量确凿的证据揭示了从十二世纪南宋在澎湖驻军，元朝设澎湖巡检司，到 1885 年台湾建省的过程，有力地驳斥了台独分子散布的种种谬论。

中韩两国山水相连，但中韩关系史的研究长期被视为禁区，少人问津。1992 年，中韩建交，两国关系迅速发展。为了满足社会各界了解中韩关系史的迫切要求，我从 1993 年开始研究近代中韩关系史。1994 年上半年，我应邀到韩国高丽大学讲学，在韩国友人的帮助下，搜集到许多珍贵的史料。历经四个寒暑，1996 年底，由我独立撰写的国内首部《中韩关系史》（近代卷）正式出版。此书出版后，受到中韩两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并多次印刷，成了从事中韩外交、经贸及文化交流人士、韩国留学生必备的参考书。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中俄关系的状态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家安全与现代化事业的成败。我研究中俄关系史几十年。1988 年到 1989 年，作为访问学者，在莫斯

科国际关系学院研修一年,到圣彼得堡、奥德萨、雅尔塔、基辅等历史名城参观,到波兰、东德、西柏林、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进行学术考察,目睹了苏联和东欧巨变前夕,各国社会动荡的情形。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次长达一年的国外经历,对我后来研究中俄关系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几十年来,在国内和俄、日、韩三国的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几十篇关于中俄外交关系史、经贸关系史、文化交流史的学术论文。

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关注西部开发史,切入点西部交通史。1995年,出版了第一部专著《战争生命线——国际交通与八年抗战》,这本书是《抗日战争史丛书》的一种。该丛书被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专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而出。我的研究结论推翻了关于抗战后期中国军队溃败原因的传统解释,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了抗日战争的真相。这一成功使我顺利地得到了教育部九五博士点社科基金项目《交通建设与近代西北边疆》,成了该项目的主持人,接着又成立了北京大学明清工程项目《清代西北边疆交通史》的主持人。目前,这两个项目进展顺利,每年都有阶段性的成果完成。

江泽民总书记将孙中山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三大伟人。孙中山也是海峡两岸同胞共同尊崇的革命伟人和民族英雄。1998年,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成立,我被任命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几年来,先后到南京、广州、台湾、香港和美国出席有关孙中山的学术研讨会,并组织 and 主持了2001年

9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由北京大学、台北国父纪念馆、香港孙中山文教福利基金会主办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主编并出版了两部总计超过百万字的有关孙中山思想和生平事业的学术论文集。我自己也撰写了多篇研究孙中山的论文，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我认为，普及历史知识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为《北京日报》的“北京历史上的今天”、《中国铁道报》的“中国近代史”专栏、《中国教育报》星期刊文史周刊撰稿一百多篇。还为《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中华军事人物大辞典》撰写辞条一千多条。这些文章虽为通俗作品，但读者面广，影响大。

教学是教员的主要职责。在北大30多年，我一直在教学第一线，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多年来，给本科生和硕士生、博士生开过的课程有《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中国近代疆域变迁史》、《中俄关系史研究》、《近代中韩关系史研究》等。

北大学生都是来自全国的精英，他们思想活跃，信息灵通，见多识广，能给这样的学生上课，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但是，要给他们上好课，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对每一堂课都是兢兢业业，有些课程虽然讲过多少遍，但每一次都要修改讲稿，补充新发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虽然讲得是历史，但力争给学生最鲜活的知识。

我指导过十几届二十多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有不少学生毕业后成长为本单位的业务骨干。

北大的对外学术交流频繁，我每年都要与来自许多

国家的学者交流,切磋学问。也应邀到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历史考古研究所、韩国高丽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和我国台湾国父纪念馆、香港浸会大学、珠海书院、树仁学院讲学或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韩城太史公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之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一直把它当作座右铭,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名人档案

徐万民,我县底店人,1944年生,1964年美原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大历史系。196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几十年来,学术成就非凡。其中《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中国引航史》、《刘铭传与台湾建省》、《中韩关系史》等,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多次赴欧美讲学。

西农大动物科技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杨公社教授

“产学研”结合铸辉煌

本报记者 由保民 张更祥 李印功

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淳朴、厚重的个性，没有一丝一毫的张扬和夸张，这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杨公社。当笔者慕名去杨凌采访他时，他朴实得象黄土高原上的一抹黄土，总是说：没有啥，没有啥……

杨公社是学院院长，又是博士生导师，还在社会上有着许多兼职，他非常忙，可在学术上，他的成就仍然颇丰。闻名世界的体细胞克隆山羊“阳阳”就是在该学院诞生



杨公社(左一)院长在省决策咨询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上

的！他的许多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但他最出色、也是最成功的，应该是以“产学研”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整套具有新意、非常成功的办学方式，为新时期市场经济下的高等院校如何办学展示了广阔前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是该校 14 个学院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学院之一，专业齐全，师生共 2000 多人拥有 1 个部级重点学科，2 个省级重点学科，2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7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杨公社任院长八年来，该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动物科技学院在胚胎工程、克隆动物技术和胚胎干细胞研究等方面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其中胚胎工程，克隆动物技术已达到成熟化和工业化水平。院长杨公社是我国养猪学的学科带头人之一，先后完成 9 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攻关课题。他做了大量的畜牧科技及产业政策调研咨询工作，参与筹建了省内外 10 余家集约化养猪场。在他的带领下，学院专家领办科技企业近 10 个，并在全省多数地市成立了畜牧专家顾问组，指导当地畜牧生产。近年来，学院创办了动物保健品厂、预混料厂等 12 个经济实体，与多家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 3 家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教学科研试验示范基地及研究机构。特别是学院科教人员以技术资本入股创办的杨凌金坤生物技术股份公司，以其良好的运作态势被省上领导赞誉为“金坤模式”，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近几年，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物价的上涨，教学实验实习费用猛增，尽管学校多方面筹措资金，但与办



杨公社院长(右二)与博士毕业生在一起

学规模的增长幅度还有很大差距。加之院里的实验室、实习场所容量较小,设备不足,难以满足学生实践性教学环节的顺利开展,另外在当时,又是社会各方面大力兴办畜牧企业的时期,且这些企业无论在生产规模、还是生产工艺上,却比较先进,但存在的问题是普遍缺乏科技人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杨公社院长决定:勇敢地走出去,以不同的形式同企业合作,促进企业和学院教学、科研的共同发展!

在校企联合方面,学院与宝鸡戊寅绿色食品公司、西安北关种猪厂、西安金桥良种猪场、长安县百里王种鸡场、旬邑种羊场、陕西石羊集团、山西永济种鸡场、山东中大集团等 23 个企业联合。这些企业在帮助学生实习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方便,有的还承担了学生的补助和差旅费;在校企合作创办研究所方面,该院和陕西石羊集团联合成立了西农大石羊饲料研究所中兽医药研究所和广西钦州奶山羊研究所;在校企合作培养人才方面,该院充分利用师资方面的优势,为企业培训适合自身需要的人才。如通过陕西省饲料工业办公室的联系,我院为多家饲料厂通过自学考试的方式培养专业人才,这些学生通过学习,既学到了专业知识又拿到了大专文凭,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同时还为其他企业培训了大批的专业人才;利用高校人才优势,鼓励企业在学院设立奖学金和科研奖。深圳康达尔(高陵)饲料有限公司拿出 50 万元在院设立奖金基金,意在奖励优秀大学生、研究生,贫困大学生。西安爱丽丝畜牧有限公司从 1997 年开始每年都拿出一定的资金做为畜牧科学研究奖,奖励院里在畜牧生产、饲料及新兽药的科学研究中有突出贡献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和大学生。

“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不但增强了学院的办学基础,也为企业解决了许多生产实际问题。在 1998 年

和 1999 年,由于一些流行病使畜牧业滑坡,学院教学科研人员便发挥优势,为广大养殖户和企业出谋划策,使畜牧生产避免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宝鸡市布尔羊原种场聘请该院 6 位专家为顾问,从种羊的繁育、饲养到疾病的防治,为企业解决了大量的生产实际问题,尤其是该院教授采用胚胎移植等新技术利用本地山羊作受体生产纯种布尔山羊,极大地提高了纯种布尔羊的繁殖率,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一个原种的布尔羊比当地山羊价格高 50 倍左右)。其次,“产学研”办学模式,也提高了中青年教师的专业水平,调动了教师投入科研的积极性,增加了学院的经济收入,解决了一批贫困生上学难的问题。

“产学研”教学模式,现已取得了初步成功,不但获校优秀教学成果奖,还获得了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这是



杨公社院长在动物科技学院成立大会上

全院教职员工的努力的结果,更是杨公社院长辛勤工作的成果。杨公社在事业上的作为,使记者对小时候的他产生了兴趣。三月初的一天,记者风尘仆仆地来到长春乡三桥村,这里三面是沟,杨公社母亲住的窑洞在光秃了的半山上。在窑洞里,她老人家一边倒水一边说着“公社这娃从小把苦吃扎啦!念书那会儿,从来不惹事,干啥都很吃苦。在家小时候也没做过让大人生气的事,他干啥事,咱放心。”

杨公社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民总是有着特殊的亲情。如今他虽然是学院院长,兼任中国畜牧兽医学学会理事,西北养猪协会理事长,同时还兼任我省咸阳、宝鸡、商洛和甘肃张掖等市科技顾问。事情虽然干大了,但他仍然没有忘记农民,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富平,他多次告诉记者:自己现在很忙很忙,但一有时间,就了解富平的经济建设情况。表示一有机会,将会为家乡的经济建设献计献策!

名人档案

杨公社,男,民盟盟员。1959年1月生,本县长春乡人。1982年毕业于西农大畜牧专业,同年考取西农大动物遗传育种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4年12月任西农大动物科学系主任。1998年5月任西农大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学院院长。同年入选省三五人才,享受省、校两级特殊津贴。现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博士生导师。

智慧让世界更精彩

——访天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忠直

本报记者 由保民 张更祥 李印功 党延兴

(一)

人生的成功需要三大因素：能力、勤奋、机会。对于杨忠直来说，这三大因素中前两项，无疑是具备的。机会对于他来说，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争取的。

杨忠直从小就好学，尽管他上学那会儿教学是粗浅的，甚至学制也是混乱的，可是老师教什么，他就把什么学好；学制把他抛向那个学段，他在那个学段的成绩总是优异的。最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老师教的，课本上有的，杨忠直从小就对那些课外的，特别手工工艺方面技巧性的东西，有着天生的爱好。笔者记得两件事：一是高中期间，杨忠直给某个老师做了一个煤油炉。当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美原镇包括富平县城没有卖的，谁能拥有一个煤油炉，那简直是新奇无比！他不但做出来了，样式极其精美，结构非常合理，还比一般的煤油炉多了一圈，里圈12个眼，外圈20个眼！直到他博士毕业后的1997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从天津回来后发现那个30多岁的煤油炉还在外家的墙头上放着！他感叹一番，将它收拾起来了。二是那会儿的学生每星期三回家背馍，同学们惊奇地发现，学校大门口经常会有陌生人在等杨忠直，大多同学是走路回家，而杨忠直却被人用自行车带着，往往去向不是回家的方向。当同学们后来问他是怎么回事时，他总是



1997年，杨忠直获博士学位后的留影

淡淡一笑：“他生产队的泵坏了，寻我给他们搭泵！”

学生时代的杨忠直，的确和大多数同学有些异样。他不张扬，属于乡党们常说的“蔫蔫”的那种；他不大合群，属于非常有个性的那种。

当1975年被推荐到天津大学上学时，杨忠直并没有过份的喜悦，似

乎命里注定他就要上天津大学。

(二)

杨忠直天津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他优异的成绩和好学的精神，在校他不但任教，还参加了国家“六五”重点项目“超短脉冲激光器”的研究。

激光研究当时是门新兴学科，对于许多人来说，“激光”二字，显得新奇而神秘。杨忠直能参与这个项目，除了学业上的优秀外，主要原因恐怕还是他的实践性极强。

激光研究当时的领域比较广阔，不但在理论上有许多领域要深究，就是在已获得成功的理论研究后，怎样将

其尽快地用于实践,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许多专家教授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又没有充足的实践能力,使其研究进展缓慢,而杨忠直却相反,他既是研究人员,进了实验室又是试验员,下了车间又是高级技工,他设计的工艺试验,总是最早能取得试验成果。甚至晚上一觉醒来,灵感一来,他就会尽快走进实验室,改动试验步骤,改进试验装置……这些工作他从来不需要工人帮忙,自己一个干!他研制成功了国际上第一个“Good—Hanchen 效应激光 Q 开关”,并多次参加全国性的激光研究会议,宣读自己的论文。作为他参与的“超短脉冲激光器研制”,1983年5月获得成功,鉴定水平为“国际先进!”

1984年,他还用实验证明了牛顿关于“全反射是体效应”的理论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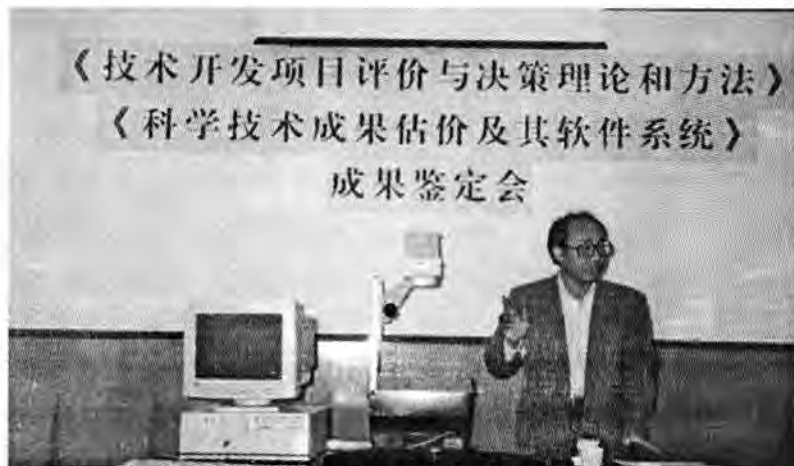
一个人取得如此成绩,也就可喜可贺了!但杨忠直没有满足,他又发动了第二战场:向经济管理及技术管理方面进军!

(三)

由于体制及对激光尖端技术的设备要求很高等原因,杨忠直1984年5月对从激光的研究转向对经济管理及技术管理的研究。当他作这个决定的时候,许多老师和同事表示出很大的担心:毕竟专业完全变了,毕竟他已三十岁的人了,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到三十不学艺。可杨忠直不信这个,他深信自己只要努力,没有干不出成绩的道理!他一捆捆地从图书馆借书,一次次地参加有关学术会议;一位大四学生看见桌上码得厚厚的读书笔记时,吃

惊地说：“杨老师，你的笔记比我四年的大学笔记还多！”他不打麻将，不会“挖坑”，不看电视，不抽烟，不喝酒，不会跳舞，不上街，宿舍、图书馆、教学楼，三点连成一线，他象个机器人似的，整天在这三个点上奔波……每到深夜，宿舍楼上就他的窗户闪着亮光；每到星期天，他就匆匆忙忙往书店跑……功夫不负有心人，1992年9月，杨忠直毕业于天津大学管理学院技术经济专业，获硕士学位；1997年9月毕业于天津大学管理学院系统工程专业，获博士学位；接着他又在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现任天津大学管理学院技术经济与财务管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杨忠直自1990年起，就开始培训我国第一批建设监理工程师，他主讲《建设监理概论》，他讲课时坐在讲台上的大多是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还有60多岁高级工程师。



1998年10月，杨忠直教授在向专家们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

1992年,杨忠直运用效用理论、对策理论、均衡理论和预期理论系统地建立了资产评估的理论和方法,这对我国当时在资产评估中的许多有争论学术问题进行了统一,为后来这一领域的理论发展和实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92年12月,他又用对策论建立了合资项目经济评价的科学方法;1993年1月,他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个关于资产评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工业企业资产评估价系统”;1995年1月,他又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个关于科技成果评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学技术成果估价及其软件系统”;1997年7月,他运用规划论、对策论、微分对策理论和生存对策理论建立了建设工程监理目标规划和控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其研究成果处于国际领先水平;1990年开始培训我国首批监理工程师;1999年3月开始我国设备监理工程师的培训,编写我国第一部《设备工程监理导论》,11月建立商业生态学理论体系,首次提出“商业生态工程”概念,开创我国经济生态学和工业生态学的研究和工程实践,其理论水平达到了国际领先地位!他曾经在《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其中有3篇被EI(美国工程索引)收录。R&D项目评选及其估价系统荣获1999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奖;2002年在科学出版社发表国际上第一部《企业生态学引论》。

一个人能在文理两科干出成绩已属不易;他却干出了如此辉煌地成绩,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杨忠直从来是忙碌的,当我们去天津大学采访他时,看看他的办公条件:

从宿舍到专家楼、从专家楼到教学楼、从教学楼到招待所,他给我们作向导时一路小跑,总是把我们拉得老远!我们开玩笑说他:“你走路也要比别人快!”他笑笑说:“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你走慢了,就会耽误对未来世界的感知!”

杨教授是聪明的,更是勤奋的!他用自己的成绩为我们富平乡党争了光!

名人档案

杨忠直,1956年11月生,美原镇沐惠村人,天津大学博士生导师。1978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系激光(光电子技术)专业。1978年至1983年参加并完成了国家“六五”重点项目“超短脉冲激光器”的研究,1984年研制了国际上第一个“Good—Hanchen效应激光Q开关”。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国家软件科学基金项目1项。

1988年建立资产评估的预期理论、效用理论、等价理论;1990年培训我国首批监理工程师;1993年提出系统生存函数理论;1997年创立企业生态学的理论体系,首次提出商业生态工程并开始研究经济生态学和工业生态学;2002年开始培训我国首批设备监理工程师。2002年11月调入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任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

推动中国法学走向世界

——记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法学家杨一凡

本报记者 由保民 井来成



一位清瘦干练的中年学者，殚精竭虑，二十多年来，撰写和出版了40余部著作，推翻了前人一个个定论，揭示了许多长期困惑人们的历史之谜，特别是在明代法制史研究领域，被公认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他经过多年挖掘、搜集和整理散失于海内外的中华法律文化遗产，点校和主持整理出版了两千余万字的稀见中国古代法律典籍，使一批失传文献得以重见天日，填补了我国馆藏古籍及其研究的许多空白，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肯定和赞扬。

他,就是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法制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富平杰出的优秀儿女杨一凡。

为追求真知,他甘于寂寞,不为利禄官位所惑,苦苦探索,孜孜以求,以一个超凡脱俗真学者的形象享誉海内外学界。

杨一凡的治学道路和许多学者一样,是曲折、艰辛的。回首往事,令他感到欣慰的是:数十年来,历经风风雨雨,无论征途如何坎坷,他都一直在追求超越自我,日程如一,矢志不移,毫不气馁地在奋力求索,坚韧不拔地一步一步走向辉煌。

早在美原中学时期,他受老师和书籍的熏染,特别是出于对周恩来等曾就读于法律专业后来为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领袖的敬慕,在思索人生道路的时候,就立志高中毕业,上政法院校学习。在这种志向的促使下,使他战胜了重重困难,在“中学6年,辣子蘸盐”的条件下,获得了优异成绩。

1963年,杨一凡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跨进北京政法学院的大门。进校的第一天,他心头就荡漾起“精通法学”的美好理想。那个拥有数十万藏书的图书馆,成了他眼中最神圣的殿堂。一下课,他常是直奔阅览室,恨不得早早读尽万卷书。但是,事实并非他想得那样美妙,在浩瀚的藏书,中文法律著作却少得可怜。中国法学的贫困,令他困惑不安,也深深刺痛着他的心,一种强烈的责

任感也随着他痛苦的思索演变成了新的志向：大学毕业后考研究生深造，走着书立说的道路，为繁荣我国的法学事业做出贡献。为了把理想变为现实，他每天天刚麻麻亮就起床攻读，晚上熄灯铃响后，他利用担任院学生会宣传部负责人的方便条件，就钻进学生会宣传部的小屋里继续看书，或躺在宿舍床上默念和用手指默写外语单词。为了多读点书，整个大学期间，他只看过一次电影。

正当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发愤攻读的时候，“社教运动”、“文革风暴”相继打乱了他的学习计划，他也因家庭成份问题受到政治株连。加之“文革”中，全国学校和图书馆关闭，“读书无用论”盛行，整整四年多时间，他丧失了读书的机会。

1970年，他被分配到边陲城市黑龙江省鸡西市委宣传部后，遇到了一个得天独厚的读书机会。被解散的市委党校的图书馆由他所在单位接管，更庆幸的是，掌管图书馆的人和他是好友，他可以从那里私下借书读。这种特殊的条件，使他这个“爱书如命”、“读书不要命”的人，欣喜若狂，又一次钻进了被人视为一钱不值的学问中。从这时起五、六年间，他坚持刻苦攻读，从未间断。

随着辨别是非能力的增强，他的学习动机则发生了新的升华。许多历史人物在逆境和困苦中治学成功的事迹，也给了他巨大的启迪。他坚信，国家繁荣需要知识，多学点本领日后总会有用。于是他追求知识的欲望愈强，读书的劲头愈大。

为了多学点知识，他合理安排了读书时间，白天上

班,手头的工作一完成,就抓紧读书;同时给自己硬性规定,平均每天学习时间不得少于4小时,完不成任务,就用节假日补上,围绕读书内容,他还利用一切机会搜集旧的图书,一次他在市委党校图书馆送往造纸厂销毁的图书中,挑选了数百本有价值的书,使之免遭厄运,为自己阅读提供了方便;他为了多读书,总是从当时自己的低工资中挤出一些钱买书,直到考研究生时,他家还未添一件新家具,常用的一张饭桌,还是用破木板拼成后用纸糊的。他在鸡西市工作的六、七年间,就这样抢来了一万多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从容不迫地读完了上千册历史和其他书籍,写下了三百万字的学习笔记和文稿。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专业基础。

1978年,他毅然放弃到省里大机关工作的机会,怀着久有的期待,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深造。这是他学术生涯的真正开端。三年学习期间,他不但把法律史定为专业主攻方向,而且在学术上进行了突破传统研究模式的尝试。他经过反复研究和思索,针对旧研究方法的缺陷,提出了变“彼此割裂”为“互相结合”的写作思路,探求立体的、多因素的、结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明史研究的基础上,他决定把撰写《明初重典考》作为新研究方法的突破点。下定决心“坐冷板凳”,花大气力下笨功夫。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先后在北京、北京大学等近十个图书馆,查阅了200多种史书和资料,阅读了近百种珍藏善本和从国外购进的缩微文献。在此基础上,他运用“立法与司法、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论与考”等“五结合”的研究

方法,于1981年,完成了《明初重典考》一书的写作,在学术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我国法律文化遗产之浩瀚,为世界各国所少见。但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曾长期在世界处于落后地位。一些外国学者在其演讲和著述中,往往以轻蔑的语言描述中国的法律文化研究。扬一凡深为中国法学落后痛心疾首,下决心以毕生精力从事法文化研究,恢复中国法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应有的地位。1981年,他提出了中国法律文献整理和研究的三十年科研工作规划。其中把搜索整理、编纂《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5000余万字)、《中国法制史考证》(32卷本)和建立科学的中国法律史学学科体系作为他一生要完成的三件大事,且一定办好,以流传和保存祖国文化遗产,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法律文化当好铺路石。

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中,浑然世外桃园中人。为了撰写学术论文和日后编纂大型丛书《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京城的几个大图书馆,成了他苦心研究的书斋。长期伏案写作,使他腰部多处骨质增生,常常是连坐下来都要疼得他浑身直冒冷汗。由于腰肌疼痛难忍,坐不到椅子上,他就让女儿制作了一个硬板夹,躺在床上写,实在写不动了,他就用口授的办法,让家人和同事拿着录音磁带来整理。他撰写出版的《中国法学新思维》、《中国法律通史·明代卷》、《洪武法律典籍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中国的法律与道德》等书,大都是这样产生的。

在课题经费不足或根本就没有经费的情况下，他和妻子宋国范常常把用于家庭的开支减到最低限度。为了复印大量珍贵典籍资料，他们曾经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直到二十世纪末，他们家里还是石灰墙、水泥地，仍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他治学严谨，凡是他的著作，基本上都是他本人的独立见解，从不抄袭他人的成果，偶有引用，也都一一注明。他从不当挂名主编，更不沽名钓誉。与别人合作撰写论文，都坚持实行这么一些原则：自己写作的文字不超过三分之一者，一般不署名；二分之一以内者，不在前边署名。而且有几部著作，本来是由他主要完成的，都谦让地把名字署在后边。碰到与荣誉有关的事情，如评选优秀成果奖之类，他总是极力推荐别的同志，自己的成果尽量不去参评。

杨一凡搞学问就是这样，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三不图官，图的是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益于民族和后代。从1984年至今，他曾有多次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机会，但他都为了潜心学术研究而辞官不做，名利不要，在学界传为佳话。

在学术研究中，他提出了重点着陆，鸟瞰全貌，系统整理，陆续切入的构想，与刘海年教授合作主编出版了《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这部洋洋5000余万字古文繁体字、三编十四卷巨著，收录了散失于海内外各地罕见的中国古代法律孤本、珍本近60种，其中700余万字属于孤本性质的文献，有400余万字为我国所不藏。本书出版

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其修订本被列为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详细书评,赞誉此书“是近百年来我国挖掘和整理法律古籍所取得的最大成果,代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乃至全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髙水平。”在许多方面填补了我国法律史料的空白,为保存和流传中华文化遗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目前,他和田涛主编的《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10卷本,550万字)也已出版,《历代判例判牍》、《秋审档案》两个大型科研项目正在实施。他本人和他主持的中国社科院法律史研究室,也以取得多项重大学术成果,先后获七项国家级奖、20余项省部级奖。这些重大成果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学界法文化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在世界上也居于领先地位。

为了促进国家法制建设和推动中国法学走向世界,他先后参加了30多个中央和国家文件的起草工作,为我国的现代化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也倡导、组织并主持召开了首届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和多次国际、国内法学学术会议,主编了国际交流丛刊《法律史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丛书》和《中外法律史新探》。在推动中外法学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代表作《明大诰研究》一出版,就被国内外法史学界公认在明代法律史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主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32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战略精品项目,为了使该书的学术水准达到国际公认的水平,他除自己撰写了专著外,还邀请了我国大陆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法

学各学科的上百名知名学者、台湾省的19名学者和日本的40余位学者,历时7年,进行了这一重大学术工程的撰写,使这一成果真正成为近百年来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学术精华和代表作。许多外国学者对杨一凡的学术成果和他的治学精神,惊叹不止,连连称赞:“杨一凡,推动中国法学走向世界!”

名人档案

杨一凡,男,汉族,1944年4月生于富平县薛镇安党村杨山甫组,1967年7月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1978年10月至1981年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学习,并获法学硕士学位;从1983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的授课任务;1987年10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法制史研究室副主任,并兼任华夏研究院法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由于学术上的成就,1990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同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荣誉称号。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赵政阳的苹果情结

本报记者 由保民

沧桑巨变,英雄辈出。

三秦大地这片肥沃的土地哺育出了无数的杰出儿女,在苹果技术推广和苹果培育方面独占鳌头的高原山山岭岭挂满鲜红苹果的果树专家——赵政阳。是他,让渭北黄土高原树起一道道绿色屏障;是他,用智慧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引、选、育了一批批适合渭北黄土高原的优质苹果新品种,并将各种新优科技成果引入生产领域,令果农乃至果树专家推崇备至。

一、青岗岭上鲜红的苹果摇了铃

陕西省富平县梅家坪镇洪水村,东面是遇上暴雨山



陪全国知名果树专家汪彦景考察富陶产业集团果林苑



赴澳大利亚留学访问

洪排不走,天不降雨时成干滩的石川河,西边是干枯荒凉的青岗岭,这种自然环境令这里的贫困成了必然。然而这个贫困出了名的地方却在1964年11月迎来了十几年的改变他们命运的使者——赵政阳。不过,这个宁馨儿的降生却并未给当时尚且贫困的赵氏夫妇带来一丝喜悦,反而是更添愁容,于是做母亲的依旧是到四、五里路外的小学教书,为节省开支以添补家用而很少回家,幼小的赵政阳只能由戴着“黑帽子”的父亲来照料,但父亲政治上的受挫和家庭的贫困使小小的政阳未感受到丝豪的父爱与家庭的温馨,反而是常因幼稚的错误而导致父亲的拳脚相加。于是稍懂人事后,小政阳就将石川河和青岗岭变成了他逃避父亲的世外桃源,在这里他找到了童年的乐趣。常常在放学后停留于此,只为了缩短与父亲相处的时间。

而书本更是打开他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于是他成了学校里最用功的孩子,以成绩优异而远近闻名。初中、高中期间又连跳两级,1981年,也就是他刚满16岁的时候就以绝对优势考入了心所向往的西北农业大学,他的这一举措令家人和老师大跌眼镜,而他只是憨憨地笑着说:“咱是农村娃,能在杨凌上大学就知足了。”没有人知道他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改变陪伴他走过童年的石川河和青岗岭的面貌。

怀着这种心愿他踏进了被誉为中国农业鼻祖的杨凌,踏进了充满挑战和生机的西农,并很快就被这里迷人的草坪和丛生的灌木所吸引,这让他想起石川河,想起青岗岭。这种重回故乡的亲切感、这里浓厚的求知氛围和教授教师们渊博的知识都使他年轻的心激荡不已。但他很快从这种情感中脱离出来,投入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于是,人们总能看见一个穿着朴素的青年穿梭于教室、图书馆、草坪孜孜不倦地求知的身影。功夫不负有心人,每次考试,他的成绩都名列前茅。但这些并不能阻挡他求知的步伐。在学习之余他还展示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大学四年一直被同学们推举为团支部书记。由于他的出色表现,1984年10月他被吸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84年,也就是他上大三时,忽然发现自己学习了三年却连家乡果农最简单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这使他意识到必须将书本知识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校这时才开始组织学生上实践课,但这并不能满足他求知的欲望。于是他独自一人骑上单车到附近的果园,帮果农劳

动以便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时间长了,朴实宽厚的农民就对身材单薄、言语不多又虚心求知的赵政阳产生了好感,纷纷把自己在果树栽培管理上多年来积累的经验毫不保留地告诉政阳,细心地政阳一字不漏地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作为回报,政阳也用自己学到的知识解决果农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来二往,政阳交了一大批果农,也拥有了一大片无价试验田。

大四的那个寒假,回到家乡梅家坪镇的赵政阳无意中听到姨表兄周晓明言其原生产队的15亩苹果园,因是乔化枝,再加上品种老化,年年不挂果,已成了队里的一块心病。闻听此言的赵政阳,立即拍腔让表兄承包,表兄及其家人都有些疑虑:“咱农民挣得起可赔不起,万一赔了,那可咋办?”胸有成竹的赵政阳干脆斗胆而言:“只要



赵政阳在果园考察新品种——粉红女士苹果



接待新西兰专家

你们按我说的办法去做，赔了我认。”

腔子虽拍了，政阳也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和表兄在承包的果园里分析研究了光长枝，不长果的原因，对果树进行了大手术，对该截枝的截枝，该剪掉的剪掉，打开了果树光路。那年冬季适逢大雪，为了赶在收假前将 15 亩果园修整完，他和表兄不畏风雪，抢时抢点地在果园冬剪，没几天手豁口就开了裂，鲜血直流，握剪子的手更是由红变肿，由肿结了茧子，看着表兄的样子，和自己强不到那里，于是两个青年人在果园里互相打趣以减轻劳累。但傍晚收工后躺在土坑上，政阳就感到腰腿全不对劲，痛得要命。但他和表兄的苦没有白下，第二年，这个多年未见果子的果园就挂满了鲜红诱人的苹果，这在方圆几十里摇了铃，人们开始纷纷种植果树，并拜这个青年后生为顾

问。

二、从维多利亚到黄土高原

赵政阳并未因他在青岗岭的小小成就而裹步不前，而是以优异成绩结束了大学生涯，并于1985年7月被推荐为硕士研究生在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继续深造，师从著名果树学教授许宽从事果树抗旱生理生态研究，许教授因其聪颖好学而倾囊相授。1988年7月赵政阳以优异成绩获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陕西省果树研究所果树育种研究室工作，专职研究果树生物工程育种和苹果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以迎合当时陕西苹果业迅猛发展的需要。此时他也意识到果业对陕西来说是一项前途无量的产业，因此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贡献给陕西的苹果事业。

没多久，他就因表现杰出，以陕西省果林研究所副研



赴加拿大学习考察



在张桥镇进行技术培训

究员的身份被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选派到澳大利亚深造——专攻苹果育种。

但这一殊荣并未使他沾沾自喜，反而感到肩上责任重大。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现代化的生态农业、先进的实验手段和高标准的苹果管理技术深深地吸引着这个莘莘学子。但洋人对第三世界国家留学生的傲慢与无理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就连他的指导老师 Jim 也概莫能外，Jim 对斯里兰卡女学生的态度就是明证。那是进实验室不久的一天，一位进修学习的斯里兰卡女学生，在做实验时因程序出了点小差错，当时遭到 Jim 一顿毒骂，令那女学生无地自容，羞愧地落了泪。这一切深深刺痛了正在一旁的赵政阳，他发誓一定要学好每一个理论，做好每一个课题实验，一定要让这个刁钻古怪又傲慢苛刻的洋先生刮

目相看,为中国人争气。于是,他利用维多利亚园艺发展研究所先进的实验室解决理论上的各种难题,节假日也不休息,查阅各种资料,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后来,人们只要看到夜晚实验室的灯还亮着,就知道那一定是赵政阳在里边做实验。Jim 很快就被赵政阳扎实的理论基础、工作的细心认真和有条不紊所吸引,开始对这个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学生倾心相授,此时的赵政阳也开始意识到 Jim 并不是一个毫于感情的教书匠,反而是一个最重情感交流的人。于是,赵政阳一做完课题实验,就有意识的和 Jim 闲侃,交流异国的风土人情,请教课题实验中的问题,Jim 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学习期未满赵政阳就和 Jim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赵政阳为了尽快将所学贡献给陕西的苹果事业,提前完成了深造学习的全部内容,令 Jim 伸出大拇指夸奖他 OK、OK。但此时的赵政阳归心似箭,对亲朋好友劝他应设法留在国外以图事业大发展的话置若罔闻,反而说他的事业在陕西、在黄土高原,因为他的根在中国。这更令竭力挽留他的 Jim 对他大加赞赏。

三、培育更多的良种

异国淘金开阔了赵政阳的眼界,拓展了他的知识。针对陕西省苹果规模大,品种单一,早熟奇缺,中熟偏少,晚熟过多,品种区域布局不合理,更新换代速度缓慢的现状,他深入市场,倾听同行见解,走访果农,了解果农对品种的需求,经过这样一番调查之后,政阳发现陕西苹果业在新世纪要跨台阶,首要和基础的就是选择良种,优化品

种结构,由此他提出陕西苹果品种的“三条腿”发展思路,那就是:“引、选、育”。按照这一思路,政阳开始着手运用生物技术进行果树品种改良。

赵政阳立足国情,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基础的品种引育上。为此他历经曲折从澳大利亚引进了粉红女士这个新品种。为了保证该品种引育成功,他将那来之不易的接穗上仅有的5个芽子,亲手小心翼翼地嫁接到杨凌果农朋友和表兄周晓明等5个苹果园子,并组织专人看管。为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每周都要深入各点观察生长情况,尽管如此细密周到,一年过后,5个芽却成活一个,但在第二年就挂了果。这使政阳极为兴奋,连续观察三年之后,政阳便将之推向了市场,由于该品种果面洁净艳丽,无果锈,病虫少,又极耐贮藏,很快受到果农的喜爱,目前已成为果农更新换代的新品种。

但政阳并没有被这个成功冲昏头脑。他知道富平10余万亩苹果需要他引进合适的苹果品种。于是政阳根据掌握的各地的土壤、气候、水分条件,为该县成功的引进了皇家嘎拉为主导品种,以藤木、安娜、酃夏、美国八号为搭配品种的早、中熟苹果品种,使该县被定为陕西省早、中熟苹果基地县。2001年7月下旬,该县就有苹果陆续上市,正好填补了全国南北水果的淡季,同时也使果农受益匪浅。很快,这些季节性强,市场潜力大的早、中熟苹果品种就被大荔、澄县、合阳、礼泉等10多个县市的果农所接受,推广面积达30多万亩。

但这并不代表政阳在品种引育的道路上是一帆风顺

的。在他引进的四十多个品种中,其中北海道9号,乔纳金、首红、太平洋玫瑰等品种,虽经过多点区域试验和系统观察,辛辛苦苦地搞了好多年,却终因市场、销售价格等方面的制约,树刚成形挂果,就得截掉更换新品种,仅此损失就好几万元。

作为苹果专家的赵政阳,知道一个优良品种在市场上的生命力也就是十到十五年,于是引育的同时,他将着眼点盯在了优良品种的选育上。经验也告诉他要想陕西的苹果走出国门,占领世界市场,就必须在品种的选育上要不断有新的突破,也就是说,必须形成:“生产栽培一代,示范推广一代,研究储备一代”的新格局。按照这一格局,政阳开始着手品种杂交试验,为解决试验基地问题,他风尘仆仆地回到青岗岭与表兄周晓明协商,周晓明毫不犹豫地就支持他将品种杂交选育繁育示范基地设在自己的果园里,并无私地帮助政阳搞试验。基地问题一解决,政阳就着手杂交选育,每搞一批,政阳都是亲自把关,指导采花、授粉,并做好试验的各项数据记录。因为他知道,尽管如此认真细致,要杂交选育出一个新品种,也只有千分之二、三的成功率,而且最快也得十五年左右的时间。

于是每到苹果花显蕾的时候,就成了政阳最忙的时候,这时的政阳忙着给花蕾套纸袋,并及时采摘,记好序号,一搞就是几千个,因为他知道稍有不慎就会使整个杂交过程失败。于是,干事认真的周晓明成了政阳的得力助手,需要劳力时,他从村上请来20多名技术骨干,一干就

是好几天。花蕾采下后,当天晚上的烤花粉就成了他俩的事,他们要将大量的花蕾烤干、研面,装入各自的瓶子,并限在天亮前完成,否则就会影响后面的授粉。烤花粉没有设备,政阳就自制土办法:上边吊一个灯泡,下面用纸围个筒状,灯泡高低由人掌握,因怕过低烧坏花蕾,过高起不到提高温度的作用,政阳就反复用手测试,一点不敢马虎,就这样完成了该项程序。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政阳连搞了四批杂交。有人问他成效如何,他幽默地说:“这是秘密武器,现在还处于试验阶段。”其实政阳比果农还急。

四、把苹果技术教给亿万农民

赵政阳认为“一项科技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基于这一认识,他将深奥的理论和实践揉合在一起,创造性地撰写出理论性强且易操作备受果农欢迎的科普读物。如《黄土高原苹果栽培》、《苹果园规范化管理技术》等。

在著书立说的同时,赵政阳更重视言传身教。1997年,持续数月的干旱,使渭北黄土高原几乎失去了绿茵,随处可见树枯枝干叶落的惨状,果园里到处是已失去商品价值的“皮球果”,果农怨声载道。作为全省主导产业的苹果产业出现了滑坡,政府和科技工作者彻夜难眠,赵政阳更是忧心如焚。于是他跑果园,逐个树的分析,做记录,并和果农一起探讨如何恢复元气,尽快扼制这个滑坡局面。回到杨凌,适逢省科委李建枝处长一行,政阳便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大胆设想——即苹果科技下乡全盘以陈述,得到李建枝处长一行的理解和支持,并迅速将之定名

为“百乡千村万里行苹果科技下乡”，由省科委主任孙海鹰解决活动经费，赵政阳进行具体操作。这下可忙坏了政阳，从拟定下乡专家人员和选择行走路线到连夜组织人员编写科技宣传材料，他每天都是连轴转。通过忙碌而紧张的准备，终于在1997年11月底，50名新老果树专家携带书籍资料和修剪果树用的锯子、剪子，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奔赴全省的24个苹果主产县。在短短的20天里，专家解决果农提出的问题就有500多个，办不同的果树培训班，受训果农超过了20万人次。当这一活动结束时，本就瘦弱的政阳更加黑瘦，用他的话讲：“我现在成了一个‘皮球果’了”！

赵政阳并没有就此停步，他又别出心裁地提出在全省各苹果产区实施优果工程。即在全省27个苹果主产县，每个县抓1000亩示范园，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辐射带动面上优果率达到50%以上。他的这一宏伟设想很快得到省政府的采纳，并将之定名为“2185”苹果工程在全省得以实施。作为技术总负责的赵政阳身感责任重大，他对专家们在业务技术上严格要求，进行培训，统一考试，合格者录用，同时要求专家签订所包乡镇的责任目标书。每月蹲点需在10天以上，抓一个百亩高标准示范园，每年为乡镇培训骨干技术员20—30名。

为了尽快将苹果技术教给亿万农民，政阳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概括出了新时期陕西苹果园规范化管理八大技术。即：高接换头、规范树形、果实套袋、疏花疏果、节水灌溉、合理施肥、果园生草、病虫害综合防治。深奥、复杂的理

论在这里变为果农适用简便的“傻瓜”技术,既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又有新特性和先进性,深受广大果农赞赏。但政阳要的不是果农的赞赏,而是要让果农深刻领会和熟练掌握这“八大技术”。他要求各苹果区驻点专家分别按生产季节,将“八大技术”分解后对果农进行统一辅导和示范,并分村组进行多点培训,一个时令抓一个技术环节,通过现场操作,讲课培训和印发资料等形式使果农真正掌握苹果管理技术的每一环节。

政阳的“八大技术”现已成为全省实施优果工程的技术依据和基础。他带领专家们在梅家坪镇筹建的千亩科学技术示范园为全省果业生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得到主管科技的副省长陈宗兴的肯定。

政阳的劳心费神也使他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他历经坎坷引进的皇家嘎拉苹果荣获 1999 年中国北京农博会名牌产品奖,红富士、酥梨等几个品种也连获陕西省优质农产品奖。他本人也因此被省农科院定为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和省“三五”人才。但奋斗者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政阳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的人生目标,那就是使黄土高原优生区的苹果走出国门,享誉世界。

名人档案

赵政阳,男,1964年11月出生,陕西省富平县梅家坪镇洪水村人。

1981年考入西北农学院果树专业学习,1985年7月被推荐为硕士研究生在西农大园艺系继续学习。

1988年7月获硕士学位。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果树生物工程育种和苹果新品种选育及其配套栽培技术研究推广工作。

1991年7月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94年12月被聘为院管副研究员,1996年被选拔为陕西农科院跨世纪学科带头人,1997年2月被正式聘为副研究员,又被评为陕西省“三五”人才。现任陕西省果树研究所所长。

用智慧撑起一片蓝天

——记 CCED 发明者、乾为天公司董事长朱崇君

本报记者 由保民 张更祥 李印功

磨难出人才

朱崇君如今是我国算得上几个青年计算机专家之一，他的多项研究成果，已被国家教委等很多部门定为计算机课程的必考内容。若论起他的成长经历则是坎坷磨难横生，艰辛困苦无数。我们专程去迤中采访了他的高中班主任王维耀老师。王老师告诉记者，当时朱崇君的穷困程度是现在的学生无法想象的：每学期上学无钱交书本费，朱崇君硬是一本一本地抄别人的课本；上学期间没有褥子，薄薄一床棉被陪他读完了三年高中；吃的馍全是黑



面、麸子加些野菜；因营养不良患病后，是王老师自己掏钱用自行车带上他一趟趟去医院看病……生活虽如此贫困，但朱崇君对学习却是异常刻苦认真，他是班上的物理科代表，平时星期天甚至寒暑假，他总是一个人钻在宿舍里，别人做一遍的习题，他总要做两遍，别人背不过的英语单词，他总要背得滚瓜烂熟……“寒门出将相”这是古话，朱崇君学生时代的艰苦生活，造就了他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这对他后来在事业上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软 件

计算机软件的研制是近些年计算机发展的核心，而计算机汉语化则是在我国普及计算机的必要前提，朱崇君的软件，正是为此而研制的。

说起，朱崇君有讲不完的故事，发不完的感慨。

一九八七的冬天，在清华大学读硕士的朱崇君到当时的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勤工俭学，他发现公司的人使用汉化制作表格非常困难，表格线要用区位码一个一个往上敲，于是便产生了一个想法：编写一个既能编辑文字，又能快速编辑表格的软件，于是他就回校设计研究。一个星期后，一个能完成此功能的解释程序诞生了，这就是 CCED 的雏形。它既能完成一般文字的编辑工作，又能根据用户给出的行数和列数自动生成规则的表格，并允许用户通过画线和抹线进行修改。公司的人使用后非常满意，继而又提出了保护表格线不因文字增删而移动、随意扩宽或压缩表格等要求，朱崇君都一一满足了。此外，

细心的朱崇君还注意到，他们制作的表格均为财务报表，一边制表，一边用计算器对表中的数据进行手工统计。于是，他又悄悄增加了一个功能：写一个公式，按一个键，就可对表中的一批数据进行统计运算了。公司的人对此大加赞赏，他们给《计算机世界》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了这个奇妙的程序。文章登出后的短短几天内，就有全国各地许多单位找到清华大学，要求使用这个程序，并愿意付酬。在用户的建议下，朱崇君将程序编译成单独可执行的EXE文件。天津大学力学系用450元购买了该程序的使用权——也是该程序的第一个用户。

“知识+劳动”产生了价值！一个穷学生第一次沐浴了改变窘迫生活的曙光！不久，联想公司也看中了这个软件，要求代理。出乎意料的是，在联想代理的三年中，销售情况竟排在了所有软件的最前面！

朱崇君后来又自学了C语言，并用C语言改写了程序，同时增加了一系列功能，于1991年底推出了CCED4.0版。1994年3月，与完善结合的CCED5.0版问世。1998年5月，更趋成熟与稳定的CCED6.0版问世。而1999年5月推出的版2000则使这一中文字表软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朱崇君悉心培育着自己的软件，就象一个母亲培养自己的孩子那样！

淡泊钱财的董事长

1996年，朱崇君在北京石景山高科技园区注册成立了北京乾为天电子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出任董事

长,他成了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的首领。

他之所以办企业,用心在于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摆脱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干扰,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当然,作为企业家的朱崇君也会考虑赚钱。众所周知缺钱一直是困扰中国软件业发展的切肤之痛。资金的匮乏不仅阻碍了民族软件企业在制作技术上的进步,也使其在市场竞争中难以获得规模化经营的优势;同时,也使绝大多数中国软件企业不得不放弃或精简自己的产品和企业的市场推广及传播业务。正是因这种状况,朱崇君搞起了经营,他要获得一定的经济实力,从而使自己的软件尽快推广,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尽快服务于祖国的经济建设。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朱崇君的“道”,就是不断为用户提供更新、更完美、更实用的版本,使大家用起来又方便又安全,以质量和信誉赢得用户。每当有新版本研制出来,用户急于购买的时候,他却迟迟不让新版本上市,而是免费提供测试版,让用户无偿使用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在一些人看来,他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绝好的发财机会,但朱崇君却说:“大型软件需要一个测试、维护和再完善的过程,我希望新版本达到实用、细腻、可靠、安全的最佳状态。这样,当用户拿到正式版本时,相对来说是最好的。我不能既让用户花钱,又让人家承担开发者的实验风险。”

除开办公司外,朱崇君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于我国计算机的普及教育,无偿为国家和许多省市的计算机应用考试编制了大量的上机考试软件。如:原国家劳动部主

办的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技术(DOS系列)考试的自动评分软件;原国家教委主办的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B(第一、二届)考试软件;团中央“千宫百万”活动青少年计算机考试(第一、二届),北京市成人自学高考中的计算机基础课程考试,辽宁、新疆干部计算机考核等考试软件,他还被中央电视台及许多省市台邀请,在电视上为普及计算机技术而讲课。

朱崇君不善巧言会色,只会踏踏实实做事,这位当年清华的高才生,非常执着于自己的科研事业,他于1999年被吸收为石景山区政协委员,并被推荐为北京市“十佳青年”候选人。

我们预祝:朱崇君的软件事业蒸蒸日上!

我们预祝:朱崇君能为富平人民争更多的光!

名人档案

朱崇君,男,我县小惠乡人。一九六四年生,现为北京乾为天电子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工程师。

朱崇君一九八一年由逸山中学考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一九八六年本科毕业继续在清华攻读硕士学位。一九八九年获得管理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后,分配到国家科委信息中心工作。一九九三年出任原国家科委北京太乙机电高技术公司总工程师,并承包软件工程部。一九九五年在八大处高科技园注册成立北京乾为天电子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一生追求无止境

——访著名学者杨军教授

本报记者 由保民 井来成 党延兴



杨军教授近照

著名学者杨军(笔名若文、富言),是我县老庙乡笃枯村人,他虽是农家子弟,但却著述颇丰,声誉日隆——是武警部队诸多院校中影响较大的教授,陕西省报刊评论界知名度较高的编审,西安地区文教系统有一定名望的学者。

杨军的人生道路,有少许的宁静平坦,更多的是坎坷崎岖。1961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也是他人生征程的真正起点。在这个全国名列前茅的著

名学府，诸多蜚声中外的学界大师、名闻遐迩的专家教授道德风范、人生追求与生活逻辑，时时浸润着他、濡染着他。他立志要做一名学有专长的人，像他们那样报效祖国。他的老师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独占鳌头，杨军的第一步目标是考这位老泰斗的研究生，于是开始了悬梁刺股的艰苦奋斗。师生之间、同窗之间，在各自的艰苦奋斗中结下亲密无间的友情。5年的“北师大日月”一眨眼过去了，给学子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其中铭刻在杨军心中的，还是北师大培育的奋斗精神与坚定志向。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夜之间把美好的“北师大日月”冲刷得荡然无存，“亲密无间”霎时变成了“剑拔弩张”。杨军崇敬的大师们一个个成了“反动权威”，他的美梦被撕成了碎片，他的心也被震裂了，在淌着血！此后，他被当作资产阶级苗子“发配”到祖国的西北边陲新疆，开始了“再教育”的生活，登上了坎坷之路。这时，连一般的文化书籍也被当作“封资修”而不容许沾手，他在这各种困难中挺了过来。杨军无法忍受时光这样毫无价值地流逝，他了解到新疆图书馆有大量中俄关系方面的资料，就想方设法与该单位一位熟人进行了秘密协定，那位同志冒着风险，定期给他提供当时仍被视作资产阶级性质的有关这方面的中文版、俄文版书籍。杨军不得不舍弃他熟悉的“史学史”研究而改为中俄边境历史沿革问题研究。这是他依据当时条件所作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谁知好景不长，晴天来了个霹雳！他在脸色一天比一天腊黄、肌体

一天比一天消瘦中走进了医院，几大医院会诊的结果是惊人的一致：肠癌！那时，“癌”字足以将人吓个半死，然而杨军的精神没有被击倒。病友们窃窃私语：“这人最多半年，”“半年？3个月也不一定熬到”，他听到后置之一笑。他一方面作好了离开人世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积极地配合医生治疗。他想，能活一天算是一天，该活一月结果活了两月就是胜利！面对治疗中的巨大疼痛，他咬紧牙硬撑过来。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后有了正果：他活下来了。尽管如此，七八年的时光又这样地流逝了，中俄边境历史沿革问题的研究也化为泡影。

活下来就要干下去！被癌症曾经泯灭的奋斗精神与坚定志向又复活了。他当时在新疆第四建筑公司任干事，病未痊愈就跨进了办公室，工作之余又捧起了专业书籍。出色的工作得到上上下下的赞誉，公司党委按当时2%的奖励工资政策给他提升了一级；又准备给他宣传科或秘书科领导的职务，他婉言谢绝。他要求调回内地，因为老家还有年迈多病的父母无人照看，实现自己的志向也得面对现实！

1982年5月调入武警专科学校后才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然而这已是毕业16年以后的事儿了。学术研究上的竞争是以分秒计算的，晚16年意味着短缺了半辈子的学术生命！对此，他不气馁：只要奋斗精神与奋斗志向不跨，就可急起直追！就在这时，母亲连年发病，后来病倒在床，他不得不经常请假，从学校所在地山西夏县回来照料，这就需要大量的时间付出。针对这种情况，他只好将

研究资料带到病床旁边，“照料”与“研究”兼而有之。他1988—1989年发表在几个大学学报上的《论戊戌革新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操》、《试析清代火灾的历史教训》、《戊戌革新运动资产阶级性质异议》等9篇历史论文，均是守在母亲病床旁，就手头的现成资料写成的。这使他追回了一些无为逝去的时光。这期间，该校有关领导依据他的能力与表现，考虑给他一个正团职领导职位。他依据自己曾经患过癌症的身体状况，对此也是婉言谢绝，他选择了生活比较规律、作息时间稳定、无须加班加点的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身体出人意料的恢复使他高兴万分，奋斗精神也与之俱增。几多奋斗几多收获，他的教学成果、学术成果得到了公认，1988年武警部队首次评职称时，他越过助教、讲师的台阶，直接由一名在高校工作不到6年的教员晋升为副教授。调入武警工程学院后，又于1993年晋升为该院副教授、武警部队期刊编审，后被晋升为教授。

坎坷的人生道路，给他学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奋斗不息的精神与坚定不移的志向，又使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报刊之友》、《武警工程学院学报》、《书海》、《武警教育》、《文化视角》等报刊都有专文介绍过杨军的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含学术成果评价），对杨军的总体评价是：知识面宽、著述面广、思想深邃、反应快捷。

有人说杨军是个杂家，这个评论恰如其分。在新疆工作期间，主搞新闻报道的同时，兼负理论教育，常给全公司干部讲授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到武警专科学校与武警

工程学院后,应两校之急需,先后给本科生、研究生带过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大学语文、基础写作、论文写作、中外历史、形式逻辑、新闻编辑学、大众传播学、孙子兵法课程,兼任西安交通大学外国留学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报刊课;并与西安地区高校、科研单位联系,进行古籍注释翻译工作,进行社会心理学、报刊批评学等的专题研究。近几年来,经邀请,在部队、地方、本院作过有关历史文化、外国文学、文艺创作、论文写作、新闻写作、思维创新、《孙子兵法》等方面的学术报告与专题讲座十多次。胸中囊括了社会科学的主要门类,并将触角伸进军事科学领域,形成了较为宽广的知识网面。他写的专著与论文,涉及到文学、语言、历史、新闻学、传播学、伦理学、社会心理学、报刊批评学、军事后勤学诸多领域。其知识渊博、涉猎之广,由此可窥一斑。

杨军在其学术生涯中,涉猎面广,但并非是泛泛而论,而是扎扎实实做学问。他正式出版专著4部,主编、参编专业性书籍、教材十多部。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报刊月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以及十几家大学学报上发表学术论文、书评、报评、刊评文章114篇,并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实践进行了理性抽象,凝结为《实用性学术论文写作通论》一书,由陕西教育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在全国较早地推出这一方面的专著。杨军在文学创作上也有扎实的功底,他在发表短篇小说与散文的基础上,写出了近4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宫灯》,由陕西旅游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一些报刊

对其作了较高的评价。杨军还发表通讯、报道、报告文学等新闻作品 130 余篇。

深邃的思想和敏捷的才思使其著述能力特强，在互不支撑的三维空间各自驰骋，而且“驰骋”出各具特色的风采。首先，杨军在古代汉语研究领域里，权威性专著与教材中的“名词用如动词”的观点十分叫响，众多专家对此专设章节论述，《辞海》、《辞源》以及其他大部头典籍均采用这一观点。杨军敏锐地发现这一观点难以自圆其说，先后在两个大学学报上发表《古代汉语“隐型兼语”初探——关于名词的分化与演化现象》、《古代汉语“名词用如动词”的提法应当否定——兼论简单兼类词与复杂兼类词》二文，针对权威性观点发表了否定意见，并在国内最先提出“名词的分化与演化现象”、“简单兼类词与复杂兼类词”的概念。此二文先后被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1983年第2期、1987年第3期转录后，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其次，在军事科学领域，他的《古代军事后勤思想对当今武警后勤的借鉴价值》一文，针对古代后勤思想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构建了这一方面研究的大致框架。其观点之新、论理之深，得到军事理论界的好评。他主编的《处置突发事件后勤保障》一书，已在1995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与人合著的《现代武警素质》一书，由群众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他主编的《孙子兵法与武警作战指挥》一书，即将在海军出版社付梓。这些书，均有不少新颖深邃的观点。再次，在报刊审读领域，近年来，他的报刊审读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大的影响，尤其对《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新华文摘》等大报大刊的评论引人注目。由他执笔，以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名义发表的《陕西报刊系列探》4篇文章以及《基本估价与殷切希望——对9种报纸的综合评价》，得到同行们的首肯与赞许。他的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中心复印以及被《穆青新闻作品研讨文集》、《楼外楼博议》、《五光十色的多棱镜》、《报刊审读初探》等正式出版的书籍收录的有23篇。《报刊之友》1998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专门评价他审读工作的文章《大校审读员》，其文中有一段说：“扎实的理论根底，丰富的工作实践，使他在审读、评论工作中得心应手。无论是他的审读报告，还是评论文章，都使人感到其知识宽广、思想深邃、内容充实、角度新颖，体现出理性思维的风采”。这段文字所指的方面虽然宽泛，但对其思想深邃方面的评价，却是非常中肯的。

杨军的教学成果、学术成果是丰厚的。如今他已退休，步入人生的黄昏。但他不满足于摇着蒲扇，带着孙子的悠闲自在，仍在奋斗不息，身兼陕西省报刊审读员、魏征研究会理事、西安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等5种常务性的学术职务与6种报刊的专栏作者，而且还负担着古籍的注释、翻译工作，仍然笔耕不辍，孜孜以求，老而弥坚，奋斗精神不减当年！

名人档案

杨军,1941年生,我县老庙镇人,196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大革命后被发配到新疆,后调回陕西武警工程学院任教。

杨军教授的学术成果颇丰,涉猎较杂。他不但对历史、古汉语、报刊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还曾创作过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在陕西报刊评论界有着较高的知名度。

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者

——访青年经济学家江濡山博士

本报记者 由保民 李印功 张更祥 党延兴

北京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中,有一位只闻其名,少见其人的学者。他叫江濡山,我县到贤乡盖村村人,现任“亚太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江濡山,1985年毕业于陕西省工学院,参加工作数年后曾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后又进入奥地利格拉茨工业大学学习,现为经济学博士。他是位比较特殊的学者。大学毕业后曾给领导当过数年秘书,29岁时就干到了正处级,还任过陕西省进出口商品贸易公司总经理。但因种种原因,如今走上了做学问这条道。我们采访组年初在北京采访过他,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太年轻,今后的路还长,没有成功。后来在一册内参上看到了北京记者对他的采访文章,现摘抄其中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记者:江博士,听说您以前曾为一些高层领导担任过秘书,您本人在地方也担任过“一把手”,现在许多领导的秘书都纷纷栽倒,当了替罪羊,而您却独甩清袖,离开官场,您现在仍同一些高层领导个人交情甚好,凭您的年龄和才智,是不是若有机会还欲回到官场。能否谈谈您过去从官经历。

江濡山:坦率地说,前两年我还有些“贼心不死”。但现在我算是死了那条心。我现在是一心一意做学问、交朋



江濡山博士在北京办公处

友、搞研究，顺便挣点零花钱。

在许多人眼里，我很幸运。连我们村以前的老饲养员都说我是干大事的。1985年我大学一毕业，就赶上了当时的省委书记白纪年制定的新政策：“选一批优秀大学生派往基层锻炼5年，重点培养。”所以我毕业后直接到省委组织部报到，经过短暂培训后，就下派到基层锻炼。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是中共陕西省铜川市委办公室。上班第一天就给领导写材料。半年下来，我写材料的功夫就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在以后二、三年里先后给几任市委书记担任秘书。这段时间是我人生经历中最深刻、最有意义的。因为我从周围各种风格的领导身上学到了他们的组织管理和领导才能。也是在这一阶段，我下决心

将仕途之路走到底。我当时感到：当官竟然会上瘾。但我更明白，中国未来需要的肯定不是这种权术型官员，而需要知识型官员，于是我暗自决定，要上研究生。后来我报名参加了中央党校研究生班的学习。

官场历来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不介入争斗，就必然会被淘汰出局。我在铜川市委、市政府工作期间，一度因涉世太浅，得罪了个把人，被派到农村去负责整党和带领农村干部创办乡镇企业。没想到我带领两位市委机关干部

下到农村后，在整顿村办煤矿、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创办非煤产业等方面，抓出了成果，成为全省先进典型。

八十年代末，我被调往省城，在省外经贸厅系统工作。省政府委托我筹建了一个新的省级外贸公司——陕西省进出口商品贸易公司，我被任命为法人代表兼总经理。不久，我又被派往欧洲，出任华隆



江涌山博士在意大利米兰市考察市场期间留影

国际贸易公司总裁。

到欧洲之后,我到许多国家作了市场考察,第一次亲眼见识了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由于大学毕业后,我一直没有中断自己的学习,加上六、七年的官场、商场经历,使我逐渐下定决心继续深造。于是我进入奥地利格拉茨工业大学系统地学习经济学,并成功地帮助该校一位台湾籍的华裔经济学家完成了两个政府研究课题,并获重奖。从此,我下定决心,从事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

记者:江博士,从您的经历看,你离开官场和商场似乎令人惋惜。看来您不是那种不善于官场和商场角逐的人。做一个学者,给人的感觉没有当一位高官或做个百万富翁有影响力,您对此有何体会?

江濡山:这是个人人生观问题。我现在要回到官场很容易,而且我若重出江湖创办企业,也会得到许多大亨级人物的支持。但我做学问的信念之所以这么坚定,就在于我身后有许多商场和官场的朋友靠我“吃饭”。我从不死学,也不愿到大学做清闲自若的教授。我是一只脚在现实社会,另一只脚在我的书房。我现在供职的研究机构实质上是为党政官员和企业家提供研究资讯服务的智囊机构。我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吸纳了海内外近百位著名专家学者,主要从事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里诸多现实问题的研究。我们现在有超过五千家的会员单位,有近万名党政机关和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每天、每周都要接受我们的研究资讯服务。这是我的事业。我做人的思维模式,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事业是什么,然后再考虑这个事业能

为自己带来多少精神和物质的财富。经商办企业也是一样,如果你把企业做为你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那么你就不会有短期行为,你就会把眼前利润放在第二位。当你的事业辉煌后,自然会带来财源滚滚。

记者:现在社会上有这样一种现象,不少人因经不起眼前利益的诱惑而牺牲或错过了更大的发展事业的机会。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江濡山: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大凡每个人都难以拒绝利益的诱惑。这对“利益中人”,比如就企业家而言,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他的“本份”,企业挣的钱越多,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但对于“非利益中人”而言,应把握财富与事业、名与利的“均衡”。人生本在名利间,有名的人“名”自然会给他带来“利”,否则是徒有虚名;有利的人会用利去换“名”,否则是没有才学的暴发户。但是名与利权衡的度是否把握得好,关键看个人修养。

我讲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担任陕西省进出口商品贸易公司总经理期间,一位港商到我办公室送来一箱现钞,少说也有30万人民币。这位港商是上级机关某领导介绍相识的,当时为了完成政府的创汇任务,出口物品的价格就报得很高。港商赚了钱,就说:这点意思是额外表示。而我当时毫不犹豫就让财务人员将这笔钱充了公,并宴请这位港商的“好意”。而没过多久,我的一位上司却栽在这位港商的案件中,我也因此坐了三天班房受审。

记者:现在社会上还有一种现象,民营企业喜欢“傍大官”,一些官员也喜欢“傍大款”。这种现象造成了明

显的企业竞争不公。对此,您能从经济学的角度谈些认识吗?

江濡山:从本质上讲,我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市场规律。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由于现行政府格局与民营企业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政府在日常工作中为你提供服务和不为你提供服务都可以说得过去。于是在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家之间就形成这样一个“灰色交易市场”:一头是政府官员个人需要钱,另一头是民营企业家需要政策和资源。这种双向供需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交易。我们反腐败若反得过火,这种交易就会大大萎缩,民营企业家的生存和发展成本就更大,因为合法、公正、公平的交易市场一直没有形成。

记者:我们的一些同行说,您不大愿意接受采访,不愿著书立说,只是喜欢交朋友、瞎吹牛。云南世博会期间,您在一次高层研讨会上的讲话,被一位记者未征您的同意在报纸上刊发之后,您差点同那位记者打官司。请问您是不是觉得“出名”有损于您的发展?

江濡山:谁说他不愿出名,那肯定是骗人。问题是什么时候出名,出什么名,值不值得出名,关乎到一个人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影响。我之所以接受你们的采访,是因为你们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直属的媒体,而且是在你们内部参阅清样上刊发。如果是在公开媒体刊发,我自然不愿配合。我也因此得罪了不少记者朋友。我想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我的。

你们知道，去年以来，中国舆论界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敢讲真话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竟遭到来自方方面面和利益集团的攻击。为了声援吴敬琏，我主编了一本《经济英雄——吴敬琏》的书，结果问了十多家出版社，都因为怕惹麻烦而不敢出版。这令我很伤心。

记者：据说，世界经济与社会自然发展联盟出版的《经济情势报告》在国际上很有影响。1998年由您主笔的某期报告，就中国的粮食改革提出了一些比较尖锐的看法，《中国经济时报》几乎是全文转载。事后中宣部对该报社提出严厉批评并点名不能再刊登您的文章。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江濡山：中宣部的一位领导事先向我吹过风，说这是上面的意思。当时，我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政府对粮食问题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轻信西方人的造谣。因为当时中央曾专门开会研究过美国学者布朗的文章。布朗说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场巨大的粮食危机。结果我们的一些专家就坐不住了，建议中央及早防范。但是政府应当看到我们现行粮食体制的弊端，不能轻率决策。第二，粮食也是一种商品，政府参与粮食收购，必须考虑到商品经济的规律。绝对的统购统销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违反了市场规律。第三，投巨资建粮库，是为地方腐败分子办好事。事实证明，许多地方肆意挥霍建库款，盖了很阔气的楼堂馆所，有的地方虽建了粮库，但库内空空如也。据估计，几年的粮食改革，正负损失数千亿元。最近，有关部门邀请我出席粮食改革会议，我倒觉得很有面

子。不过在此次会议上，我当着许多领导面又放了一炮：粮食问题不是关键。农村改革的焦点在于土地政策。我向中央提出了这样一条建议：所有农村人口，可以保留部分“口粮田”，并法定“口粮田”不能买卖。其它土地应彻底分配给农民，并允许其自由买卖。可借鉴澳大利亚的政策，土地每交易一次，政府收一次土地交易税。与会者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

江濡山的学问，从来是针对市场实际和社会实际来做的，他的许多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国家高层领导人的关注。他从当秘书开始，从来没有忘记过养他育他的家乡人民。2000年，他投资28万元，把到贤镇盖村的东西、南北约长800米的街道用水泥铺筑一新，为村民们办了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受到了当地群众的齐声称赞。

名人档案

江濡山，我县到贤镇人。1985年毕业于陕西省工学院。曾干过数年秘书，任过陕西省进出口商品贸易公司总经理，后辞官搞学术。曾在欧洲学习，现任亚太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在市场经济理论方面，有着许多独到见解。

志在播绿

——访西农大经作栽培、育种专家杨吉安

本报记者 由保民 李印功 张更祥

巧遇乡党

2月22日，富平报在外名人特别报道组如约来杨凌采访。

碰巧的是，接待我们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展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张会玲，是富平乡党。一见面，她就热情地招呼我们到她的家里做客。

在她的客厅刚一落座，我们就发现对面的桌子上有两个精致的奖牌，获奖者均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



杨吉安(中)接受保加利亚 Plovidiv 农业大学校长颁发硕士学位证书。



杨吉安(左二)与保加利亚 Plovidiv 农业大学校长交流

经济植物栽培、育种专家杨吉安副教授。“杨吉安是……?”“是我先生。”我们喜出望外:他就是我们此行要采访的富平在外名人之一。

听了我们的来意,张会玲说:“宣传富平在外名人,这是个好主意,不过我先生杨吉安比起咱富平人在杨凌干出大名堂的杨公明、杨公社、赵政阳来说,简直算不上啥。”正说着,杨吉安回来了。

从寒暄中得知,杨吉安的家在原长春乡谷张村,张会玲是原雷古坊乡雷北村人。他俩是原西北农业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分配留校,杨吉安当教师,张会玲搞行政,男“耕”女“工”,比翼齐飞。

情系家乡

乡党见乡党,乡情话最长。杨吉安、张会玲说,他俩春

节期间,携女儿回老家过年,和父老乡亲谈论最多的是家乡的发展,家乡发生的一切都令他们魂牵梦绕。“长春乡撤后并入庄里镇”,“雷古坊乡撤后并入美原镇”,“富觅公路拓宽改造后,人们就不会再说富平好路只有二里半、中间还有个收费站”,“去年《陕西日报》报道富平调整产业结构,我们在办公室把报纸看了,还拿回家来看”,“我们经常在一块谈论富平,如能利用我们在外工作的有利条件,为家乡发展办点实事”……言之切切,情之真真,家乡情结,溢于言表,令我们感动不已。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家乡”二字在富平在外乡党心目中的份量和位置。

出国深造

1996年9月至1997年11月受国家教委公派,杨吉安去保加利亚 Plovidiv 农业大学深造,主修生物新技术,获得农学硕士学位。保加利亚是世界上著名的“玫瑰之



杨吉安接受埃塞俄比亚农业部副部长颁发证书



杨吉安在埃塞俄比亚讲学

邦”，其玫瑰品种及加工利用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在那里，他以玫瑰为研究对象，全面的学习和掌握生物新技术。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他时时刻刻表现出争分夺秒的坚毅。虽然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有他崇敬的导师，有良好的学习实验条件，然而深厚的爱国之情使他日夜关心着祖国的经济建设，尽快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生产开发。学习刚一结束，他就乘上了归国的班机。他的目光凝视着东方，他仿佛看见了长城挺起的脊梁，看见了黄河奔腾向前的波涛。飞机一着陆，他便感到了格外的亲切踏实，走出候机大厅，看到熟悉的土地，他感觉到了东方文明在新的时代更加璀璨！回国时他带回了30个玫瑰及李子、樱桃和葡萄等优良品种，并促成了学校和保方玫瑰研究所的学术互访，促进了学校的对外交流。1998年被评为陕西省优秀留学回国人员。2001年6月至8月受国家

农业部委派,以高级农业专家身份赴埃塞俄比亚执行“农业职业技术培训”项目,圆满完成任务,受到埃方农业部的高度赞扬。此次活动是我国首次派出高级农业专家组成强大的高级讲师团赴非洲开展的一次具有开拓性的事业,促进了中非农业合作项目的发展。

播种绿色

杨吉安是农民的儿子,他时刻牢记着自己神圣的使命,自觉地把农业科研和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热诚地服务于农村、服务于农民、服务于农业经济建设。十七年来,除了教学工作而外,杨吉安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他先后作为主要参加人或项目负责人,完成了6项科研课题,先后完成了国家“七五”和“八五”重点攻关课题——“淳化黄土残塬沟壑区开发治理及农业持续发展研究”子课题任务;完成陕西省科委重点科研项目“洛南



杨吉安(右)与张康健教授做杜仲优树测定

扶风隔年核桃树选育”和“岚皋林业综合技术开发”；参与培育了6个核桃良种；完成了陕西省农办下达的“紫阳县农业综合技术推广”，“秦巴山区千株野生板栗改造”和“杜仲综合开发技术”三项科研承包项目。其中“淳化黄土残塬沟壑区开发治理及农业持续发展研究”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岚皋林业综合技术开发”获陕西省农村科技进步一等奖、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星火三等奖；“紫阳县农业综合技术推广”获陕西农村科技进步一等奖；“杜仲综合开发技术”获陕西省林业厅科技进步一等奖，获陕西省科技推广一等奖。目前还在继续进行的科研项目有陕西省科委重点项目“杜仲系列产品开发研究”；国家948引进项目“玫瑰精油加工技术引进”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森林、树木与人类”项目。自任职以来，发表科技论文18篇，获全国优秀论文奖2项。现任中国经济林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林学会杜仲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农学会葡萄研究会理事。1996年获陕西省首届青年科技奖。

渭北旱塬沟壑、商洛山地河川、秦巴山区的群山峻岭无处不闪烁着生命的光辉。他在向生命之域的探索中，寻找着可持续发展之路，开发富有广阔前景的支柱产业。在他科研成果的转化中蓬勃出农民坚定的信念和农村日益繁荣的新局面。

十七年来，他把农村科技推广和科技扶贫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从1989年开始，杨吉安响应陕西省“科技兴陕”战略，长期深入秦巴山区的紫阳、岚皋和镇安等县开

展农业综合技术与推广,编写科普资料,举办技术培训班,建立科技示范园,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治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曾获陕西省“科技兴陕”先进集体称号。《中国林业报》以“献给山区的赤诚”报道了他们的工作。1997年12月初,他放弃休息的时间参加了陕西省科委组织的陕西省苹果科技下乡“百乡千村万里行”活动,历时一月之久,跑遍宝鸡、咸阳等13个苹果主产县,科技下乡成绩优异,获得了陕西省科委的表彰。

一片片的果园,一双双渴望的目光,接受着春的信息。他耐心地传授,耐心地演示,耐心地指导,为了明天的绿色,他倾注着更大的心血。

名人档案

1960年10月11日杨吉安出生于原长春乡谷张村一个虔诚于农耕、善良本份的农民家里。

1980年7月高中毕业后,他考入原西北农学院园艺系,攻读果树专业。

1984年7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原西北林学院经济林教研室从事教育、教学和科研推广工作。自任教以来,他先后主讲了《经济林栽培学》,《药用植物栽培学》,《经济林种苗学》,《生物技术》以及《专业英语》等五门课程。

1996年获陕西省首届青年科技奖。

现任中国经济林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林学会杜仲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农学会葡萄研究会理事。

青春似火

——记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方红卫

本报记者 张更祥 由保民

(一)

知道方红卫这个名字,纯属偶然,这首先得感谢迤山中学的王维耀老师。记者去迤山中学,王维耀老师告诉记者:他有个学生在陕汽当老总,叫方红卫。因名字太顺口,我们便记下了。时隔数天,记者去西安办事,顺便向乡党打听到他的电话号码,一拨,通了,他还真在陕汽!便约了时间。从心底说,记者只想去聊聊。陕汽集团是万把人的企业,听说方红卫才30来岁,能是老总吗?



方红卫陪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万国权、省委书记李建国、省长程安东观看工厂展示台。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曹刚川部长合影留念

当记者坐在陕汽集团的办公楼上等待时，多半将目光投向进来的那些中年人甚或青年人……方红卫一阵风似的进来了，但只瞥了一眼我们，就伸出了手：“你们是富平乡党吗？”当得到肯定回答时，他灿然一笑，便把我们拉进了他的办公室。

方红卫中等个，胖胖的，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看上去象个小青年！给我们倒了水、散烟后，几句话说过，我们顿觉眼前一亮，这个青年绝非一般：才思敏捷，老诚持重，干练精明，彬彬有礼，恰到好处……

(二)

方红卫 1989 年到陕汽。1990 年正是亏损压得陕汽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当时人民日报内参有篇报道《陕汽总厂亏损 7000 万，已越过破产警戒线》，当时的国务院副

总理朱镕基、邹家华均有严厉批示,实际上,连续4年的亏损再加上潜亏,累计已超过亿元!在企业形势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方红卫为什么当时选择了陕汽?当我们问过这个话题时,他淡淡一笑:“我的同学有的去了美国,有的留在北京。可我觉得,一个人要干点事情,条件优劣当然重要。条件好了把事能干好;条件差关键是要有事干,只要适合自己的口味,经过不懈地努力,也能把事情做到极致,也能干出个名堂来。况且我是陕西人,给家乡人做事,不是更有干头了吗。”

方红卫一踏入研究所的大门,就没有把自己当外人,一头钻在设计、试验、创新的业务中去了。他有极强的领悟能力,又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一个大量复杂的技术难题,在他面前迎刃而解。他参加并多次主持大型整车道路试验。特别是1999年,担任总厂副厂长的他,是“9910工



方红卫在上海车展中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程”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保质保量地完成 SX2150、SX2190 的生产,两个系列 78 辆重型军用越野车分别装载牵引“防空卫士”和红旗导弹等各式先进武器组成 4 个方队,驶过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他作为汽车技术服务队队长,荣幸地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五十周年国庆阅兵盛典,这次活动,壮我军威,为国争了光,企业受到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嘉奖,方红卫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成为领导班子主要领导并主持日常工作后,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积极运筹企业改制工作,整合宝鸡、华山车辆厂,联合陕西东隆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卡福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弹簧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企业,构建规范的多元投资母子公司。使陕汽集团公司成为全国重型军用越野车、重型卡车、中型卡车、各类大客车底盘和大客车 4 大类、16 个系列、200 多个品种的重型汽车制造基地。在



陪同贾治邦副省长参观工厂

经营管理中，企业通过这次资本结构的优化组合和合理的资源配置，集团公司将带动省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促成省内以重型车为纽带，联合各专用汽车厂、零部件企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逐步发展成为有明显优势和专有技术的重型汽车企业集团，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三)

方红卫，清华汽车专业毕业，对汽车了解与研究他是内行。同时他还是高级经济师，又负责陕汽的财务工作几年，这让我们觉得好奇。问他时，他又是淡淡一笑：“企业要有领先的技术，这是肯定的。企业还要有先进的管理，这甚至比技术还重要！而管理就要用制度，定制度就要懂得经济指标，比如成本、比如价格，比如核算，比如企业发展的融资、资金的调整、资金的分配……这些东西你吃不透，你怎么能做好管理工作呢？”

方红卫在领导财务、企管和学邯钢期间，针对陕汽当时的市场观念淡漠、管理基础薄弱以及体制造成的经营十分困难、进而影响到职工情绪等现状，组织全厂各单位深入开展学邯钢活动，以树立市场意识；落实成本及效益责任，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形成一个闭环的运营和考核体系为目标；制定了更加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对有关企业发展的重要课题进行重点攻关，有选择、有步骤地把一些辅助单位推向市场；对一些具备条件的生产分厂实行准法人运行机制，实施了管理项目责任制和经济责任承包考核，使责任由总厂传递到分厂处室直至班组，做到人人头上有指标，个个指标有考核，极大地调动了基层单位和

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他还主持修订原材料、外协配套件的降价工作，主持制定了一系列与市场接轨的企业管理新制度，为企业提高管理水平、降低成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企业由粗放型管理逐步走向质量效益型的精细管理，为企业扭亏为盈和在 2000 年、2001 年连续两年平均以 40% 以上的速度跳跃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方红卫亲自策划、实施了陕汽集团的销售网络，开创了销售工作的新局面。由于原重汽公司实行统一管理，陕汽的销售机构建制划转为重汽公司所属，从而使陕汽丧失了市场开发和技术开发权，企业一直靠每年 600 辆份左右的老军车吃饭。在这种困难面前，方红卫顶住原重汽公司的巨大压力，重新组建自己的销售队伍。他克服销售人员奇缺，长期和市场脱节等重重困难，从招聘人员开始，很快组织起有五个部门组成的销售公司并整体运作，开始了制度建立、市场调研、网络建设等一系列工作，建立起具有整车销售配件供应、售后服务及信息反馈四个职能，覆盖全国的销售服务网络确保了企业的稳定发展。他坚持以树立品牌为长期的市场战略，积极开展“双优”工程推行“贴心”服务，用文化来传播企业和产品，用产品体现文化追求，传达企业对社会的关爱，以同行业质量最优和服务最优抢占上海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市场，建立起了以“双优”为代表的陕西品牌形象，产品还出口到新西兰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被评为出口质量信誉良好产品。继 2000 年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62% 和 68%，出口创汇 400 万美元的基础上，2001 年产值

和销售收入双双突破 12 亿,利润总额和利税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160%和 60%。今年一季度,又以产值和销售收入双双突破 4 个亿,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110.33%和 84.65%的高增长率,实现开门红,再创历史新纪录!

方红卫令人羡慕,一是他的才干,二是他的业绩,三是他的年龄!最近,他又荣获第二届“陕西青年五四奖章”,为富平人争了光,也为陕西人争了光。我们祝他今后事业上有更大发展!

名人档案

方红卫,1966年8月出生在我县小惠乡。1984年迤山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学习。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系后到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当时为陕西汽车制造总厂)汽车研究所从事产品开发工作。1995年5月至1996年11月任财务处副处长。因业绩突出,1996年11月提升为总厂副厂长,主管财务、销售,并相断升任常务副厂长、集团公司总经理。

珠联璧合成大业

——记西化热电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贾双社 总经理王增战

本报记者 郭建军 由保民 党延兴

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记者来到位于古城西安西郊的西化热电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碰巧的是见到了要采访的乡党王增战、贾双社，和两位乡党一见面，浓浓的乡情亲情一下子使大家打开了话匣子，从他俩统领的西化公司说到家乡的经济发展，记者从中了解到西化热电公司的今日和灿烂的明天。

—

西化公司的前身是西郊热电厂和西安化工厂，是个1958年建厂的国有大型企业。热电厂是新兴的环保企业，公司现有资产12亿，职工4000余人，年产烧碱7万吨、电石2.5万吨，聚氯乙烯树脂6.2万吨，液氯25万吨，盐酸7万吨，产电3.5亿度，供热480万吉焦，年总产值3.8亿元，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氯碱化工生产企业和西安市的环保企业。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潮中，西化公司和所有国企一样，也经历了迷惘、困惑，甚至大面积装置停产，职工待岗的惨淡日月。曾被西安市政府列为全市重点限亏企业，在全市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的王增战和班子成员，面对着这巨大的压力，一度时

间,他们忧心如焚。为了给企业寻求一条活路,王增战可没少下功夫。他一方面亲自向职工讲明企业所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发展机遇,希望职工理解企业所采取的措施。一方面,他做好待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过节时为困难职工发放了补助金,由于工作措施得力,西化厂的职工平静的面对了这个不愿看到的事实,保持了企业和社会的稳定。

在经营不景气的三个月中,王增战走南闯北搞调查、分析市场找出路。回到厂子又一头扎进生产一线和职工谈心谋划企业新发展。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他深刻地看到,只有将“学邯钢”活动扎扎实实开展下去,在生产成本上下功夫,企业才能走出困境。西化厂主要产品的生产成本,一直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王增战参考了行业平均水平和企业历史最好水平,制定出了以成本和费用考核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并付诸实施,两个月后,主导产品聚氯乙烯的生产成本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下降,第三个月实现了当月生产经营盈利。以成本费用考核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在全厂迅速推广,职工们首次拿到了节约提成奖。由于新经济责任制的及时兑现,职工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形成了企业从未有过的凝聚力。他们的做法得到了西安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1999年,对西化厂来讲,是值得非常庆幸的一年,企业迎来了新的朝阳,干部职工一片喜悦,为企业实现了扭亏脱困而庆贺。

在生产与经营中,由于西化厂实施了以成本和费用考核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产品的生产成本在不断下降,企业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中得以生存。去年,在世界

整体经济速度放缓的影响下，氯碱行业出现了大面积亏损的局面，市场所有产品价格迅速下滑，西化厂的主导产品悬浮聚氯乙烯价格从4月份的每吨6200元下降到4300元，与往年的旺季7800元相比每吨下降3200元，全年仅销售价格变化减少销售收入3385万元，整个氯碱产品受市场价格影响减少销售收入5000万元，由于西化厂实施了以成本和费用考核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悬浮聚氯乙烯的成本大幅下降，西化厂在市场经济大潮的风浪中不但没有趴下，反而站稳了脚跟，在全国氯碱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二

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建立一套适合市场经济的新机制。乡党王增战深知，仍打着计划经济烙印的国有企业面对灵活多变，营销潜力无穷的市场经济，在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上，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企业要有应对市场经济的新管理机制。西化厂是个国有企业，传统的大锅饭式的管理体制严重制约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运作和发展，于是他们按照“精干高效，小管理，大服务”的原则，对企业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职能处室由原来的36个压缩到22个，中层干部由原来的128人精减到83人。按照“切块搞活，主辅分离，盘活存量，走向市场”的改革思路，对空分、机修、食堂、卫生处等进行改革，机修车间在租赁承包的基础上改制为设备安装制造公司，推墙入海，模拟法人运作；将空分车间与溶解乙炔站合并，成立气体公司；撤消了汽车运输公司，实行公车拍卖、租赁，与市场直

接接轨；六辆大轿车和其它专用车辆划归厂工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铁路实行限亏指标。这么一改革，很快使这个老字辈国有企业有了生机，生产经营出现了活力。机修车间和空分车间不仅扭亏为盈，三年来共为企业创造利润 200 多万元；铁运科在 1999 年亏损 170 万元的基础上，2000 年亏损额下降到 80 万元，去年又下降至 50 万元；职工食堂实行个人租赁承包，交纳租金和抵押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企业不再对职工食堂进行补贴，仅此一项，年节约费用 60 万元；卫生处实行医疗费用总额承包，节约奖励，超支重罚，有效地遏制医疗费用连年上升的现象。



贾双社近影

企业机制的改革有着分娩一般的阵痛。企业的利益与部分职工个人利益相碰的事会立马凸显出来，王增战、贾双社非常明确这一点，他俩的思想早有准备。为转变干部职工对改革的认识，王增战在一个时期内，几乎没离开过办公室，他和班子成员大会小会连着开，和干部职工谈心做思想工作一个接一个。顾不上休息，没有节假日，对他来讲，是常有的事。所有这些，他都

不在话下。当看到企业的改制顺利得以实施,经营管理有了新变化,他脸上才露出了笑容。他说个人的一切算什么,企业发展了,职工有饭吃才是最大的事,最重要的事。

三

受过高等教育,在实际工作中又有实践经验的乡党王增战、贾双社,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时刻不放过对企业发展有益的大小机遇。那是几年前,当王增战得知国家将对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但由于债务过重而陷入困境的重点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改制政策时,立刻敏锐地意识到企业这下有了更大发展的新机遇,必须要抓住不放,用足用活政策。两位乡党感到: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正是西化厂迫不及待的渴求,千万不可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西化厂建厂40多年,银行债务大,每年光付给银行的利息就达几千万元,如果实现了债转股改制,就为企业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吃透了政策精神,王增战便有了科学的对策。只要是认准的事,便齐心协力,想方设法主动出击,找省市相关



王增战近影

家将对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但由于债务过重而陷入困境的重点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改制政策时,立刻敏锐地意识到企业这下有了更大发展的新机遇,必须要抓住不放,用足用活政策。两位乡党感

到: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正是西化厂迫不及待的渴求,千万不可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西化厂建厂40多年,银行债务大,每年光付给银行的利息就达几千万元,如果实现了债转股改制,就为企业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吃透了政策精神,王增战便有了科学的对策。只要是认准的事,便齐心协力,想方设法主动出击,找省市相关

厅局、北京有关部委，一次又一次，硬是用求生精神感动了省经贸委和国家经贸委的领导们，很快得到了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原国家经贸委盛华仁主任的高度赞扬，盛主任在西安考察工作时，还专门来到西化厂听取了工作汇报。巩德顺副省长、原西安市市长冯煦初陪同盛主任考察时也表示，省市政府一定支持西化厂实施债转股。在中央省市有关部委、厅局领导及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西化厂成为全国首批108家债转股试点企业。程安东省长在西化厂债转股签字仪式上明确指示，西化厂作为西北地区第一家债转股企业，省市政府将在政策上给予最大程度的倾斜，省市领导将优先考虑西化的发展。

2001年10月30日，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西安西化热电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贾双社出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王增战出任公司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一个富有创新精神又颇具活力的西化公司显现于西安古城。

四

西化公司两个台柱子人物王增战和贾双社，都是我们富平的乡党，他们两个在一块共事，可以说是珠联璧合，一对黄金搭档。王增战，中等个儿，讲话慢慢的，但可是一字一板，句句都在向上。贾双社，高个，戴着深度眼镜，一举一动文静静的。他俩的家都在农村，王增战的家

在刘集(原施家乡),贾双社家在杜村镇(原吕村乡)。勤奋读书,孜孜不倦,使他俩都接受了正规的高等教育;努力工作,诚实做人,又使他们俩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企业的领导岗位;不断地吸纳新知识,接受新事物,精明的改革创新,友好的合作谋事,又使他俩把乡情亲情融合在对西化大踏步发展的奉献中,如今把个西化公司搞得红红火火。

面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乡党王增战、贾双社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他们清楚地看到,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于新成立的西化公司来说,参与竞争的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环境也将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国内市场上,将面临着具有强大技术和资本优势的跨国公司的直接挑战,因此,他俩在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努力在学习中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寻求企业生存并获得更大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为了从企业长远发展着想,又大胆决策,采取了一系列谋求企业发展的新措施。

首先,他们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随着经营体制由工厂制转为公司制,决策、管理监督、三权分离,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内部的管理机制也将遵循现代化企业制度要求进行调整,目前已理顺了公司的党群机构,正在调查研究为调整行政机构作准备。

其次,他们在全公司继续推行以前西化厂行之有效的以成本和费用考核为主的经济责任制,并把这种经济

责任制推广到新组合进公司的热电分厂,各分厂、工段、班组都定期召开经济活动分析会,对每个月的产品指标逐项进行分析,随时掌握产品成本的完成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今年,主导产品悬浮聚氯乙烯的市场价格在大幅度回升,公司抢抓市场机遇,通过检修解决生产中的瓶颈问题,生产量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0%,生产经营出现产销两旺的新局面。超额完成了公司计划的经济指标。

三是加快产品结构调整,积极开发供热市场。公司以技术创新为动力,推动了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调整,高纯双氧水项目是一项新技术,公司正在积极调研争取立项。面向西电公司、高新开发区的供热扩容项目,与美国太平洋金融投资公司洽谈的集中供热合资项目,都在抓紧实施之中。尤其是面向西电公司和高新开发区的供热项目,是落实西安市提出“还我蓝天”这个口号的具体行动,是改善西安市环境状况的一个环保工程,将于10月底完成,该项目完成后,可发挥现有设备能力,增加公司收入。

乡党王增战、贾双社欣喜地告诉我们,眼下西化公司正在做不懈地努力,力争早日成为上市公司,使西化公司在将来的生存中,有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听了两位乡党的宏图大略,我们作为富平人,不由得暗中高兴、骄傲。我们由衷地祝愿两位乡党在他们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中一步一步走向辉煌。

五

同王增战、贾双社两位乡党的谈话,话题的内容多数

是家乡的这里和那里的变化。他俩的父母都在富平，从小在富平长大，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为家乡的建设也曾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为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尽快富裕起来，他们出谋划策，乐于奉献。两位乡党告诉记者，前多年，西化厂的化工原料白灰主要来源于咱富平，厂子每天都要派出十多辆汽车在富平宫里一带拉白灰，这几年，因为路况差，到处是坑坑洼洼，再加上有个收费站，车辆承包后司机宁愿上铜川而不去富平，这不能不令人惋惜。他俩诚心地说，如果县上能想想办法，把道路修平，家乡的路好了，发展经济的环境好了，咋说都不能肥水外流！西化公司会重新考虑咱富平的原料。从他俩关注的目光中，我们感到了乡党们的情系故土的拳拳赤子之心。

记者在富平还了解到，他俩都是有名的孝子，都孝敬各自的父母，总想让含辛茹苦的父母享一享清福。

名人档案

王增战,男,1961年出生于我县刘集镇,刘集中学毕业后考入西北大学化工系,硕士研究生学历。

王增战大学毕业后即到西安化工厂,担任过车间技术员、车间主任、开发办主任、生产副厂长、厂长兼党委副书记等职务。2001年底,出任公司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2000年5月被西安市人民政府授予市劳模;2002年5月被省人民政府授予省劳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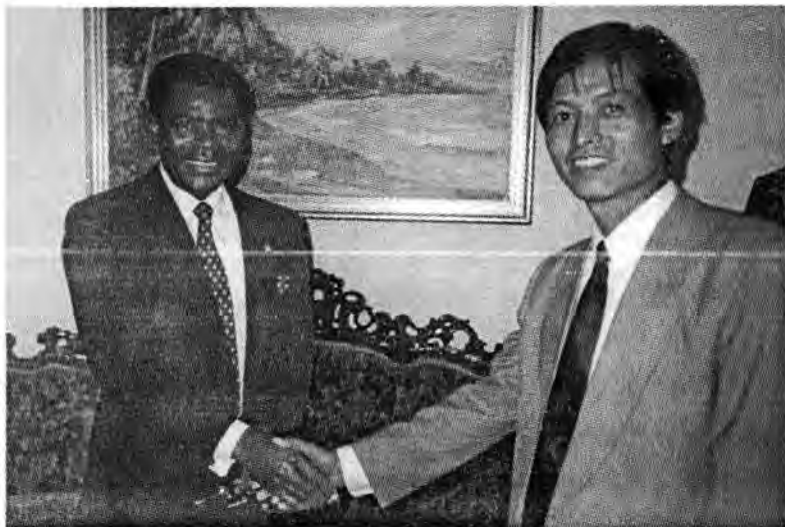
贾双社,男,1961年出生于我县杜村镇留召村,1978年迤山中学毕业,考入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制造工程系,硕士研究生学历。

贾双社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陕西化工机械厂,历任技术员、副科长、化工局团委副书记、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处长,1994年任西安市中药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2001年10月任西安西化热电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至今。

凤凰山的情结

——访陕西绿宝实业开发公司总经理姚高民

本报记者 由保民 郭建军 党延兴



姚高民在赤道几内亚考察时与总统奥比昂合影

他是西安城里近年来在企业发展规模上势头强劲的公司老总之一，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访华点名要会见的名人。

他不善张扬，默默无闻，埋头苦干，所从事的事业却蒸蒸日上。

他身居都市，兄弟姐妹举家迁居西安，却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故乡，村上集资建校，他第一个带头捐款。

2001年3月初的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们富平报社宣传在外名人特别报道组来到西安海天大厦，见

到了这位富平乡党——陕西绿宝实业开发公司经理姚高民先生。

巍巍的凤凰山，耸立在县城的北端，雄视着八百里秦川大地。这是一座风水宝山。山上，沉睡着千年前的唐朝皇帝；山下，繁衍生息着一代代农家人。姚高民家在凤凰山下，他兄弟姐妹多，小时候家里特别穷。幼时的姚高民，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父亲给他买一只小羊羔，他也能和别人家的小伙伴一样到山上去放羊。采访中，姚高民向我们叙说了这样一段亲身经历，那还是他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为了给他买一瓶仅仅只有一角八分钱的墨水，走遍全村求借无果，无奈中母亲用三分钱给他买了一包墨水粉沫，三十年后的今天，父亲那作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苦难的童年生活，磨炼出了他奋发向上的决心和刻苦读书的毅力，不管是读小学、高中还是大学，姚高民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他先后做过教师，政府机关的秘书，报纸编辑，高



姚高民陪同中国林科院院长江泽慧视察公司生产基地

校团委书记,政府公务员,到1994年,姚高民丰富的阅历已使他在林业厅的众多青年人中显露头角,省林业厅把陕西绿宝实业开发公司总经理的重担,交付给了这个极具魄力的年轻人。

陕西绿宝实业开发公司是省林业厅下属的一个全民所有制经济实体。公司组建之初,主要从事贸易经营。姚高民走马上任后,同公司一班人奋力拼搏,使公司很快发展壮大,如今已拥有7个分公司,经营范围涉猎旅游、城市绿化、建筑业、房地产开发、广告宣传、进出口贸易六大领域的集团化公司,资产超过上亿元,在全国林业系统企业经营评比中有一定影响。

二

以德立身,以诚待人,这是他的做人之本,也是他事业成功的根基。凡是同他打过一次交道的人,以后在事业上大都成为朋友或友好合作者。当然,也有人利用他的诚心设圈套使他上当受骗,看看人家的今天,他们会自愧弗如。姚高民崇尚传统的道德理念,善父母、善兄弟、善朋友、善邻里,信奉“行大道,获大德”的为人处事准则,他乐善好施,网络了一大批优秀管理人才,为公司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姚高民经商有一个独特的理念就是“生存为先,利润为后,发展为后”。他说,经商者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在一般人看来就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把利润看得高于一切,为了片面追求利润,有的投机取巧,有的尔虞我诈,有的相互倾轧,这些都是没有远见的短期商业行为。企业应

该把生存放在首位，搞企业不要希图投机，加入世贸以后，投机的空间几乎没有，但是有商机，只要你把握住了商机，事业就成功了一半。1996年，陕西旅游事业显露出了大发展的商机，绿宝公司及时同长安县林业局等单位合作，投资2000多万元在秦岭腹地开发了大坝沟森林度假山庄，吸引了省内外大批游客，如今已成为西安地区有名的旅游景点。

大开放，大市场，大联合，为绿宝公司的大发展再次提供了商机。1999年，绿宝公司同天津红港绿茵花草有限公司合作，投资1000多万元成立了红宝绿化公司，在陕西建立了四个总面积达6000多亩的苗木草坪生产基地，为西北地区首家具有现代化草坪生产能力的绿化企业，年产草坪卷60余万平方米，业务覆盖全国十多个省市，是国内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型园林绿化企业之一，先后承担了毛主席纪念堂、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外交部、文化部、广州全国九运会主会场、大连市人民体育场、银川市金水园度假区、陕西汉阳帝陵、西安人民大厦、杨凌国际会展中心广场等多项大型标志性园林绿化工程。2001年，红宝公司又作为西北地区唯一一家企业，承担了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生物技术专项林木良种繁育（西安基地）项目建设任务，这个项目总投资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江泽民主席关于“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号召发出后，绿宝公司抓住商机，在宜君和马栏两地分别成立林果开发公司，实施封山育林2万亩荒山综合治理工程，其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取得双赢。

三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姚高民既是绿宝公司的总经理，还是陕西大德置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原来在担任绿宝公司总经理之前，姚高民已经步入商海，自己成立了大德置业有限公司，公司以建筑和房地产开发进出口贸易为主，并在巴西圣保罗注册了巴西大洋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贸易和其它开发业务。

事业的成功，使姚高民成了西安城里小有名气的人物。然而，他没有忘记生他养他培育他的故乡，时时关注着家乡的建设。姚高民说，我常回富平，一进入富平境内便有一种亲切感，尽管家乡的山并不绿，家乡的人民也并不富裕，但我爱这里的山山水水，爱这里的父老乡亲。在西安干事，免不了常有家乡人来求他办事，姚高民满腔热情，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乡党办事。前年，县上为了发展富平经济，决定开发金粟山搞旅游事业，苦于没有启动资金，有人就上西安求助姚高民帮助贷款，姚高民视家乡的事为自己的事，他找熟人，通关节，为我县争取到贴息贷款，使金粟山开发工程得以顺利实施。

姚高民在西安办企业，为富平许许多多致富无门的乡党找到了就业的机会，也为富平不少能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场所。这些人都是通过相互介绍才认识了姚高民，凡求上门者，姚高民深知其人的艰难，按其才能给以妥善安置。目前在绿宝公司的管理人员中，95%都是富平人，这些人，不乏有的曾经担任过乡镇领导，机关干部或下岗职工，到了绿宝公司，他们对自身价值重新定位，找准了

自己的人生坐标,释放出各自的聪明才能,成了绿宝公司发展壮大的核心力量。

四

去年7月的一天,绿宝公司总部姚高民的办公室里,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宫里镇北陵村党支部书记姚建设,副主任刘青未和姚的老师刘绳武,他们为了村上的集资建校,想听听家乡出来这位老总的高见。

宫里镇北陵村是一个大村,有3700多口人,14个村民小组,全村900多名小学学生,分散在该村6所六十年代用庙宇砖木所建的小学堂里念书,这些学校教室由于年久失修,被县教育局确定为危房漏房,渭南市教委责令限期拆迁。村上的干部们为此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议,作出了“六校合一,整体搬迁,在村子适中位置盖一所标化小学”的决定。然而,这是一个造福后代的宏伟工程,需要一百多万元资金,这对于并不富裕的北陵人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姚高民是从苦中熬过来的,深知穷人的艰难,今天生活好了,他不能看着家乡的孩子们还继续受苦,要让孩子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好好学文化,将来长大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还有一件事象一团阴云时时在姚高民的心头萦绕:北陵村地处宫里北部的凤凰山下,这里的农民靠山吃山,上山炸石头,拉石头、烧石头、卖石头,靠石头算是挣了些钱,有些人还盖起了平房、二层楼,外界人哪里知道,在这些年里,从石头窝子里夺走了近百条鲜活的生命,他们都是年轻人,家中的顶梁柱,如今这些人的家庭,都是孤儿寡母,整天以泪洗面。他痛惜,北陵人如果有文

化,干什么事不能挣钱,非得上山钻石窝子,后代们有了文化,走出大山,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呀!而要实现这一愿望,就得从教育上抓起。

姚高民自身的感受实在是太多了。他坚定支持村上集资建校的决定,并当场表态,愿意出钱出力,带头捐款,为建校奉献爱心。去年11月份,北陵小学教学楼在一阵鞭炮声中破土动工了。这一天,姚高民和他的爱人雷迎春女士(到贤人)以及哥哥姚胜民、弟弟姚举民等从西安专程回乡,为建校工程送来了第一笔捐款两万元,在他的带动下,北陵村的村民和村子在外的干部职工纷纷慷慨解囊,在县城搞建筑的董虎生,在郑州工作的姚福顺,在西藏工作的姚农林都分别捐款2万元,目前全村已收到各类捐款达36万元之多。

今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正是举家团圆的时候,北陵村的村干部和工程队的董虎生经理再一次聚集在姚高民的办公室里,他们在进一步商定建校的有关事宜。热心家乡建设的姚高民站得高,看得远,他向村干部们提了三条建议:一、为留住教师,在校内再盖一栋教师宿办楼,改善教师的办公条件,北陵小学有了好教师,就能培养出好学生;二、建议对新学校实施全面绿化,三季有花,四季常青,把校园建成花园式的标化校园,所有绿化花草苗木全部由自己无偿提供;三、建议村上为学校开辟一片十多亩大的苗圃地,苗木由自己负责提供并帮助销售,师生们在校园开展义务劳动,每年的苗圃收入全部用于教师的福利补贴和学校开支,以减轻学生家长的负担。面对建校资

金的缺口，姚高民建议，一方面争取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另一方面再动员群众进行二期捐款，自己在二期捐款中还要带头。

最近，记者在北陵村采访时看到，这座总投资107万元的村级标化小学目前已初显雏形，总面积1700平方米，容12个教室，6个部室的三层教学楼主体已经完工，气势宏伟地耸立在新校园中央，铁杆透视围墙已经圈起，教师宿办楼开始放线动工。村支书姚建设介绍说，二期建校工程计划在麦收前竣工，到今年秋季，全村900多名学生都可以在新学校里上课，到那时你再来看，校园内绿草茵茵，花木芳香，宽敞的水泥大道直通村子中央，就目前来说，这将是我县投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一所标化小学。

问及姚高民家的情况，同行的原县教育局干部刘绳武不无感慨地说，姚高民弟兄姊妹7人，如今都在西安城里工作，孩子们也都在西安上学，他对家乡教育事业仍能倾注这样的心血，其精神真是高尚的，我们北陵人也为有这样一个乡党而感到荣耀。

名人档案

姚高民，男，1960年出生于我县宫里镇北陵村。198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先后担任过教师、政府机关秘书、报纸编辑、高校团委书记。1988年自己创办大德置业有限公司，并在巴西圣保罗注册了巴西大洋有限公司；1989年，进入省林业厅担任公务员，1994年任陕西绿宝实业开发公司总经理至今。

乡关何处

——西安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周大鹏抒怀



鸟到黄昏皆绕树，人至暮年尽思乡，人情如此，千古一然。可是乡关何处，却成了一个问题。我的祖父原是郑州的一个铁路工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陇海铁路修到西安之后，他便调到西安，然后举家西迁。咸铜铁路支线通车后，又调往庄里，解放后又调富平，以后再没动过，直到退休、去世。我生于民国时期的庄里，长在新中国的富平，求学于西安，下乡插队于关中西府，作为铁路工人的后代，我亦然四处为家。

记得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无祖国，他当然是从工人阶级要解放全人类的角度说的，顺着他的意思说下去，工

人阶级亦是无故乡的。我的长辈常爱说一句话：“哪里的黄土不埋人”，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工人阶级、尤其是素有半军事化之称铁路工人，自中国有了铁路之始，便开始了四海为家的生活。而郑州，作为中国铁路网的枢纽，有最早成熟起来的铁路工人，他们往往被调往新线路上去支援工作，所以“哪有火车站，哪就有河南担”就成了这种调动情况的形象说明。

故乡何处？我的父亲已说不大清楚了，对于我，更是一个遥远而飘渺的听闻。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久居都市，钢筋水泥的住宅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怀旧思乡的心绪愈来愈排之不去。但乡关何处似乎仍成了一个问题横亘目前，可是如果排除理性的叙述，不管档案上的记录，而是用你的情感去寻觅，那么，一个人的出生地便是他的真正故乡，那才是最令他梦绕情牵的地方。

那地方很具体，也很清晰，是我心中的一张永不褪色的老照片。出了庄里火车站向东走，下个小坡，是一处平台，平台上有口水井，青石井台，井口很大，有几丈深，辘轳绳要盘上两层才能汲上一桶水来，那井水甘甜清冽，上好的纯净。井台东边是个大坑，顺着一大土坡可下到坑底，坑的西边和南边是人工切削的直壁，直壁上挖了许多窑洞，里边住着铁路工人和他们的家小。我家住在坑的东边，我印象中那里就只我们一家。东边的地势较高，于是从平地向下挖一个较大的天井，在正东的直壁上开挖出窑来，窑很浅，仅只盘一个土炕，这算是正窑，然后向南、向北各有短短的通道，连结着两个很小的侧室，我就出生

在这样的窑洞里。天井院里挖有窨井，以接蓄和渗排雨水。家里的女眷们夏天冲凉洗澡时，就在窨井旁置一大洗衣盆，兑满温水，然后用芦席围成圆柱状，将水盆和洗澡人一齐遮住。

在天井院的西壁正中，修有一台阶式的黄土楼梯，沿此梯可上到地面上来。上到地面实际是进了我家的灶房，那是一座安间即人字顶的土坯房，每当做饭时，屋内便弥漫着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睛。我记事时大概三四岁，在我的记忆里，那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别无长物，铁路工人因为工作的流动性，能糊住嘴就行，无力也无法置田产家业的。我这么唠唠叨叨、不厌其烦地叙说庄里车站的窑洞，读者可能早已厌倦得不想卒读下去了，就此打住，说点别的罢。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庄里和富平是屡出大人物的地方，国民革命时期胡笠僧，是最为庄里人津津乐道的人物，我自幼听过许多关于他的故事，充满了神秘和传奇色彩。一个地方出了大人物，会在这个地方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其于大众的作用往往难以估量，最起码能激发后来者努力学习，奋发有为，以为社会效力。我的父辈们虽生在寒门，但个个都学习优异，人品端正。我的父亲为能考上免费的蔡家坡扶轮中学，曾拼命复习备考，一夜熬白了头，最终以优异成绩被该校录取。我的叔父毕业于富平迤山中学，后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我的两个姑姑毕业于庄里立诚中学，都是高材生，因为家中供不起，大姑早早嫁了人，小姑无奈上了西安的中专，对于她们来说，未上

大学成了终生憾事。

大概在我四岁的时候，爷爷由庄里调到富平，作闸口的扳道工，一家人从此迁居富平，生活条件比在庄里时还要艰苦，但我却觉不出，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生活真是充满了幸福和愉快。

每逢周末，小姑由庄里的学校徒步三十里回来，叔叔也从迤山学校返家，奶奶的茅草屋里顿时便喧闹起来。小姑最爱唱歌，是女高音，曾在富平县歌咏比赛中获过一等奖，她的秦腔、豫剧、评剧都唱得极好，苏联电影的插曲她几乎全都会唱。叔叔是男高音，音色清亮高亢，我后来喜爱音乐，并曾以此为职业，跟他们有绝大的关系。他们都写的一手好字，叔叔的字更是倜傥潇洒，俊俏拔俗，他总是为我写仿影，多是“锄禾日当午”之类的唐诗绝句，督促我写毛笔字。我现在之所以可以向西安的书法家们开玩笑，自夸“自幼临池，墨池尽黑”，指的便是那段岁月。

在富平那贫困却又幸福的童年是终生难忘的。我在苇子河和沔麻池里学会了游泳，学会了下水前先尿泡尿接在手里去洗肚子，以防肠胃受凉，也学会了用长裤做“水牛”——救生圈的方法。炎热的夏天正午在小溪中钓鱼，钻到麻地里捏金金牛；寒冷的冬天看农民挖莲菜，他们手中那明光铮亮的铁锨、用黄牛皮绑裹的“皮靴”，利洒地从污泥中挖出雪白的莲菜而又不碰伤它们的高超技巧，都使我着魔般地狂喜。

由于父亲已在西安铁路上工作，一九五五年我便由富平到西安上学，但从这一年到一九六八年下乡插队前

的十多年间,年年寒暑假都是在富平度过的,富平的家比西安的家更有吸引我的魔力。一九六八年的深秋,我再次来到富平,并独自一人去了一趟庄里,这是我离开那里近二十年第一次回去,故园早已破败荒芜,窑洞已残破坍塌,我怀着莫名的惆怅离去了。数年后,我又一次回到那里时,发现那个大坑已被填成平地,可能要做哪家工厂的地基,那富于田园诗般的故居景象,只是永远残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名人档案

周大鹏,1947年11月生于富平庄里,汉族,中共党员,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8年底下乡插队,1971年返西安工作,国家二级编剧。1985年任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干事,后任文艺处处长,1994年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1998年任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西安联合大学兼职教授、市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发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百万余字,评剧《人生》获陕西省首届文艺开拓奖二等奖,文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群众文化是基础文化》被《新华文摘》摘录,同时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市场文化和文化市场》获文化部、光明日报联合征文二等奖;《文化艺术超前发展论纲》获省文联优秀论文奖,出版专著《社会主义文化经济学》(与人合著)。书法作品送日本、韩国、新加坡、巴西、台湾、澳门等参展,获中国特奥会书画展金质奖章。事迹和传略被收入国内多部辞书。

平凡的岗位 辉煌的业绩

——记驻沪空军某部机营股水电班军士长薛思民

本报记者 由保民 李印功 张更祥 党延兴



在人民解放军空军驻沪某部,有一位被誉为“军中徐虎”的老兵,他叫薛思民,我县到贤乡人,是机场营房股水电班军士长。

1970年入伍的薛思民,他就将一张雷锋的照片恭恭敬敬地贴在了笔记本的扉页上,并一笔一划地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一个雷锋式的好战士。转眼32年过去了,他

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薛思民先后荣立三次三等功,15次受嘉奖,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个人。1996年他又被南京军区空军树为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并荣立二等功,空军某部党委作出决定,号召广大官兵开展向薛思民学习的活动。他的事迹曾先后被《解放军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称赞他为“一个平凡的军人,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

“为党尽责,再苦再累也心甘”

入伍 32 年，薛思民先后在警卫员、公务员、售货员、管理员等十多个岗位上工作过，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每个平凡的行业里，却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1980 年，领导安排他当水电工，于是，小学没有毕业的薛思民，白天参加扛水泥、拉石头等繁重劳动，晚上便“啃”起了《电工基础》等专业书本来。令人惊奇的是，次年他就取得了低压电操作的合格证，1982 年他参加的水电技师培训班，结业时成绩竟是全班第一。

薛思民所在的部队傍山而建，单位分散，水电管线铺设复杂，管理维护的高压线路长达 40 多公里，仅变压器就有 30 多台，可以想象平时的工作何等劳累。1995 年 10 月底的一天凌晨 4 点钟，狂风骤起，暴雨倾盆，承担部队外场保障任务的几个专业股突然停电。接到抢修通知，薛思民“腾”地从床上跳下来，一头扎进雨中，和三位战友徒步查了几十公里的线路，结果在一片竹林中找到了故障点：竹子把两根高压线挤压在了一起引发的短路。薛思民他们马上折回来，拿了锯、刀等工具去砍竹子。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战，终于砍出了一条 30 多米长、3 米宽的开阔地。随即，他爬上了 12 米高的电杆，尽管风猛雨急，他全然不顾……当故障排除时，看看表，他们竟连续干了七个小时！

那年，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营房建设，有 10 多个大小工程同时开工。按惯例，工程由地方工程队竞标承包，薛思民知道，埋在钢筋混凝土中的水电线路，就象一根根看不见的神经，若质量不过关，再修就麻烦大了。他便主动

请缨,要带领水电班的战士们义务承揽全部水电工程!场站党委被这个老兵的诚心感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这样,薛思民便顶风冒雨、没黑没明忙碌在各个工地上。几个月下来,人瘦了一圈。有天晚上,他高烧、呕吐不止,一夜无法入睡。第二天,妻子要他在家休息,他对妻撒谎,说到卫生队取点药,谁知一去就是半天……他早就在工地上忙开了!最后该工程验收时,不但水电项目获得全优,还为部队节约经费20多万元。

如今,薛思民已50岁出头了,场站的官兵们蓦然发现,他的年龄、军龄都称得上场站之“最”了——比站长、政委还大。政委同建常风趣地夸他:“在21世纪初的中国军队,找50岁的将校官容易,找50岁的老兵可就难了!”

“为他人排忧解难,我感到最愉快”

走进薛思民简陋的家,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部电话机。这是十几年前,部队领导特批为他安装的“专线报修电话”。

有了这部电话,薛思民从此变得不安宁。有时一天电话要响十多次,都是请他去排除水电故障的。有年春节的一天,他检修完线路刚踏进家门,正欲吃中午饭,电话铃响了。原来临时来部队家属居住区水管冻裂。他想,人家家属千里迢迢来部队过年不容易,哪能让他们在无水的尴尬环境中过年呢?于是他顾不得肚子饿,背起工具包,骑着那辆破旧自行车往出事地点赶去,一干就是3个小时,一句怨言也没有。最让大家称道的是那次疏通下水道:部队空勤家属区的下水道堵塞,粪水四溢。

薛思民获悉后，找来长长的竹杆去捅。可下水道口子小又被堵得满满的，任怎么捅竹杆也进不去。这时，他便脱下外衣。硬是用双手伸进下水道硬掏……从半下午直到夜幕降临，他终于疏通了下水道，部队官兵及家属们在一片欢呼的同时，被他这种忘我的精神深深感动了。

十几年来，薛思民利用业余时间走家串户，实行“全天候”的无偿服务，谁家的冰箱坏了，找他；谁家的便池堵了，找他；甚至谁家的电视机信号不好了，也找他……他总是乐呵呵地去，乐呵呵地干，从不嫌烦。他总是说：“能为他人排忧解难，这是我最愉快的事！”

**“家事再大是小事，公事再小是
大事”**

薛思民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他爱妻子，爱孩子，爱生活。可是，大家与小家，集体与个人，那头轻，那头重，他心里有杆秤。好在妻子也是个通情晓理的人，从不拖他后腿。她曾多次对老薛开



薛思民在检修供水设施

玩笑说“既然嫁给了你这头整天只知道干活的‘牛’，也只好努力当好‘牛家属’了”。

那一年，部队在驻地城市的接待站工程动工，薛思民照例负责水电项目，忙得不可开交，一个月难得回家一次。住在20公里外的妻子即将临产，无人照料。一天晚上11点多钟，妻子肚子剧痛，单位领导闻讯后派车把她送到驻地城市的一家部队医院。他得到消息，已是凌晨1点多钟了，匆匆赶到医院，在产房外焦灼地等待着。第二天一大早，他跑到街上买了一些食品，来不及仔细端详刚出生的女儿，也顾不上喂妻子一口汤，便急忙赶回工地。那段时间，他总是夜里10点后等工地的活忙完，才去医院照料妻女。困了，就在病房的椅子上打个盹，早上5点多钟又往工地赶。

1992年4月，远在老家的父亲病危，当时工地正处于安装水电设施的节骨眼上，他接连收到三封电报，都默默地把电报揣在兜里，尽管他心情十分沉重，但工地上没有他不行啊！直到收到“父病故，急归”的加急电报后，他才请了几天假，赶回富平，在父亲坟前默默地垂泪，只能请老人家原谅自己的不孝了！

薛思民的先进事迹被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996年7月，全国劳模、上海市先进标兵徐虎冒着酷暑，驱车来到被誉为“军中徐虎”的薛思民所在的部队，两位模范如老友重逢，在热烈的气氛中签订了结对互帮互学的公约，在当时被誉为一段佳话。

“部队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

如今的薛思民，已成了部队最老的兵，他的战士军衔早已到了最高极限，多在部队服役一年，每月只能增加一元钱的军龄补助。每临老兵复退，组织上征求意见时，他总是那句老话：“服从组织安排！”于是，这位军营中的技术尖子，一年又一年地被特批留了下来。

薛思民的水电技术百里挑一，远近闻名。他经手的水电活儿，地方质检部队总是一路的绿灯。于是有人劝他：“老薛，你有这么好的技术，为什么不到外面赚点钱补助家用？”

说实话，薛思民比谁都需要钱。妻子没有工作，全家的生活全靠他的工资维持，每月还要寄钱供养老母。为女儿治病，他借了6000多元。然而他总是说：“部队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不能为钱而动摇这一点。”

1996年的5月，驻地某建筑公司的陈老板找到他：“薛师傅，你到我这儿干吧，我每天给你100元的工钱，还给你老婆找份工作。”薛思民还是很平静地说：“陈老板，您不是第一位高薪聘请我的人。我的手艺是在部队学的，不为部队工作，对不住自己的良心。”

1995年，与薛思民长期在一起工作的老股长调沿海某市驻军任营房处长。这位老领导再三找老薛谈，要把他和全家调过去，负责那里的水电安装和维修。这时，爱人对他说：“思民，这么多年跟着你吃了不少苦，我不多说，可咱们也不能对不起孩子呀。山沟里的教育质量差，女儿以后的路怎么走？跟领导说说，咱们调到城里行吗？”

薛思民这次真动了心。领导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也

同意了。但当他听到部队领导到处找水电技术人员而无着落的消息,又犹豫了。他想:眼下又有工程要开工,自己最熟悉这里的每条线路、每个管道,于是咬咬牙给领导打了个电话:“这里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这里。”

这就是薛思民,我们的富平乡党,在最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最辉煌的业绩。

名人档案

薛思民,男,空军六级高级士官,1952年5月生,陕西省富平县到贤镇人,中共党员,中专文化。1970年12月入伍,任空军虹桥机场护卫中央首长专列的警卫战士;1972年调空军8312工程指挥部行政组服务,任副班长;1978年调空军86458部队司令部任公务员;1980年调86458部队机营股任水电班长;1998年调94778部队管理科任水电班长。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被空军树为“学雷锋标兵”,被南京军区空军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空军第九次党代会代表。

在京的富平乡党与富平报(上)

本报赴京采访记者 由保民 李印功 张更祥

2002年4月14日到23日,本报《富平在外名人特别报道组》记者赴京采访富平乡党,亲历了在京富平乡党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富平报的关爱,令我们感动不已,拙记予后。

4月15日上午,我们如约来到交通部常务副部长胡希捷的办公室。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胡部长亲切地笑着说:“噢,听说你们是咱富平报的记者,家乡来的,我再忙也要见一见。富平报我经常看,感谢你们给我寄报。每当从报上看到家乡的发展变化,我就很高兴。”一个“咱”字,立时驱散了我们的拘谨感,内心里“坐在乡党部长的办公室”的亲情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胡部长接着深情地说:“我虽然生在横山,长在西安,工作在外地,但我的根在富



交通部常务副部长胡希捷说:看到家乡报纸很亲切,感谢你们经常给我寄富平报。

平。现在,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包括我们富平在内的西部大开发,要抓住这个机遇,不能失掉这个机遇。交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富平要在发展交通事业上作些

文章。希望你们回去以后,通过富平报向家乡的父老乡亲问好,祝愿家乡在西部大开发中发展得更快些!”。

4月16日上午,在百忙之中的海军后勤装备部部长纪增政挤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纪部长接过我们带给他的近期富平报、2001年富平报合订本和富平报纪念建党80周年珍典,专注地翻了又翻,看了又看,连声夸赞家乡的报办得有气势,有水平。我们忙插话说办得不好……纪部长打了一个有力的手势,说:“富平人不能自卑,我在外几十年,心里牢记一句话,要把事干好,只能给富平争光,不能给富平丢人……”他越说越动情,听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纪部长说,我在军队任职几十年,给家乡帮不上什么忙,但家乡情结终生难以割舍,到现在还爱吃油泼辣子、面条,最后还要来一碗面汤。希望你们在富平报上,把在外游子的心声告诉父老乡亲,我们时刻都在思念家乡。

北京卫戍区后勤部副部长赵立正告诉我们,每期收到富平报以后,他逐版逐篇地往过看,连中缝都不放过。我们和他已是见过面的老熟人,就开玩笑问:“赵部长,中缝都登的啥?”赵部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一边



海航后勤装备部部长纪增政(左)夸赞家乡报纸办得有气势、有水平。



总装备部北京航天指控中心原政委赵武进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娥夫妇,见了富平报爱不释手。

登的是富平王国公司,一边登的是富平大世界公司,对不对?”“对对对”。我们与在场的八九个富平乡党哈哈大笑。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副处长

翟俊武,盛情地领着我们来到他那 18 层高的办公室观北京夜景。一进门,顺手从办公桌上拿过来几张新近收到的富平报说“我把你们寄的富平报看了以后,还保存在这里,乡情难忘呀”。此情此景,我们深受感动。翟处长说,“我对富平报的感情由来已久,富平报复刊后的第二年就刊登过我的文章,后来还登过多次。富平报是在外游子了解家乡的窗口,是富平人民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富平要在西部大开发中乘上快车道,富平报的宣传鼓动作用非常重要。”我们点头称是。

武警交通指挥部宣传处处长党益民,在部队搞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



北京卫戍区后勤部部长赵立正被富平报纪念建党 80 周年珍典吸引住了。

果颇丰,名声显赫。由于对新闻和文学的执着追求和对家乡的一往情深,每次回到老家,都要找富平报看,听说富平报记者来北京采访了,就赶忙联系。不料他就是我们要采访的富平在京名人之一。他带着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的长达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喧嚣荒塬》样书来见我们。他的这部作品被全国文学界称为在著名作家陈忠实《白鹿原》之后反映西部历史变革的又一力作。我们为家乡出了一个大家而自豪。党益民说这部书写的是我们富平历史上发生的事。为家乡写一部书,是他多年的心愿,这一心愿,现在实现了。富平报要转载的话,他一分钱的稿费也不要。我们开玩笑说“还要什么稿费,连你人都是富平的。”一句话说得党益民大笑不止,笑里透出富平人的精明与厚道。

北京武警19支队队长杨保强在翻看我们带给他的2001年富平报合订本,目光停在了富平县杜村镇中强建筑公司的彩版上,我们正纳闷时,杨保强高兴地说,“这写



国家综合农业开发办副处长翟俊武(左)对社长总编由保民说,我对富平报的感情由来已久。

的是我弟弟”。“杨中强是你弟弟?”我们一看,眼前的杨保强和彩版上的杨中强倒还怪象的。杨保强立即给在富平的弟弟杨中强打手机说,“我在北京,在乡党带来的

富平报上看到报道你的专版了，照片印得好得很。”我们在一旁接过手机，打趣说这不是照片印得好，是你们弟兄长得帅。手机的两头和在场的富平乡党一阵开心欢笑。乡情亲情弥漫了整个房间。

总装备部北京航天指控中心原政委赵武进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娥夫妻俩，是富平报多年的老读者，和记者一见如故。二人当场给富平报写了热情洋溢的鼓励话，并表示今后要多给富平报写稿子。我们说那是求之不得，多多益善。

尤其令我们感动与不安的是，在富平乡党聚会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研室主任徐万民乡党，因聚会场所临时变动，使他找了两个多小时没找到我们，失望而归（他忘了带手机）。因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专程拜访，就让赵政委、杨研究员夫妇给他带了一套富平报 2001 年合订本和富平报纪念建党 80 周年珍典，特意在封面写了一句感激乡党的话，以表歉意。礼轻情重。不知道他看见了没有？

笑声、亲情，相伴我们顺利、圆满地完成了采访任务。

在京乡党对富平报的关爱，将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办好富平报。（本组照片均为本报记者李印功摄）

盼望家乡早日富裕起来

——在京的富平乡党与富平报(中)

本报赴京采访记者 由保民 李印功 张更祥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到，在京的富平乡党对富平报的关爱，是寄希望于富平报这个媒体，把他们对家乡发展的建议和期望及时如实地传达给家乡的父老乡亲，盼望家乡早日富裕起来。正因为如此，和记者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家乡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心话题是发展。

家乡的发展始终牵动着交通部副部长胡希捷乡党的心。他说，这多年，我从各种渠道了解到，我们陕西，我们富平，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还是发展了。但是，因为是家乡，就觉得它发展的不如其他地方快，就更希望它发展得再快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这对包括我们富平在内的西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在发展中，要转变观



世界经济自然发展联盟首席经济专家江漪山

院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这对包括我们富平在内的西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在发展中，要转变观

念，不是经济
发展了才
发展交通，
而是要先
发展交通
才能促进
经济的发
展。你连
一条好路
都没有，
谁愿意
去投资？



中国公安大学副研究员张百灵(左)、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副处长翟俊武(中)、北京卫戍区一师后勤部干部田玉旺(右)

当然先要有钱，要量力而行。但办法总会有的。希望家乡在这方面作些文章，早日发展富裕起来。

海航后勤装备部部长纪增政说，我在部队任职几十年，给家乡帮不上什么忙，但我还是十分关注家乡的发展和变化，因为家乡养育了我。今年早些时候，我回去



清华大学博士、紫光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贺北平

了一趟，看到家乡发生了一些变化，心里很高兴，但总觉得发展不快，变化不大，尤其是交通条件较差，路坑坑凹凹，坐在车上心里不好受。希望家乡早日摆脱贫困，这是我的一个美好祝愿吧。我们告诉



清华大学博士常智杰

纪部长，富觅路正在扩建水泥路面，以后他回老家梅家坪时就可免受颠簸之苦了，纪部长说，我走不了几回，主要是父老乡亲。

北京卫戍区一师后勤部副部

长赵立正、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副处长翟俊武、总装备部北京航天指控中心原政委赵武进动情地说，我们在京的富平乡党常在一块议论，只要能为家乡发展办些实事，再苦再累再麻烦也不说啥。这时，我们插话，“你们已经是这么做的，而且做得很好，家乡人民感谢你们，敬你们一杯酒”。他们打断我们的话，说：“富平人给富平办

事，情所至，理应当，有什么感谢的？”武警交通指挥部宣传处处长党益民、海军后勤部参谋



武警交通指挥部宣传处处长党益民(左)、海军后勤部参谋路宏伟(中)、北京卫戍区一师后勤部副部长赵立正(右)

路宏伟应声接话：“就是的，说感谢就见外了，罚一杯酒”。就因为说了这句见外话，我们还喝了“罚酒”。作为一个家乡报的记者，我们被现场的真情深深地打动了。

乾为天公司总经理、CCED 软件发明者朱崇君的一席话，至今萦绕在我们的耳旁。他说，我们从事高科技产品的研制和开发，把企业搬到家乡去不现实。但我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办企业的经历和感受，说出来却对家乡不无补益。石景山区明确宣布引进高科技企业，奖励引进注册资金的 5%，言之有信，立即兑现，使高科技企业纷纷落户这里。他们把引进企业、资金、人才的人当功臣看待，荣耀得很。我是石景山区的政协委员，又是乾为天公司总经理，为了把我这户民营高科技企业“拴住”，石景山区的书记、区长经常登门征求我对他们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有啥问题，只要你提出来，他们全

力以赴、实打实地解决问题，不打官腔，不推诿扯皮。所有部门都在围绕发展提供服务，一路绿灯，没有人敢乱罚



北京福田汽车有限公司组织设计科科长王永清（右）、车型室主任工程师田孟义（左）

款乱收费，更见不到把企业当“唐僧肉”你一口我一口，啃的最后乘下几块干骨头没人管的现象。觉得不在这里办企业或把企业搞不好，对不住人家。你想，有了这样的投资环境，还有发展不起来的道理？

说到投资环境，在京的富平乡党感慨颇多。北京福田汽车有限公司组织设计科科长王永清、车型室主任工程师田孟义说，人才的流动就是冲着投资环境来的，因为那里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他们俩原来都是在陕拖厂搞技术的“能员”，就象在红苕窖里打拳，抡不开，尽是绊达。无奈之下，背井离乡，慕名应聘到福田公司，简直就象到了另外一个天地。在这里，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人才，你的工资、奖金、住房、子女上学就业等等有关切身利益的事，不等你提出来，就给你弄得妥妥贴贴，你只剩下干了。你想“拉马转店”，连口都张不开。福田公司就是靠广揽高科技人才崛起的，现在在市场上“牛气”得很。我们笑问，在福田公司工作，是不是有在体育场打拳的感觉，他俩笑答：“反正让你尽本事成，有多大本事成多大本事”。

清华大学担任国家生命与科学前沿研究课题的常智杰博士，以他在美国留学和全国先进发达地区的见闻为例，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他说，家乡要发展，一定要抓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动员乡镇、部门、企业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联姻，为经济发展插翅。我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的，我的校友杨公明、

同学杨公社在食品加工和畜牧业上全国都有名气，许多地方聘请他俩当科技顾问，我们县也可借鉴这种作法。只要家乡需要，尽管我忙得不可开交，我还可以在适当时候义务组织清华的博士们到家乡传授科学技术。我们告诉他，富平陶艺村就是靠和科研单位联姻，研制开发出环保陶瓷艺术砖，填补国内空白的，常智杰高兴地说，就是要走这样的路子。

发展家乡经济，要从实际出发，挖掘优势、抓住优势、发挥优势。这是世界经济自然发展联盟首席经济学家纪陆军、清华大学紫光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贺北平、北京中建恒基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宏伟的心声。他们说，家乡经济要持续发展，定位很重要，思路要清楚。他们推荐，可以组织家乡的人到山东寿光、北京昌平去看一看，那里把温室大棚高效农业的品牌创得响当当、亮铮铮。我们富平的粮、奶、果、菜等只要有一个先打出牌子，有了品牌效应，就可以把其他的带动起来。最怕只顾抓现成，搞坑蒙拐骗、倒牌子，弄啥瞎啥。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每当听到周围的县市要到项目、争取到资金了，在京的富平乡党聚到一块就会说，把这些项目、资金要是给我们家乡的话，该有多好。说到要项目、争资金，中国公安大学副研究员张百灵、人大毕业生、实业家雷甲文痛切地说，我们富平人观念还是有些落后、老化，在要项目、争资金上不展拓。他们说，要项目、争资金，如今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最初启动经济发展的成功做法，家乡应借鉴他们的经验，把家乡的事搞好。情之恳恳，意之切切，他们只有

一个强烈愿望,就是盼望家乡早富!早富!!早早富!!!

(本组照片均为本报记者李印功摄)

打造富平在外新形象

——在京的富平乡党与富平报(下)

本报赴京采访记者 由保民 李印功 张更祥

在京的富平乡党,不仅十分关注家乡的建设和发展,还十分关注富平在外的形象和影响。家乡发生的一切,时刻牵动着他们的神经。

我们到北京采访的第一站,是在乾为天有限公司经理朱崇君的家里。在那里等候我们的七八个富平乡党,一阵寒暄之后,话题“神差鬼使”般被扯到富在外的形象和影响上了。

朱崇君是搞微机软件的专家,几乎每天都耍弄微机、上网。可是,前一个时期他提起坐在微机前心里就犯愁,家乡不是这里有问题,就是那里出事情。有的同事开玩笑问:“朱经理,你们富平咋尽出这号事?”他无言以答。在一旁的武警总部宣传部文化处长张恒光、清华紫光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贺北平插话:“那一段时间,见了登那事的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京华日报,不看都够了”。人大毕业的实业家雷甲文、北京中建恒基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宏伟接话:“炒作匀和之了,一下把富平在外的形象糟踏得不象啥了”。

尽管乡党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懂得舆论监督的道理,可监督到自己家乡头上,感情和道理“打架”时,他们不由自主地替感情“劝架”,乃对家乡的感情太执着

使然。

尽管我们左右不了炒作这事的有关新闻单位，但好像我们失了职一样。我们脸热耳烧。

尽管我们可以给乡党解释这事的真假程度，来龙去脉，但在外界的影响已经造成了，再解释也无济于事。

是啊，富平在外的影响和形象，就是富平的投资环境。这样的投资环境，肯定会影响富平的发展，怎能不刺痛那些对家乡魂牵梦绕的在京乡党的心呢？

“我们这次来北京采访事业有成的富平乡党，就是想发挥我们富平在外的人力资源这个亮点，冲冲“晦气”，重新打造富平在外新形象，希望乡党们配合”。“这个创意好，我们全力配合”，在坐的乡党们几乎异口同声。

从这天开始的七八天里，大家围绕重新打造富平在外新形象这个话题，你一言，我一语，谈思路，提措施，使我们茅塞顿开，对我们鼓舞很大。由于我们是富平报的记者，乡党们就无形中对富平报如何做好重新打造富平在外新形象的宣传出了许多好主意，提了许多好建议。

——富平报要有主导舆论，把县报办成宣传富平的重要阵地。交通部副部长胡希捷、全国政协中国文史出版社副编审曹振中、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副处长翟俊武说，富平报复刊时，习仲勋乡党专门题词，又是全国发行，又是对开大报，这在全国县级报中也少见。它对宣传富平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可小看。报纸要多登些富平发展变化的报道，以鼓舞全县人民，我们在外游子看了也高兴。当然要实事求是，不能胡吹冒撻，有多大说多大，有多少

说多少。

——富平报要与时俱进，把富平报办成富平人民了解陕西、了解全国的重要窗口。海航后勤装备部部长纪增政、中南海警卫队教导员高宏新、海航装备部作战科科长曹万平、解放军仪仗队副队长张有才、北京卫戍区一师后勤部干部田玉旺建议，富平报要加强对党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方针政策的宣传，积极主动地去争取政策支持。富平要搭上西部大开发的快车，不在支持政策上动脑子，不行。

——富平报要办得生动活泼，让人爱不释手，才能起到它应有的宣传作用。财政部花苑农业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岳炜说，富平报给人的感觉是报道的主题性强，大气，标语制作、排版也讲究，如果再研究、提高一下可读性，就更好了。他建议要多刊发文学、生活方面的东西，比如好的小说连载等。武警交通指挥部宣传处处长、作家党益民诚恳地说，报纸没有可读性就吸引不住人，没人看，应当在这方面下些功夫。

——富平报应当上网，让在祖国各地的富平人一打开微机，就能看到家乡的消息。人大毕业生、实业家雷甲文、武警总部宣传部文化处长张恒光、中南海警卫队组干科副营职干事田七十等乡党，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我们提这个建议。他们说，信息社会，报社要善于用高科技手段扩大自己的影响，上网势在必行。我们表示要积极创造条件，尽早上网。

——富平报搞的“富平在外名人特别报道”，引起了

乡党的极大兴趣。乡党们说,我们不一定是名人,即就是名人,在家乡父老面前永远是赤子。报社搞这个活动,说明家乡人民没有忘记在外的人,我们深受感动。我们不仅有责任把我们在外的奋斗经历和工作情况向家乡的父老乡亲汇报,更有责任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富平报主动承担起这个协调组织的担子,值得称道。天津大学教授杨忠直激动地说,“家乡报社的记者专程来天津采访我,我十分感动,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为家乡父老争了光,没丢人。但我认为,挖掘富平在外的人力资源,不仅对富平在外的人是个鼓舞,对富平人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引进资金和技术,对家乡建设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清华大学紫光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贺北平、北京中建恒基有限公司经理赵宏伟说,把关于富平在外名人奋斗的经历和成果的报道,汇编成册,对教育富平的下一代也是个活教材。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正是这样考虑的。他们高兴地说:“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勤奋敬业

是走向成功的另一条腿

——赴京采访富平在京名人札记之一

本报记者 由保民 李印功 张更祥



在京部分富平乡党与本报记者合影

前排：北京实业家雷甲文(右一)，原北京卫戍区一师后勤部副部长、现供职于中组部工企委的赵立正(右三)、干部田玉旺(左一)。

后排：中南海警卫队教导员高宏新(右一)，海军后勤部参谋路宏伟(右二)，财政部花苑农业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岳炜(右三)，中南海警卫队组干科副营干事田七十(左二)，解放军仪仗队副队长张有才(左一)。

天资聪明,是走向成功的一条腿。

勤奋敬业,是走向成功的另一条腿。

这两条腿都健壮,才能走向成功。

采访富平在京名人,我们对此感受颇深。

清华大学博士常智杰,高中没毕业就考上大学,然后又被公派赴美留学。现在不仅要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还承担着国家生命与科学前沿研究课题。他天资不聪明,就不可能走到这一步。同样,他不勤奋敬业,要走到这一步,也不可能。他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加拿大,一家人聚少离多。白天,事把脑子装得满满的,要讲课,要做实验,要带十几个研究生,要处理许多事务,忙得连个转身都打不开,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打开电脑,总结研究成果,撰写论文。其它干扰排除了,疲倦却趁机向他袭来,他不得一会儿用凉水洗把脸,一会儿拍拍脑门,和疲倦作斗争。有时,是他用顽强赶走了疲倦,有时,是疲倦俘虏了他,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爬在桌子上。是啊,人不是铁打的,身体总有吃不消的时候。常智杰说,思想上稍有松懈,就不会这么“玩命”了。再说,在清华这个地方,不仅要凭知识,论水平,靠实力,还要有自觉的敬业精神和超人的勤奋。你再有水



北京武警 19 支队队长杨保强



北京市植物园科长周书海

平，你给学生讲课前敢不认真备课，大而化之？你承担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敢弄得一塌糊涂？一个数据弄错，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苦都白下了，咋样向学校和国家交待？要是这样，早把饭碗都凉了，反正清华没你的立足之地。要做好，就需要时间，需要精力，需要耐心，一个字：“忙”。常智杰的忙，我们是亲身领略了的。

我们到北京后，和他约了两三次，终于有时间相见。可谈了不到半个钟头，北京天坛医院的副院长带了一拨人，来和他商讨医学上的一个难题。我们和他的谈话被打断。好不容易送走了北京天坛医院的人，我们刚接话题，谈兴正浓时，他又接了一个电话：美国的一个朋友到京，给他带来了被他称做“珍贵礼物”的用作人体生命科学研究的“细胞”，他必须马上去见这位美国朋友。无耐，我们想逛逛清



北京汽车销售公司赵敏庄

华园的愿望，是他让在他的实验室工作的富平乡党、读研究生的王银银领着我们实现的；他宴请我们的心愿，是他让富平乡党、清华大学紫光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贺北平代他实施的。



武警总部纪委处长杨胜旭

常智杰，实在是太忙了。我们不忍心再打扰他。

武警总部宣传部文化处处长张恒光告诉我们，富平乡党、武警交通指挥部宣传处处长党益民，出版了长达40万字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喧嚣荒墟》，写的是我们富平历史上的事，在北京文学界影响很大。我们想见党益民的心情越发迫切。

见了党益民，他说辛道苦，令我们动容。

他当宣传处处长，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反映重大事件的重头新闻报道，都是他主动请缨，深入一线，挖掘采访，及时报道，引起强烈反响。他采写的报告文学《青藏线上生死劫》，荣获全国报告文学一等奖。他走上了设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武警交通指挥部的新闻报道，在他的努力下，搞得有声有色，多次受到表扬，党益民光三等功就立了十次。这才是党益民的一个方面。

党益民还有另一个方面，他还是一个名气日盛的军旅作家。当他把沉甸甸的《喧嚣荒墟》样书送给我们时，我

们分明感到,他的情绪有些激动,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为写这部书把苦下扎了”。

后来,我们得知,这部书全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写的,先后写了三年。在这三年里,他晚上十二点以前没睡过觉,早上六点钟就又起床;节假日,别人携妻带子逛街消遣,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辛勤笔耕。整整写了八大本子,手指发肿了,后来又学会了用电脑写作。他说,搞文学创作没有灵感不行;有了灵感,不吃苦,也是白搭。可以说,这部书是用苦换来的。听了他的叙说,我们被他的精神和毅力所折服。看来,名人之所以“名”,都是他们顽强拼搏的结果。

我们的结论,在天津大学采访时,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天津大学教授杨忠直,是工农兵学员,起初被人看不起。而如今,他是天津大学有名气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从事研究的环境经济学,有一个课题在世界前沿,有两个课题在全国领先。

我们问杨忠直,靠什么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他激动地说:把别人能下的苦下了,把别人不能下的苦也要下了;把别人能吃的苦吃了,把别人不能吃的苦也要吃了。

不知不觉间,已到了晚上十二点钟,我们说太晚了,休息吧。杨忠直笑着说,我们晚上十二点前睡觉是个奢望。那好吧,你们休息,我带的研究生还在办公室等我,我要检查指导他今天的课程。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们的的心灵受到了震撼。

回到宾馆,我们失眠了。

我们心想,“人比人活不成,马比骡子驮不成”这句古话,对,也不对。脑袋的质量高低是父母给的,天资聪明是自然优势,我们不和人家比这个,比后天的努力,总无可厚非吧?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象富平在京名人那样,把对事业对工作的勤奋敬业、顽强拼搏精神用到我们的岗位上,那该多好啊!

崇高追求

使他们的人生变得美丽无比

——赴京采访富平在京名人札记之二

本报记者 由保民 李印功 张更祥



常智杰(右一)在向天坛医院副院长介绍他的科研成果

如今在社会上,常有人说,官大小,钱多少,是衡量人生成就的主要标志之一。在京富平名人,官大小,都知晓;钱多少,我们想探个究竟。

面对我们“一个月能挣多少钱”的提问,乡党们似乎对单纯回答这个问题不感兴趣。

他们的共同态度是:承认挣钱要有真本事,没有真本事,挣不了大钱。他们现在至少不缺钱。但把挣钱作为人生的唯一和最终目标,就会使人全变得黯然失色。他们经受了有了钱怎么办的考验,这个考验和我们大多数人经

受的没有钱怎么办的考验一样严峻。

北京乾为天公司总经理朱崇君,是我国自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研究与开发的青年软件专家之一,他研究开发的中文字表编辑软件 CCED,被计算机广泛应用,至今无人突破,无以取代。在人们敬慕他、崇拜他的时候,他却把这些成就深深锁进了自己的记忆里,又开始了新的研究和开发,让手机功能“脱胎换骨”的软件已研制成功,只待硬件市场机会就可上市。这一科研成果,绝对前沿。朱崇君推心置腹地说:研制开发高新技术,想的是推动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在世界争得一席之地,为国家多做贡献。如果光考虑挣多少钱,那有另外的路数,不会这么执著地干。当然,一项高新技术出来,带来经济效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问题是,我们的立足点和追求目标,不能偏差。

清华大学博士常智杰,主持的生命与科学前沿研究课题,清华大学投资 1000 多万元为他建立了实验室。据他介绍,这一课题主要研究“细胞信息传导”,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细胞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它是攻克癌症的必经之道。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研究这个课题,就有个谁先拿下来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荣誉。国家科委、卫生部、清华大学的领导,对此事十分重视。说到这里,常智杰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他承受之重,我们可想而知。他顽强拼搏的动力,不是来自于挣多少钱,而是来自于国家的荣誉。在他那四五个人都转不过身的办公室里,听了他的内心独白,我们感到激动和自豪。

“我姐姐听说我是天津大学的教授，高兴得不得了。上次我接她来天津，她神秘兮兮地问，学校就你一个教授？我笑了，教授咋能就我一个？”天津大学教授杨忠直向我们说这笑话时，显得若有所思，他说，“环境决定人的见识，一个农村妇女，就只能知道这些”。我们说，天津大学的教授，不只是你一个，这是事实，但你却是教授当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你研究的课题，一个在世界前沿，两个在全国领先，这就够辉煌的。杨忠直摇摇头说：不能满足这些，我的目标是盯着十年以后当院士，到那时，就能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拿出真家伙（研究成果）来。要拿出真家伙，就要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清心寡欲，苦干十年。不清心寡欲不行，比如，许多地方请你做报告，讲上个把钟头，就可以拿到万元左右的报酬。你去不去？弄了这事，就势必要影响正事。

通过对他们的采访，我们明白了：他们有崇高的人生追求和为之奋斗的顽强毅力，把学来的知识，赚来的钱，用来为社会造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而使他们的人生变得美丽无比。

谦虚谨慎

只做大事不说大话

——赴京采访富平在京名人札记之三

本报记者 由保民 李印功 张更祥

干大事的人，不说大话；干实在事的人，不说假话。这是我们赴京采访富平在京名人得出的结论。

交通部副部长胡希捷，事干得够大的，我们请他向我们介绍一下他的情况时，他再三婉然谢绝，说没有什么可说的。看实在打发不了家乡来的记者，就略略地作了介绍。他态度谦逊，语气平和，实实在在，没有一点官腔，没摆一点架子。听说富平报要在《富平在外名人特别报道》



《富平报》是胡部长了解家乡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本报记者 李印功摄）

栏目中报道他时,他说,这只能是向家乡人民汇报,没有啥可报道的,随后吩咐秘书为我们找资料,寻照片,并和我们合影留念。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势。

海航后勤装备部部长纪增政,和胡希捷部长一样,这也是我们赴京采访的一个“大官”。一见面,又是握手,又是问候,亲切而又随和,他要不是身戎装,和我们富平的一个老果农没有什么两样。听了我们的来意,他客气诚恳地说:“官做得再大,都是富平人民的儿子,在外从军几十年,心里始终牢记着这一条。在富平报上向家乡汇报一下我们在外的情况,这事挺有意义,我乐意为之。”

当我们流露出对他们在京富平名人的敬慕之情时,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副处长翟俊武,深有体会地告诉我们,在国家机关干事,凭的是人的高素质,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骄傲,压力感和约束感是很大的,不看你吹得多美,



纪增政(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就看你干得多好。凭真本事说话。采访组对清华大学博士常智杰的采访,由于他坚辞不让我们报道他,致使采访进行得十分艰难。“你高中没毕业,就考上了大学,你被公派赴美留学,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顾问,你承担国家生命与科学前沿课题研究,如此等等,哪一条不值得报道?”任凭我们说得天花乱坠,他只是微微一笑,“现在许多事都是半拉子,最终还没有拿出成果来,不值得报道,到时候我一定主动和富平报联系,向家乡人民汇报。”一脸的虔诚和乞求,我们拿他没办法。只有等他说的“到时候”了。

武警交通指挥部宣传处处长、军旅作家党益民,在刚刚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喧嚣荒塬》样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恭恭敬敬地送到我们手里,口口声声左一个老师,右一个老师,叫我们提意见,弄得我们无地自容。我们心想,我们对党益民而言,老是老了点,但哪能为师啊?他一年内利用业余时间,写成了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成了文学界有名气的军旅作家,我们只是县报的一名记者,满足于能写几篇小文章,不在一个层次呀!他认真、谦虚、恳切的态度,我们分明感到他不是一般的礼貌,而是他把自己的辉煌全部抛掉,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来和我们交谈。我们捧着散着油墨清香的样书,夸赞他了不起时,他说,书的水平高低只能洗耳恭听广大读者的意见了,尤其是想听听家乡父老乡亲的意见。作家要拿作品说话,笔头要硬,嘴头不要硬。党益民,不被荣誉所累,虚怀若谷,不为成就所骄,难能可贵啊!

大 地 之 子

富 平 报 社

陕西天元印刷厂印刷

准印号 2003-0008

开本 850×1168 印张 8 2003 年 2 月印刷 印数 20000 册

定价:30.00 元

封面题字：贾平凹

封面设计：王戊洋



FUPINGMINGREN

陕新出批（2003）字第008号

工本价：30.00元